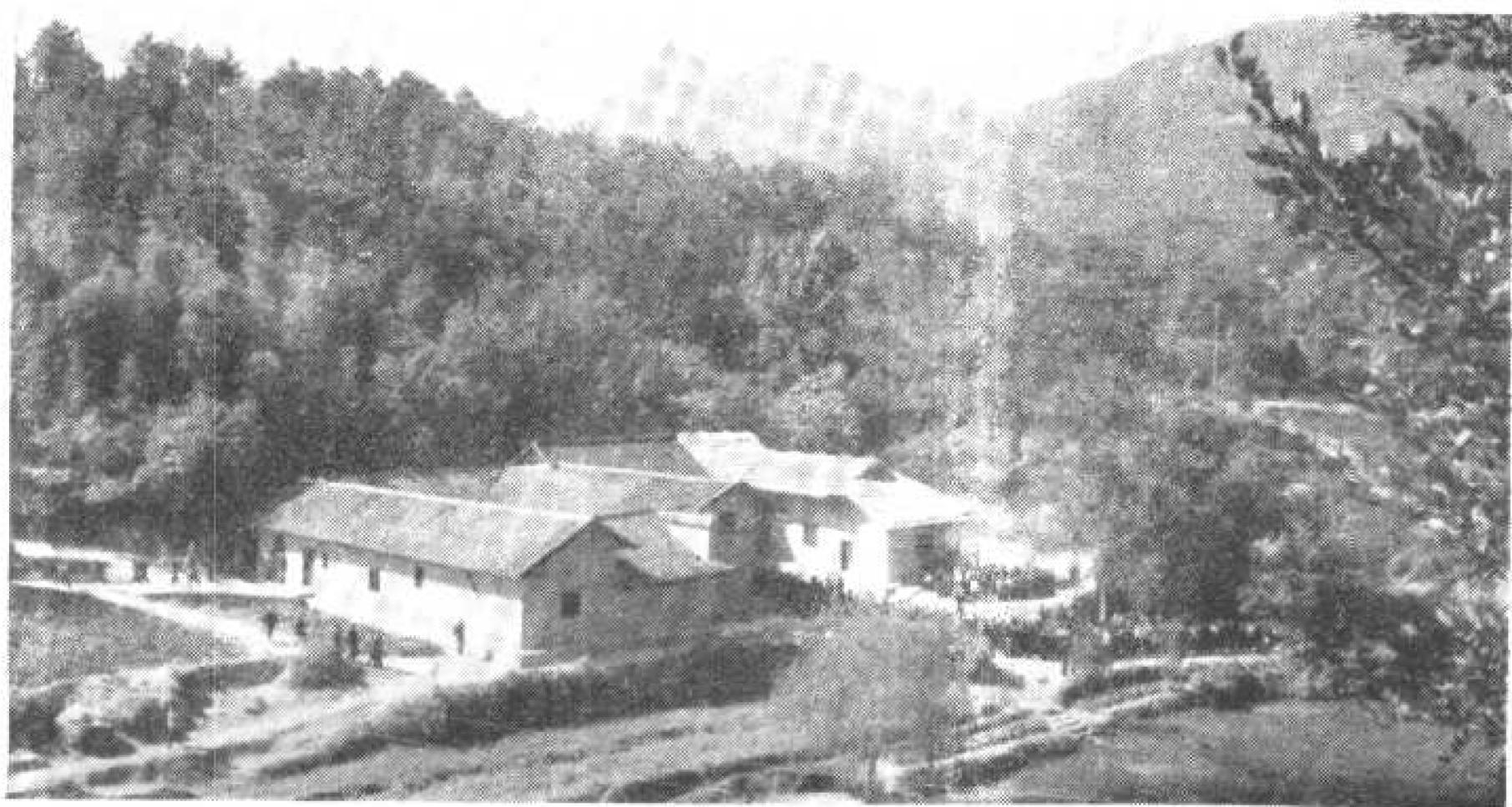




一九一四年的毛泽东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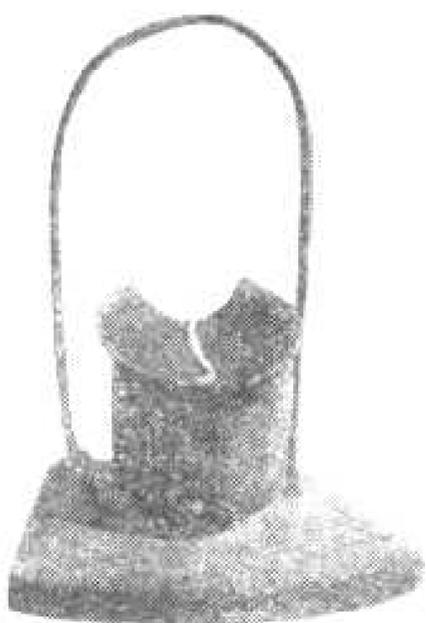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的旧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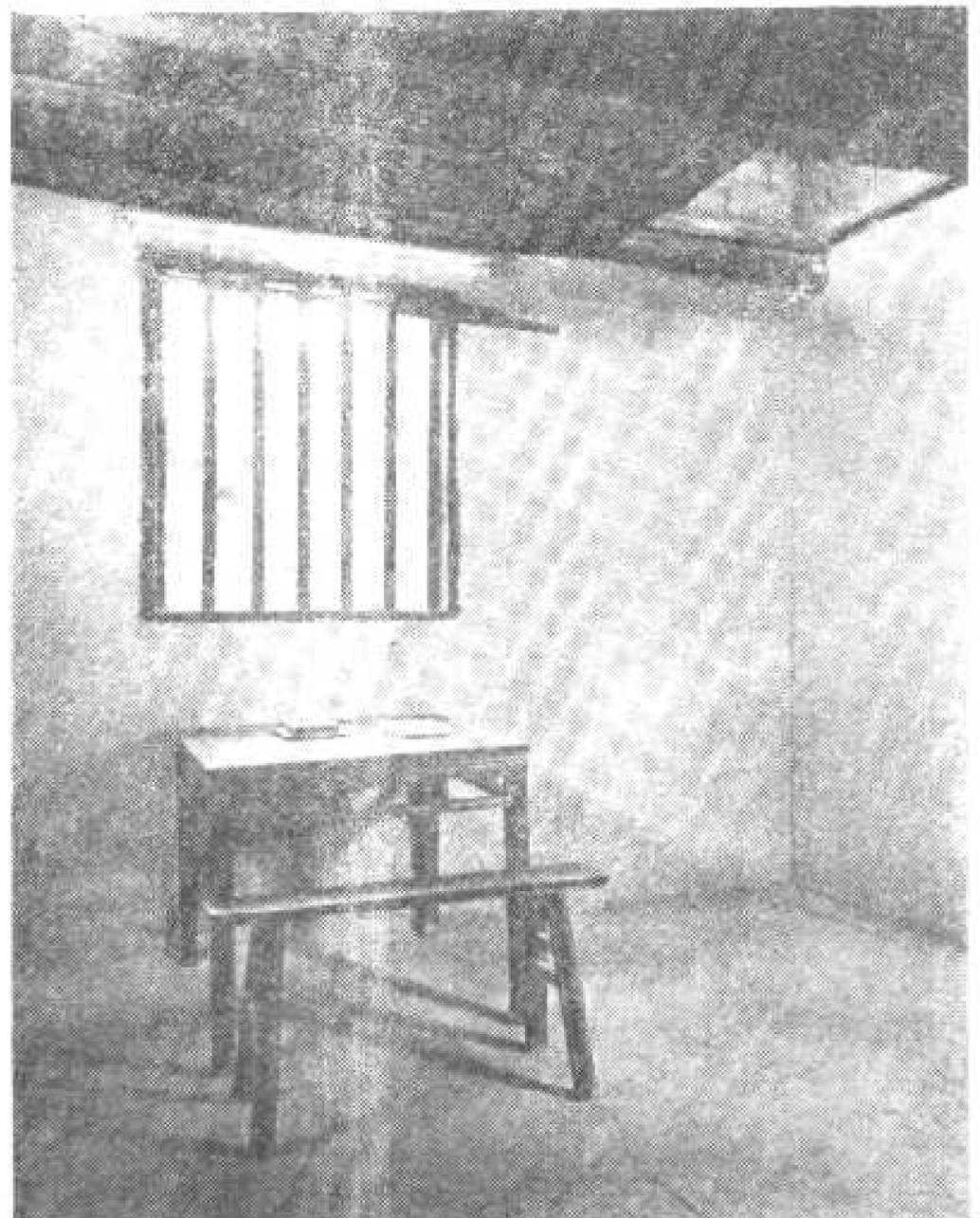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与
母亲及弟泽民、泽
覃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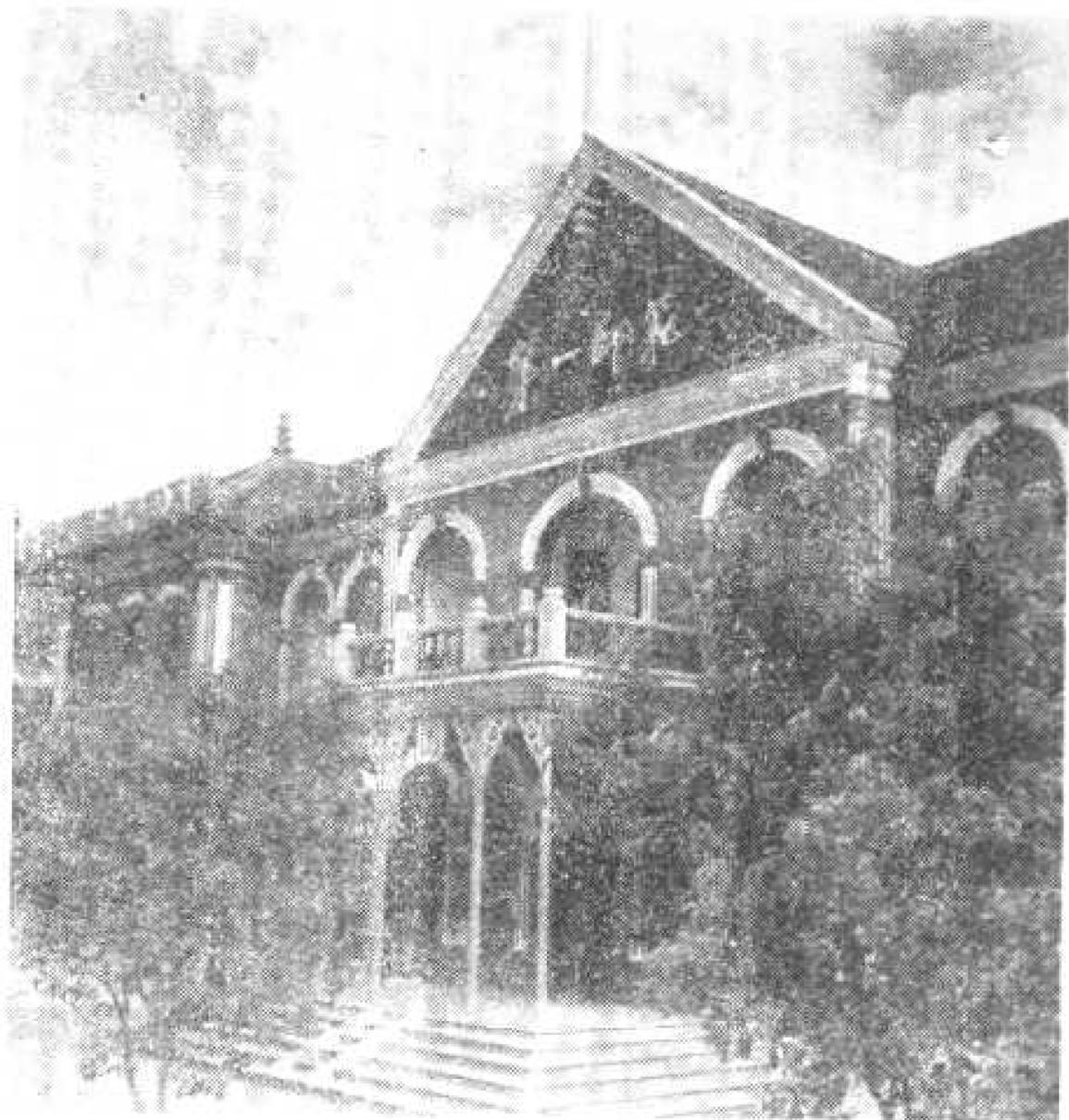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卧室一角。



毛泽东同志少年时代
经常在这盏油灯下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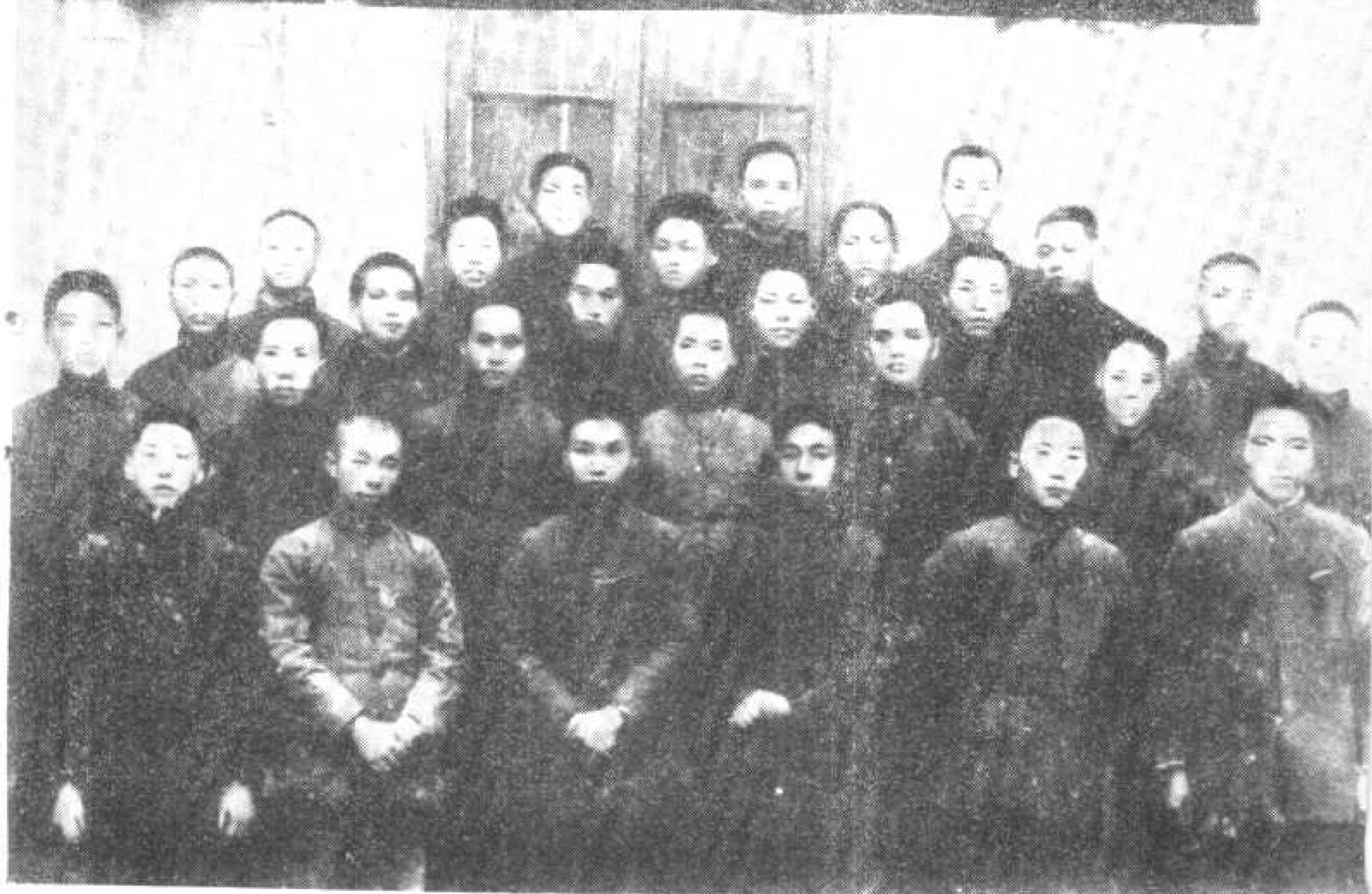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第一师范第八班同学合影（第四排右起第二人为毛泽东同志。）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合影





一九一九年新民学
会会员合影（后排左起
第四人为毛泽东同志）。



岳麓山之爱晚亭

目 次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

- 农民的儿子..... 1
从小关心国事..... 7

第二章 辛亥革命前后

- 东台山下..... 16
第一次发表政见..... 20
参加革命军..... 25
图书馆的自学生活..... 29

第三章 第一师范的峥嵘岁月

- 刻苦地批判地学习..... 35
顽强地锻炼..... 50
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57
农村调查和工人夜学..... 66
组织新民学会..... 77

第四章 在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中

- 第一次北京之行..... 88
站在五四运动的前列..... 98
《湘江评论》..... 107

驱张运动和第二次到北京·····	121
第五章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日子里	
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	133
关于建党和革命道路问题的讨论·····	142
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	153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163
后 记·····	171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

农民的儿子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里。

韶山，位于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处，东北面距省会长沙一百八十华里，东南面离湘潭县城九十华里。这里是一个群山环抱、蜿蜒起伏的狭长谷地。山上长满了松、柏、杉、枫，还夹杂着丛生的翠竹。每到春天，百花盛开，把葱郁的山岗点缀得五彩缤纷。从山谷中汨汨冒出的清泉，汇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淙淙潺潺，不分昼夜地流着。小河两岸长着长青树，碧绿的树枝与清澈的流水交相辉映，景色十分秀丽。

巍峨挺拔的韶峰，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相传在远古的唐虞时代，舜帝南巡时到了这里。他看到这崇山幽壑之间，人民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生活，非常欣慰赞美。于是，带着妃子和大臣们登山游览，并在山上奏起了幽雅的韶乐。后来人们就把这块地方叫做“韶山”，并把传说中舜帝游过的一些地方，如兀立云端、葱葱郁郁、白云缭绕、气势雄伟的“韶峰耸翠”，流着红赭色泉水的“胭脂古井”，以及“凤仪亭址”、“仙女茅庵”、“石屋清风”、“顿石成门”、“塔岭晴霞”和“石壁流

泉”等，叫做韶山八景。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啊！可是，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这里的人民却世代过着贫困、凄惨的生活。舜帝南巡的传说，只不过是反映了堕入苦难深渊里的人民，对那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的美好生活的憧憬而已。

毛泽东同志诞生的时候，中国正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纷至沓来；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媚敌卖国，因而一次次侵华战争相继爆发，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一批批黄金白银，就象流水似的淌入帝国主义的腰包。封建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鱼肉人民，敲骨吸髓。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韶山，这个表面上似乎很恬静的山村，实际上充满了凄风苦雨。冲里住着六百多户人家，他们大多数姓毛，也有孙、李、钟、庞等姓。在小河两边和山谷里，那高大的青砖瓦房，除少数庙宇祠堂外，都是地主老财的住宅；那些低矮破烂的茅棚，则是穷人栖身的地方。忠厚、勤劳、朴实的韶山农民，祖祖辈辈辛勤地劳动在这块土地上。韶山本来山多田少，由于地主大量兼并土地，致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成了地主的佃户或雇工。他们起早摸黑，如牛似马地劳动着，一年苦到头，还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狠心的地主老财，除了重租、高利贷盘剥外，还经常强迫农民为他们送信、抬轿，服无偿劳役。加之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民不聊生。为了活命，很多农民只好抡起斧子上山砍柴，用独轮木车推到三十华里外的银田镇去卖；有的当长工、打短工，出卖劳力；有的卖儿鬻女，背井离乡，沿门乞讨；有的被迫

起来反抗，结果被关进监牢，甚至惨遭杀害。

“韶山冲来冲连冲，
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
红薯柴棍度一生。”

“农民头上三把刀，
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
逃荒、讨米、坐监牢。”

这些饱含着血和泪的民谣，是韶山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同志就在这个山村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他家居住的上屋场，是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农舍，当地叫做“一担柴”式的房子。上屋场住着两户人家，以堂屋正中为界，东边是毛泽东同志的家。西边的一家也姓毛，家境十分贫穷。毛泽东同志的祖父在这里定居时，还只是几间矮小破旧的房子，屋顶和邻居的一样盖着茅草。

毛泽东同志的父亲毛顺生，原是一个贫苦农民。年轻时，因家里负债过多，被迫当过兵。回家后，辛勤种田，兼做点小买卖，逐渐积蓄了一些钱，陆续买下了一些水田。后来，他又做贩运谷米和生猪的买卖，赚了些钱后，又买了几亩水田。从此，他把做生意当成主要事业，用去了大部分时间。田间的耕作和管理，雇了一个长工，并叫妻子和孩子们也去劳动。冬季贩米正忙时，还添雇短工。毛泽东同志后来回忆当时的家庭情况时说：“这

样,我家就归到‘富农’一类了。”^①

毛泽东同志的母亲姓文,湘乡县棠佳阁人,是韶山冲里一个以勤劳、善良、敦厚、富有同情心而著称的劳动妇女。她非常疼爱孩子,并以她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德影响着他们。她怜悯那些穷人:要饭的来了,总是盛饭给他们吃;饥荒的时候,常常送米给穷乡亲。毛泽东同志十分敬重他的母亲,甚至在几十年后还以深厚的感情谈到她。一九一九年十月,母亲去世时,他写了一篇哀恻动人的《祭母文》,文中写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谎言,不存欺心。”“头脑精密,擘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病时挽手,酸心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

毛泽东同志又名毛润之,小时候村里人都称呼他为润之。他的个子长得很快,比起同年龄的少年都要高些。六岁时,他就开始从事扯草、摘豆荚、打猪草和放牛等农活。每天清晨太阳还没出山,他就把牛牵到青草地上,让它吃那新鲜的嫩草。

村里人放牛是各放各的,小朋友会集一起时,常常谈到放牛时干不了别的活,也不能在一块玩。一天,聪明的毛润之把大家集拢来,留几个人去放牛,其余的人去割草、砍柴或采野果。这样,在同一个时间里,牛吃饱了,各人又分得了草、柴和野果。然后,大家把牛拴好,围坐在大树下吃果子,讲故事,作游戏。

八岁时,毛润之开始上学。上学期间,他早晚仍旧放牛、拾粪,农忙季节还参加收割。十三岁至十五岁时停学在家,参加田间耕作,他很快地学会了插秧、栽禾、割稻、扶犁掌耙等农活。繁重的劳动,使他从小养成了勤劳、朴实的优秀品德。

^① 引自斯诺《西行漫记》,复社藏版。一九三八年三月第二版。

少年的毛润之生活在农民中间，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生活，在他那幼小纯朴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他们的苦难遭遇深切同情，经常帮助他们做些事情。几十年后，村里的人还清楚地记得他帮助穷人的好多故事。

毛润之在离家较远的私塾读书时，早去晚归，午饭带到学校去吃。有一段时间，放学回来，他总是说饿，吃得特别多。母亲感到奇怪，问他是不是饭菜少了。他告诉母亲，班里有个同学，家里穷，没饭带，他就把自己的饭菜分了一半给他。母亲赞扬了儿子，以后总是让他多带些饭去。

有年秋收季节，家家户户都在晒新谷。一天下午，突然乌云四起，狂风大作，一场暴雨即将来临。毛润之正要去抢收自己家里的谷子，突然发现邻居的晒谷场上，只有一个妇女在手忙脚乱地抢收。他立刻赶去帮忙。结果抢在雷雨前，把谷子收好了。当他回到自家晒谷场时，瓢泼大雨已经哗哗地下起来了，快要晒干的谷子又被淋湿，还被雨水冲掉了一些。父亲问他上哪儿去了，他说：我帮隔壁屋里收谷去了。父亲生气地说：自己家里的不收，去帮别人收什么？他回答道：人家的谷要交租，家里又少吃，糟踏一点就更困难了。我们的谷是自己的，损失一点不要紧。

有一次，毛润之的父亲买了人家一头猪，已按时价交了定钱。过了些日子，父亲要他去把猪赶回来。他到了那家，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老婆婆叹了一口气，说：唉！该你们家赚钱罗！毛润之问是怎么回事。老婆婆说：我家的猪定给你们时，价钱低些，现在猪价又涨了。润之看到她家很穷，便说：我不赶你家的猪了，你卖给别人吧。

毛润之帮助穷人的动人故事是很多的。在骄阳似火、田地

龟裂的时节,他经常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农民车水抗旱;在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冬天,他曾脱下身上的衣服,送给一个冻得打颤的穷苦青年;……

晶莹的露珠,能反映出朝霞的光辉;生活中的小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德。这个对贫苦农民富有同情心的少年,给村里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润之对穷人的疾苦十分关心,热情帮助;而对父亲的刻薄自私,则深为不满,并不断地进行着斗争。

父亲治家很严,一心想发财致富。他送儿子读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发家”。润之刚学会了一些字,父亲就叫他记帐,学习打算盘;没有帐记时,就责令他去田间劳动。当他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发家”的标准时,就惯用“不孝”和“懒惰”两种罪名来责备他,甚至常常打他和弟弟泽民。为了反对父亲过于苛刻的要求,润之十三岁的时候,想了个法子,就是引用经书或父亲自己的话来反驳。父亲说他“不孝”,他就说:古书上说:“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有“子孝”;父亲骂他“懒惰”,他就说:长者应该比后辈多做些事,你年纪比我大两倍以上,应该多做些,等我到你那样大的年纪时,力气要比你大得多,做的事情也更多。父亲经常被驳得哑口无言。

父亲常和一些生意人在一起,谈论生财之道。润之对此非常不满,很讨厌那些财迷心窍的生意人。每当这样的客人来了,父亲要他倒茶、陪客,他总是设法避开。有一次,他和父亲闹翻了,父亲当着客人的面骂他“好吃懒做”。这下可把他触怒了,当众和父亲闹起来,而且宣布要脱离家庭。说着,撒腿就往外跑。母亲出来追赶,竭力劝他回去;父亲也赶来命令他回去,但同时还在责骂他。他跑到水塘边,说如果父亲再进一步,他就投

水。在这种对峙之下，双方提出了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他下跪赔罪；他同意如果不打他，则可以跪一条腿。结果达成协议，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从此，毛润之发现，只有用公开反抗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对方才会宽和些；温顺服从，对方反而会更厉害。父亲严厉粗暴的教子方法，终于在儿子面前失败了。

在毛润之家里，这一类的斗争，不断地发生着。特别是父亲继续积聚财产，并接受别人田地的抵押，使毛润之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他认为，这种只顾自己发财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因此常和父亲发生争吵。后来他回忆这种情况时风趣地说：我们家里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在朝的执政党；一党是由我、我母亲、我弟弟，有时还有雇工所组成，是在野的反对党。可是在反对派的联合战线上，意见颇不一致。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政策，不赞同对统治力量的公开反叛。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虽然生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但和穷苦的劳动人民，却有着共同的思想感情。他是千千万万贫苦农民的儿子。

从小关心国事

毛润之八岁时，进入离家很近的南岸私塾读书，两年后转入桥头湾、井湾里等地私塾，一直读了五年。他好学、多思，是个挺会读书的学生，这是几个私塾的老师所一致公认的。然而由于他性格倔强，敢于反抗，在那些老学究看来，他又是个不好管教的调皮学生。

那时候，私塾的正墙上竖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牌

子,身着长袍马褂的先生经常带领学生在牌位前作揖磕头,表示崇敬。私塾里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一类的书。先生教课总是照本宣科,不加解释,光叫学生死记硬背。学生只知背诵、默写,并不明白书中的意思。背书时,先生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学生必须恭恭敬敬、笔笔直直地背对先生站着。背不出来就打手心,打屁股,罚跪香(跪在有棱角的板子上,直到点完一根香)。因为那时的先生和家长都相信“棍子底下出好人”的理论。封建礼教象“紧箍咒”一样,桎梏着天真烂漫的孩子们。

毛润之不愿意受这个束缚。他十岁那年,曾以逃学的方式反抗先生体罚学生的粗暴行为。一天,他夹着书包,冲出私塾。但又怕父亲打骂,不敢回家。他以为湘潭县城是在某个山谷里,便莫名其妙地朝着想象中的县城方向走去。结果瞎跑了三天,还不见县城的影子。正当他迷惘不知所措的时候,家里的人找来了。这时他才知道,三天的“旅行”,离家还不到八里地,走来走去,只是在山谷里兜圈子。回家后,出乎意料之外,父亲的粗暴态度比以前稍微好了一些,先生也温和多了。他的反抗行动得到了如此的结果,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启示。

在私塾的学生中,毛润之是最肯用功学习的,加上他的理解力和记忆力都很好,所以凡是教过的功课,他都能很快地背诵和默写。他读了不少经书,可是,并不喜欢它们,只觉得它们诘屈聱牙、干瘪无味。他最喜爱看的是传奇小说,尤其是那些反叛的故事。但在先生看来,这都是些“闲书”、“坏书”,时刻提防学生偷看。毛润之避过先生的眼睛,入迷地读着《精忠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书。由于读得书多,他知道引人入胜的故事,比村里的老年人还多,而且记得很牢。

毛润之十三岁时，父亲不让他读书了。停学期间，他白天和成年人一起，整天在田间劳动；晚上除帮助父亲记帐外，仍然如饥似渴地在一盏小桐油灯下刻苦地读书。凡是韶山地区能够借到的书，他几乎都阅读了。有时还跑到离家几十里远的舅舅和表兄弟那里去借书。对此，父亲非常不满，因为儿子读的不是经书。父亲之所以强烈地希望毛润之多读经书，是有重要原因的。原来，有一次，他同别人打官司，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经典，而他却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以致官司失败了。从此，他认定，只有让儿子熟读经史，才能帮助他在今后的官司中取得胜利。现在，儿子主要是读杂书，这对他来说，不仅是希望的破灭，而且是徒然浪费灯油。母亲怕儿子累坏了身体，也不主张润之晚上看书。可是，润之对那些小说，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为了不让父母看见，润之总是把窗户遮掩起来，在那豆大的灯光下默读深思，直到深夜，甚至拂晓。

在夜读中，毛润之读了一本《盛世危言》。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中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反映了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改良主义思潮的全貌。作者认为只有兼采西学，发展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才能振兴中国，抵抗外侮。书中所憧憬的兴旺前景和作者的爱国热情，使润之极为振奋。他觉得这种反映当前社会问题的书籍，比“四书”、“五经”要现实得多，有用得多。从此，除小说外，那些呼吁救亡图存的时务文章，他也非常爱读。

毛润之阅读了许多小说和新书后，联想到社会现实，发现了不少问题，经过刻苦的思考和钻研，慢慢地在他思想上形成了某些新的观点。

有一天，润之在读书之后，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书里

叙述的都是帝王、将相、官吏、文人，而没有关于种田农民的事迹呢？在整整两年时间里，他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并问过许多人，都没有得到正确的回答。后来，还是他自己从生活中找到了答案：他看到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生活大都很苦，读不起书，不识字，就是识几个字也不会写书。因此，写书的人一定不是农民；写书的不种田，不了解农民，甚至看不起农民，当然不会写、也写不出关于农民的书来。润之深深地热爱着和他朝夕相处的农民，感到书中不写农民是不公平的。

毛润之小时候也信过神。当母亲生病的时候，他曾去求神拜佛。他母亲对佛教是极为虔诚的，而且总是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等思想灌输给孩子。那时，父亲却不信神。九岁的润之，曾一本正经地同母亲讨论过父亲不信神的问题。此后，母子二人用过许多办法试图劝醒父亲，但都失败了。可是，几年之后，事情却意想不到地发生了相反的变化。

润之从书中读到了一些反叛的故事，初步接触了一些科学知识，加之在实际生活中，从来没有看到过神的作用，慢慢地就动摇了对神的信仰。母亲为他忧虑，责备他对宗教信仰不虔诚，而父亲却毫不介意。不久，父亲有一次外出收帐，在路上遇见一只老虎，那老虎瞧瞧他，忽然慌张地逃跑了。父亲仓皇赶回家后，仍心有余悸，对此感到迷惑不解。经过妻子的解释，他相信这次神秘的脱险是菩萨保佑了他。从此，他便开始信神了，有时还焚香点烛，顶礼膜拜。不过，对于儿子与日俱增的无神论倾向还是置之不问。

读了《盛世危言》，毛润之产生了恢复学业的愿望。他向父亲要求继续上学，但遭到了反对。为此，他常和父亲争吵，最后还是取胜了，又获得了上学的机会。十五岁时，他先后在一个失

业的学法律的人那里和一位老学者家里，学习了一年，读了些经史古籍，也读了许多时务文章和其他新书。

当毛润之见识初开的时候，整个中国正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劳动人民奋起反抗而惨遭镇压的血腥事实，以及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强烈呼声，不断地冲击着他幼小的心灵。

有一年，村里有一个叫毛承文的贫苦农民，几次带领穷人“吃大户”、闹平粜，并揭发了封建族长在修祠堂时贪污公款的丑行。族长老羞成怒，勾结地主，给他扣上了破坏族规的罪名，押进祠堂，准备毒打。村里顿时轰动起来。毛润之跟着乡亲们涌进了祠堂，挤在前面站着，心中忿忿不平。那位老朽的族长，坐在案桌正中，宣布毛承文的“罪状”后，把惊堂木一拍，便喊：“打！”有些小孩子吓跑了，勇敢而富有正义感的毛润之却毫不惧怕，他大喝一声：“不能打！”乡亲们也跟着吼了起来。族长见毛润之是村里较为富裕的毛顺生的儿子，又是个有学识的人，加之众怒难犯，便迟疑起来。毛润之放低语调，却仍然十分坚定地说：你要打人可以，总要讲出个道理来。乡亲们和他一起，据理驳斥族长。族长理屈词穷，又见人们怒目而视，害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拾，不得不释放了毛承文。

一九一〇年春上的一天，毛润之和同学们在私塾外面，看见一些卖开花蚕豆的湘乡小贩，从长沙回来。他问这些人为什么离开长沙，小贩们告诉他，省城里发生了饥民暴动事件。

原来，一九〇九年夏，素称湖南“粮仓”的洞庭湖区各县发大水，一直持续到秋冬之间，大批饥民源源不断地流入长沙附近各县，仅长沙一地就有饥民一万多人。而官绅地主和投机商人却乘机囤积谷米，牟取暴利；外国洋行商人，也勾结反动政府，携带

巨金，到处抢购谷米。这样一来，米价由每升二十六文猛涨到八十文。长沙南门外有个靠卖河水为生的黄某，好不容易积了八十文钱，叫妻子去买一升米，店主说其中混有不通行的钱币数文，拒不出卖。傍晚，她向邻居借了几文通行币，凑足八十文，再去米店时，米价又涨了。她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满含悲愤跳进了湘江。丈夫闻讯，悲痛万分，感到在这世上无法再活下去，也拉着几个快要饿死的孩子，一起投塘自尽了。

这件事在长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面临死亡威胁的饥民们，派出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求按平价粿米，并进行赈济。可是，巡抚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并且胡说什么：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多得很嘛！我就经常吃得饱饱的。米卖什么价钱，那是米店老板的事，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们不交租税，我哪有东西来赈济！饥民们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冲进衙门，砍断旗杆，砸毁照壁和石狮。一夜之间，城厢各处碓房的存米，全被抢劫一空。随后，饥民们又赶走巡抚，焚烧衙门，捣毁或焚烧帝国主义在长沙的领事署、洋行、教堂、趸船、堆栈等。他们怒吼道：“官逼民反，只有烧尽而已。”清政府慌忙调集军队，英、美、日、德、法等帝国主义，也从汉口、上海等地派来十余艘兵舰，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次饥民暴动，把长沙城闹得天翻地覆。但是，在中外反动派的武力镇压下，最后惨遭失败，被杀、被捕的饥民不计其数，很多人被梟首示众。

这个事件，深深地印在毛润之的脑海里。他和同学们议论了好几天，为造反者的悲惨遭遇深感不平，对镇压饥民的反动的统治者无比愤恨。后来他曾经感叹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就在长沙饥民暴动后不久，韶山冲也发生了反叛事件。冲

里的哥老会和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地主到官府告状。那时的官府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地主有钱有势，贿赂了官员，轻而易举地打赢了官司。哥老会败诉后并不屈服，跑到山里建起寨堡进行反抗。反动政府派官兵去攻打，寨堡被攻破，哥老会惨遭失败，反叛者的领袖庞铁匠最后被官府抓去杀了头。当时，地主乡绅都说庞铁匠是“强盗”、“土匪”，而毛润之却非常同情这一次反叛，觉得庞铁匠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年，韶山冲闹饥荒，穷人无米下锅，子啼母哭；富人却囤积谷米，不肯平价卖出。穷人们发起了“吃大户”运动。饥饿的人们成群结队涌进富人家里，打开粮仓，倒出谷子，就地碾米煮饭吃，吃了这家吃那家。家境富裕的毛顺生也受到了冲击。在粮食异常紧张的时候，他仍然把谷米运到城里去卖。有次，运出的谷米被穷苦的乡亲扣留，他气愤极了。后来，家里囤积的粮食又被哥老会抢了，他更是恼火。他的妻子对这种做法也觉得接受不了。而毛润之却站在穷人一边，对父亲毫不同情，说：抢得好！人家没有米嘛！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给年轻的毛润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穷的这样穷，富的那样富？为什么财主、贪官为非作歹得不到惩罚，而勤劳善良的百姓却惨遭欺压和屠杀？反抗的种子开始在他心灵里发芽。

在此期间，一个维新派教员回到了韶山冲，对毛润之的思想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教员名叫李漱清，是一个思想开明、充满爱国热情的人。他常给村里人讲述在外面的许多见闻，尤其喜欢讲述那些爱国志士奔走呼号的动人事迹。他还劝人们不要求神拜佛，主张把庙产用来兴办学校，以便传播科学知识。村里不少人激烈地指责他，毛润之却敬佩他，支持他的许多主张，

并经常向他请教。

随着见闻的不断增加，毛润之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当他看了一本叙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更是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自甲午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展开了投资、夺取租界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大竞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一九〇〇年，英、美、日、俄、德、法、意、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对中国人民进行野蛮的屠戮和疯狂的掠夺。东三省、胶东半岛、长江中下游一带和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分别被沙俄、德、英、法、日等国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痛苦和灾难。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愤怒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①亡国的危险象一个可怕的魔影，笼罩着中国人民的心头。

毛润之打开那本小册子，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句怵目惊心的话：“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他从书本中看到了帝国主义如何侵占中国领土和侵犯中国主权的种种事实，心中如同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想到国土要被瓜分，人民将过殖民地的奴化生活，他忧心如焚，开始意识到：救国救民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

这时，父亲不想再让他上学，决定送他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去当学徒，将来好当自己的帮手。湘潭县城，是毛润之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因此，起初他并不反对，觉得这或许是很有兴味的事。

^① 《列宁全集》第四卷《中国的战争》。

可是不久，表兄告诉他：湘乡有一所新式学堂，注重西方新学，教学方法也是很“维新”的。胸怀大志的毛润之马上被这个学校吸引住了，决意到那里去求学。但是父亲不同意。为了说服父亲，他想了许多办法。有一次，他利用父亲请客的机会，请亲戚和村里有名望的老人帮他劝说。亲友们以润之聪明、会读书为理由，劝他父亲说：如果让润之去上“洋学堂”，将来大有造化，可以赚大钱。父亲终于动了心，同意他到外地去上学。从此，毛润之走向了一个新的天地。

第二章 辛亥革命前后

东 台 山 下

一九一〇年秋，十六岁的毛泽东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书籍，离开韶山，到五十里外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去读书。

东山小学坐落在离城二三里的东岸坪，是一大栋用砖墙围成的园形建筑。背依巍峨苍翠的东台山，面向碧波荡漾的涟水河，左右是平展宽阔的稻田。围墙内，便河环绕，树木青葱，环境幽雅静穆。

东山小学的前身叫东山书院，是个诵古读经的地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进的人们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努力提倡向西方学习。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西方。他们想用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武装中国，使中国逐步富强起来。在这种进步思潮的推动下，“新学”（或称西学）日益发展，各地陆续设立了一些新式学堂。东山书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改成“洋学堂”的。它的教学内容，除经书外，还增设了中外历史、地理，以及外文、音乐等新科目。毛泽东同志对他早年读过的、那些宣扬旧礼教、窒息新思想的“四书”、“五经”，早已厌倦不堪了。现在，他冲破了封建私塾的牢笼，来到这个“新学”读书，就象穿云破雾、展翅翱翔的海燕，心情格外兴奋。

那时到东山小学来读书的，多是些有钱人家的子弟。他们穿绸缎，着轻裘，入学时不是坐轿而来，就是有人护送。毛泽东同志没有华衣美服，仅有一套粗布衣服较为体面，其余的都很破旧了，只不过洗补得非常整洁而已。他没有“读书人”的架子和富家子弟的骄横傲气，说话从容，待人诚恳。一些阔气的学生觉得他“土气”，瞧他不起。也有些人觉得这个学生“特殊”，常常以一种奇异的眼神看着他。

但是，毛泽东同志不久就以他的学识和思想出类拔萃，赢得了同学们的钦佩，博得了教员们的赞赏。还是刚进学校的时候，他参加了入学考试，作文题目是《言志》。当时参加考试的学生，写的大多是尊孔读经、“学而优则仕”之类的内容。毛泽东同志对国弱民穷，忧心忡忡，他联系人民的痛苦，民族的危急，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立志救国救民的革命抱负，一气呵成地写了出来。校长和监考的国文教员，看了这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都很受感动。教员们也都高兴地说：“我们学校取了一名栋梁材。”后来，毛泽东同志又写过几篇论说文，文章立论新颖，气势磅礴，教员浓圈密点，赞扬这些文章“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批给全班同学“传观”。同学们对毛泽东同志更是钦佩，他的文章一出来，都竞相传阅，以至把全文抄下背诵。课余时间，毛泽东同志在校园或围绕学校的便河边漫步，常有一些同学不约而同地走来，同他谈学习体会和读书心得。毛泽东同志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讲给大家听。他那透彻明快的语言，往往使人们听得入神。

在东山小学里，毛泽东同志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争分夺秒地阅读各种各样的新书，对中外的历史、地理书籍尤为爱读。这些新书深深地吸引着他，开阔了他的知识领域。课堂里教授的

知识,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经常自己找书读。学堂后斋有个藏书楼,收藏着许多中外书籍。毛泽东同志到校不久,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如饥似渴地借阅各种书籍。从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和现状的一些书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知道:近半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的铁蹄魔爪任意践踏祖国的大好河山,清朝反动政府腐败无能,广大人民惨遭蹂躏。这是令人何等痛心呵!而从一些中国古代历史书中,看到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人,曾使祖国非常强大,他又是那样精神振奋。从外国史地书中,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知道了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终于获得了胜利,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所有这些历史和现实的景象,总是萦绕在毛泽东同志的脑际,使他救国救民的志向更加明确、坚定。

这期间,毛泽东同志的表兄,送给他一种叙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这些书报,对他产生的影响尤其重大。

康有为是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早期先进人物,是十九世纪末叶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也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面对十九世纪末叶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感到顽固守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为了挽救民族危难,改革现状,他们发动了一场要求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以期通过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改良办法,使国家逐步富强起来。这种“变法图强”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毛泽东同志原来生活在闭塞而偏僻的乡村,对康、梁“变法维新”的主张不了解,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所以,毛泽东同志一接触到康、梁呼吁变法救亡的文章,

便感到十分新鲜，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能背诵出来。康有为和梁启超，一度成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心目中所崇拜的人物。他们关于“君主立宪”的主张，得到了十六岁的毛泽东同志的赞同。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丛报》上就曾写下这样一段批语：今日之中国，应象英、日等国一样，“宪法为人民所制订，君主为人民所推戴”，而不能象“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一样，“法令由君主所制订，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这时，他得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先后死去，宣统（溥仪）皇帝统治中国已有两年。毛泽东同志当时还不反对帝制，只是觉得溥仪三岁登基，这样的娃娃“太岁”，怎么能够治理国家？他希望有贤能的人出来辅佐朝廷进行变革，使国家逐步富强起来。

东山小学有几个爱国的教员，经常给学生讲中国遭受列强欺侮，从而一天天贫弱的时事。其中有个日本留学生，头上拖着一根假辫子，许多同学都讥称他为“假洋鬼子”。毛泽东同志却非常爱听他讲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情况。“假洋鬼子”教音乐和英文，他教过一支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这支歌是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庆祝胜利时唱的。毛泽东同志从歌词中，和通过“假洋鬼子”的介绍，感觉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骄傲，同时，面对中国的贫穷和落后，更加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

有一天，毛泽东同志从同学肖子暉那里借到一本书，叫做《世界英雄豪杰传》。这本书，记叙了近代西方一些为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强大作过贡献的杰出人物。毛泽东同志很喜欢这本书，很快就读完了。还书时，他抱歉地对肖子暉说：对不起，我把你的书弄脏了！肖子暉打开一看，书上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而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德大帝等人的传记。原

来，毛泽东同志读着这本书，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十分钦佩，同时盼望中国能有类似的人物来拯救民族危亡。读着读着，便情不自禁地在书上圈点起来了。肖子暉一页一页地翻着，看着书上的圈圈点点，不仅毫无责怪之意，反而称赞不已。这时，毛泽东同志对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越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过了不久，毛泽东同志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子任”，意思是决心以救国救民为自己的崇高责任。后来，毛泽东同志曾用这个名字发表文章，直到在延安时，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同学写信，还用过它，以勉励他们为拯救民族的灾难而共同努力。

救国救民，是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立下的崇高志向。为了实现这个志向，在东山小学学习期间，他除了勤奋求学以外，时常在黄昏的时候，与三、五同学一起，讨论时事，谈吐理想，抒发自己盼望祖国迅速富强起来的迫切心情，激励同学们为国家为民族贡献力量；有时，毛泽东同志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攀登到东台山顶，独立苍茫，极目寰宇。眼前的七级宝塔，高耸入云，棵棵劲松，迎风傲立，万里河山，寥廓无际。这一切，不禁使他激情满怀。祖国啊！祖国，究竟怎样才能使你摆脱深重的苦难？怎样才能使你走向富强？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决定到政治脉搏更敏感、思想文化更活跃的长沙去学习。

第一次发表政见

毛泽东同志在东山小学只读了半年书。一九一一年春天，

经这个小学一位教员的介绍，他来到长沙，考取了湘乡驻省中学堂。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到繁华的省城长沙，心里非常高兴。城里的许多东西，他从来没有见过。工厂的烟囱喷吐着缕缕浓烟，巨大的火车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尖叫，大小船只在湘江中穿梭般地来来往往，夜幕降临时，电灯又是那样的晃眼，……这一切，对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毛泽东同志来说，自然都是新鲜的。可是，转瞬之间，新鲜的感觉就被忧虑的情绪所代替了。原来，毛泽东同志又发现了城市的另一番景象：街上人声嘈杂，人力车夫，骨瘦如柴，拖着“东洋车”艰难地奔跑，而车上坐着的是肥头大耳的官吏、富人；衣衫褴褛的破产农民，拖儿带女，沿门乞讨；身着奇装怪服的洋人，在街上游来荡去；商店里摆满了五花八门的洋货；挂着“米字旗”、“星条旗”、“太阳旗”的外国商船，在湘江里横冲直撞；江岸上栉比鳞次的茅棚里，时时传出撕裂人心的哭声……这些不合理的现象，犹如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毛泽东同志的心上，使他再也没有心思去欣赏省城景色，而只觉得透不过气来。

毛泽东同志来到长沙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长沙，这个地处南北要冲、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新旧思想的斗争，素来非常尖锐。十九世纪末，这里就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汇集的一个中心。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维新派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①，曾在这里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一

^①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著有《仁学》一书，主张打破一切传统束缚，猛烈抨击封建宗法思想的“三纲”、“五常”，对腐败的清朝政府尤切齿痛恨。但他走的却是改良主义道路。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慈禧太后杀害，时年仅三十三岁。唐才常，湖南浏阳人。曾与谭嗣同一起办时务学堂，编辑《湘学报》、《湘报》，宣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一九〇〇年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组织自立军起义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遇害。时年三十三岁。著有《觉颠冥斋内言》。

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阶段的高潮时期,长沙又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反清宣传、从事反清斗争最富有朝气的地方。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中,许多重要领导骨干,如黄兴、刘揆一、谭人凤等,都是湖南人。当时他们在长沙秘密地从事反清斗争,积极开展反清宣传。一场反清斗争的革命大风暴正在酝酿。

毛泽东同志置身于这个环境里,很快地就感受到了这种革命气息。他一面刻苦读书看报,一面留心观察社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清宣传,对他有着强烈的号召力。当他第一次读到由同盟会会员主办的《民立报》时,立即被它激烈锋利的反清言论所吸引,随后,他便成了《民立报》最热心的读者。

革命不断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积极发动武装起义,企图一举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从一九〇六年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发端,到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发动的武装起义,多达十余次。一天,毛泽东同志从《民立报》上看到了一则惊人的消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成员黄兴,在广州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有不少革命党人英勇殉难,黄兴也负了伤。起义失败后,广州市民收殓了七十二位烈士的遗体,安葬在黄花岗,这就是有名的“黄花岗之役”。革命党人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同志;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使他无比愤慨。

激烈的斗争局势,使毛泽东同志对政治更加关切。这时候,他得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纲领。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的基本目标是:“驱除鞑虏(按:指清朝王室),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不仅明确地提出要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而且要铲除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这比当时简单的反满复汉思想和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毛泽东同志仔细地研究了纲领后，敏锐地感到国家正处在革命的前夜，异常兴奋。他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贴在湘乡驻省中学堂的墙壁上，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在这篇文章里，他表达了对祖国兴亡的深切关心，痛斥了清王朝统治的黑暗和残暴，并且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推翻腐朽透顶的清王朝，组织新政府，立即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任政府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文章贴出去以后，立即在全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热血青年受到鼓舞，反清情绪急剧高涨。这时的毛泽东同志，虽然并不十分明了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和孙中山的主张的区别，还没有放弃对康、梁的景仰，只是认为讲维新、干革命的人们，应该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独裁。但是，他把孙中山列在理想中的新政府的第一位，多少可以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康、梁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了。就这样，十七岁的毛泽东同志，迅速地由一个不反对帝制的人，转变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了。

全国各地反清情绪不断高涨。这年的五月，清朝政府倒行逆施，又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一手向地方收回铁路主权，另一手又将铁路主权作为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大借外债。这样做的结果，铁路的主权，不可避免地要被帝国主义攫去。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的人民，纷纷抗税、罢课、罢市、罢工，开展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湘乡驻省中学堂的学生，也非常气愤。他们以剪辫子的手段，来表示反抗清朝政府。

在当时，男人留辫子，是清朝皇帝统治的象征。剪辫子还是蓄辫子，被人们看作是对皇帝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同志和进步

同学，为了表示反对清王朝的决心，鄙夷地讥称长辫子为“猪尾巴”。他们提议，坚决把头上的辫子剪掉。一个星期天，毛泽东同志和另外一个同学，带头剪掉了辫子。可是，其余十多个原先同意剪辫子的同学，这时忽然犹豫起来，迟迟不肯动手。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思想动摇的一种表现。搞革命就要有决心，有勇气；剪掉辫子是有决心的一种表示，应该坚决、果断，不应该只说不做。于是，他和那个已经剪了辫子的同学一起，一面鼓励那些还在犹豫的同学与清王朝彻底决裂；一面以要遵守“诺言”为理由，采取“强行”的办法，把他们的辫子统统剪掉了。

围绕剪辫子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还同他的一位朋友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辩论。那个朋友是法政学堂的学生，他那条长辫子，从家里拖到学校里，而且还准备继续拖下去，以示对清王朝的忠诚。他从宣传旧礼教的《孝经》上，搬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封建教条，对剪辫子的革命行动进行诋毁。毛泽东同志和一些反对蓄辫子的同学，针锋相对地驳斥说：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不敢毁伤，那你指甲长了剪不剪？胡子长了剃不剃？并尖锐地指出：男人蓄辫子，是清王朝统治的标志，是保皇派的象征。清王朝统治者腐败无能，弄得祖国风雨飘摇，人民苦难深重，全国人民早就迫切要求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剪掉辫子，表示推翻清王朝的决心，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是进步的表现。那些散发腐臭气的封建教条，应该彻底打倒！尖锐而雄辩的话语，象决堤的河水，滔滔不绝，势不可当，那个法政学堂的学生被驳得无词以对，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几个月前，毛泽东同志还把剪了辫子的人称为“假洋鬼子”，而现在自己也一跃成为坚决主张取消辫子的人了。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改变着人的观点，这个力量真大啊！

参加革命军

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使清王朝四面楚歌。正当清政府手忙脚乱，应付保路运动的时候，武汉三镇响起了革命的枪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了。武昌起义的胜利，震动了全国。缺口一经打开，长期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热情，立即迅猛地迸发出来。许多地区的革命党人，都发动新军^①和会党起义响应，湖南就是第一个起来响应的省份。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的政治斗争变得很激烈。反动巡抚余诚格，害怕革命的火种蔓延及湖南，马上调集军队，宣布戒严。而湖南革命党人的活动，也更加紧张起来。他们有的去策动新军反正，有的到各团体、学校鼓动反清。有一天，湖北革命军的一位代表，到湘乡驻省中学堂报告武昌起义的情况，鼓动反对清朝政府。人们全神贯注地谛听着，会场里格外安静。激动人心的演讲，使毛泽东同志异常兴奋。他认为，全国人民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政府的愿望，不久就可能实现，对于这个革命，决不能袖手旁观，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为它贡献力量。当时，清朝政府还在作垂死挣扎，派遣军队，围攻武汉，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毛泽东同志意识到，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斗争，迫切需要有更多的人站到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去。于是，他决定投笔从戎，到武汉参加革命军，当兵打仗去！

^① 新军是清朝末年编练的“新建陆军”。湖南新军编制为二十五混成协，受革命思想影响较深，在湖南革命党人陈作新等人发动下，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在长沙起义。

几天之后，毛泽东同志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些钱，准备动身去武汉。他听说武汉街道很潮湿，必须穿雨鞋，就决定到一个在新军中干事的朋友那里去借一双。这支军队驻扎在长沙城外，他出了城后，半路上看到士兵们正在向城里进发。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已经策动新军举行反清起义。在城内起义者的配合下，新军很快攻下了城门。当毛泽东同志迅速返回的时候，城门已被工人占领。他在一个工人的帮助下，进了城，立即爬到一个高地方去“观战”，一直看到新军攻占了衙门，才回学校。毛泽东同志深深地为革命军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所感动。

十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湖南起义的当天，湖南都督府组织起来了。新政府设在以前的省咨议局，焦达峰、陈作新当了正、副都督，宣布派遣新军援助武汉抗击清军。焦、陈有旺盛的革命斗志，但对混入革命阵营的立宪派则毫无警惕，以致让立宪派头子谭延闿当了参议院院长。立宪派是与封建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上层资产阶级和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的目的本来是要在现存制度内部寻求点改革，即走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道路。他们之所以在革命大风暴时期参加革命，只不过是避免与清朝统治者同遭覆舟之命运而进行的政治投机而已。谭延闿当上参议院院长以后，一方面竭力鼓吹所谓“文明革命”，以“维护秩序，保全治安”为借口，反对镇压反革命官绅；一方面暗地进行政变的阴谋活动，联络一批反动军官，准备伺机从革命党人手中把政权夺过来。没过几天，当毛泽东同志去拜访一位朋友的时候，就在街上看到了焦、陈的尸首倒在血泊之中。原来，谭延闿发动了有组织的政变，阴谋杀害了焦达峰和陈作新。

焦、陈被暗杀，激起了广大群众的革命义愤。踩着革命者的

血迹登上都督宝座的谭延闿，对此也不能不有所考虑。他一方面将惨杀焦、陈的罪行推到无法追究的“乱兵”身上，假惺惺地表示要厚殓焦、陈，并为他们铸造铜像，以平息民愤；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焦、陈所属军队“叛变”，以支援武汉战事的名义，将他们进行整编，派往湖北。

湖南政局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同志当兵打仗的决心。他更加坚定地认为，干革命，不是口头上说说就行的，必须有扎扎实实的革命行动，有为革命付出崇高代价的勇敢精神，才能取得推翻清王朝的最后胜利。这时候，湖南有许多学生纷纷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成。毛泽东同志不喜欢学生军，决定参加正规军。但他改变了原来去武汉当兵的打算，就在长沙参加革命军，当了一名普通的列兵。

进入新兵连以后，毛泽东同志为了作好支援武汉的准备，练好到前线打仗的本领，对出操、上课都非常认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很快地掌握了军队里的一些基本训练课目。毛泽东同志曾经回忆说：我们新兵连，后来虽然没有开到武汉去打仗，我却受到了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

在兵营里，毛泽东同志和营长、士兵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新兵连的士兵，大部份是出身贫苦的劳动人民，有农民，有挖煤工人，也有铁匠、木匠等手工业工人。毛泽东同志喜爱他们忠厚朴实的品质，高兴和他们接近，经常同他们拉家常，谈生活。士兵们都很尊重毛泽东同志，钦佩他的博学和多才，有事就找他帮忙。有些士兵接了家信不会认，想回信不会写，毛泽东同志就耐心地念给他们听，代他们写。同时，还经常给他们念报纸，讲时事，引导他们关心祖国的前途。毛泽东同志回忆这段生活时说：从书报中，我进一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和国内外发生的重

大事件,所以我能够满足士兵们的要求,为他们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增强他们对推翻清王朝的信心。士兵们都感到毛泽东同志是个热心、诚恳和肯帮助别人的青年。一个矿工出身的士兵和一个铁匠出身的士兵,不久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毛泽东同志继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美德和不断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那时军队里的饷银是每月七元钱。毛泽东同志从不乱花一文,除了花二、三元钱吃饭和买水之外,其余的钱,几乎都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每天操练或值班之后,他就坐下来仔细地阅读书报,联系社会实际,研究和思考政治问题。

辛亥革命时,中国的思想界,一时颇为解放,报刊宣传也很活跃,有新闻、政论、宣言,还有介绍世界各种新思想的文章,内容十分丰富。有一天,毛泽东同志从报纸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他虽然不明了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但觉得很有意思,便立即和士兵们讨论起来。随后,他又读了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原理的小册子,便热心地写信告诉老同学,和他们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当时,对于社会主义的介绍,是少得可怜的,宣传的内容也是比较混乱的。在宣传和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机,不少人是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去曲解社会主义的。如江亢虎的社会党,虽然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并不懂得社会主义为何物,他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社会改良主义而已。但是,这些非常肤浅、甚至有错误的文章和小册子,对当时的毛泽东同志来说,却是非常难得的。他以很大的兴趣和别人研究讨论。对新鲜事物的如此敏感和追求,这是青年的毛泽东同志的一个特点。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

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暴露出来了。他们害怕触犯帝国主义,害怕工农参加革命。他们声称,不论什么人,只要反对清朝,拥护共和,都可引为同志。这样,一些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便乘机混进了各地新建立的政权中。

在革命还未定局,清王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的情况下,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已经在积极策划篡夺革命胜利果实。他一面用革命吓唬清朝廷,用“逼宫”的办法迫使清朝皇帝“让位”;一面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诱使革命党人接受他的“和平建议”,承认他的领导地位。许多地区的人民起来反对袁世凯。人们都说,湖南免不了要爆发第二次战争。可是,当湖南人民正要开始行动的时候,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妥协让步,主张在南京成立的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在北京成立的以袁世凯为首领的临时政府“议和”,实行中国“统一”。不久,孙中山和袁世凯议和成功,南北统一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七年的清王朝被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结束了。但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也随之解散,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就以这样的结局而告终。

这时,毛泽东同志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退出军队,回到学习生活中去。一九一二年春,他谢绝了军队中一些连排长们的挽留,离开兵营,重新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活。

图书馆的自学生活

辛亥革命后,湖南的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实业、法政、商业等专门学校相继设立。这些学校以报纸为媒介,吸引新的学生。毛泽东同志离开兵营之后,希望很快就能继续读书。他开始留

心报纸上各种各样的招生广告,准备投考学校。

当时,他对学校的好坏并没有特定的评判标准,对自己到底该进什么学校也无主见。起先,他打算投考警政学校,当看到一个肥皂制造学校的招生广告后,便改变了主意。这个学校不收学费,供给膳食,还稍有津贴。而更吸引和打动人的,是它说了许多关于制造肥皂如何对社会有利、如何富国利民的话。于是,毛泽东同志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专家。这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却竭力催促他报考法政学校。那个学校也有一则诱人的广告,它许诺在三年内学完关于法律知识的课程,并且保证学生毕业以后,都可以立即当一名法官。毛泽东同志又向往着将来能成为一名清廉的法官,他马上给家里写信,请求邮寄学费来。当他正在等候父亲的回答时,另外一个朋友又向他建议,说现在国家正处在“经济战争”中,此时最需要的人材是经济学家。这个建议,打动了毛泽东同志。他又报考了商业学校,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在商业学校里,毛泽东同志只住了一个月。因为这个学校很多课程都是用英语讲授,而他的英语水平不高,更糟糕的是这个学校竟没有专门的英语教员,他觉得这种局面很讨厌,于是退学了。最后,他以第一名考取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①。就这样,年轻的毛泽东同志,为了继续求学,曾先后缴纳过五、六次报名费。他对各类学校所作的选择,主要不是为着个人的前途,而是为了学习和掌握救国的本领,这同一些浑浑噩噩、意志消沉,或置国家前途于脑后,专谋个人“发迹”的青年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毛泽东同志进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以后,发觉这里课程

^① 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一九一二年二月创办,同年下半年改为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

太繁杂，校规也使人反感，因而不大喜欢这个学校。这时，一位国文教员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他读了以后，觉得很有收获。他联想到在韶山冲、东山小学、湘乡驻省中学堂和兵营里自学的情况，便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自己看书，自己研究，或许会比读现在这种刻板的课程更有益些。于是，学期结束以后，他便退出了高级中学，在新安巷湘乡会馆暂时居住下来，开始了在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活。

湖南图书馆，在离新安巷大约三里路的定王台。它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丰富，楼上是藏书房，楼下是阅览室。毛泽东同志初到图书馆时，看到各种中外书籍，琳琅满目，有许多书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真是又惊又喜，不知从哪里读起。他下定决心，尽量多读一些书。这时，图书馆刚开办不久，去读书的人也不多。每天一开门，毛泽东同志总是第一个走进馆里来，借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读。图书馆关门时，他又是最最后一个离开。只在中午的时候，他才休息片刻，出去买两块糕饼当午餐。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毛泽东同志日复一日地坚持到图书馆去读书。在北风怒号、大雪纷飞的严寒季节，坐久了脚冻得发痛，毛泽东同志除了活动活动两脚，仍然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书本上。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他贪婪地读，拚命地读。每读一本书，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后来，毛泽东同志回忆这段自学生活时，饶有风趣地说：那时，就象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拚命地吃！

浩瀚的海洋，源自涓涓细流；渊博的知识，在于点滴积累。毛泽东同志看的书，数量既多，种类也广，而他感到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社会科学著作。他认真地学习和研究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

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以及世界地理、历史书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这些书,大多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文化是对立的。例如,《天演论》阐发“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规律,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观点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作者用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是错误的,但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译者严复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场出发,把这本书翻译过来,呼吁“自强保种”,改革现状,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影响。年轻的毛泽东同志博览群书,并联系社会实际,比较、分析、研究、思考,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更加丰富了自己的头脑,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不断提高,思想境界也越来越宽广。

图书馆的自学生活,是毛泽东同志学习生活中最可纪念的一页。他曾经诙谐地把这段时间称之为“自我教育期间”。在这短暂的半年中,毛泽东同志获得的异乎寻常的丰收,不仅在于读了很多新书,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思想认识,进一步确定了为人民解除痛苦的奋斗目标。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张世界大地图。毛泽东同志过去只看过中国地图,世界地图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每天走到世界大地图前,总要停下来,仔细地看一看。他久久地凝视着地图,联想着社会的黑暗,思虑着人民的痛苦,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感到青年一代的责任无比重大!当时的情景,在毛泽东同志记忆的长河中,是永远鲜明、不可磨灭的。四十个寒暑后的一九五一年秋天,几个正在北京学习的湖南老同学去看望他,谈起他们青年时代在长沙学习的情景时,毛泽东同志十分兴奋,他

说：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

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①

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呵！正因为有了这样宽阔的胸怀，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坚信世界一定会起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会过幸福的生活，并决心为之奋斗终生。

怎样实现这种抱负呢？毛泽东同志开始了更加艰苦的探索 and 追求。

^① 转引自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一九五八年《新苗》第九期。

第三章 第一师范的峥嵘岁月

刻苦地批判地学习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图书馆自修了半年。正当他获益甚多、兴趣正浓的时候，忽然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父亲认为他既不谋职业，又不进学校，是不务正业，不肯供给他费用了；二是他寄居的湘乡会馆，已被军队占用，使他失去了栖身之所。毛泽东同志只好决定继续投考学校。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则招生广告吸引了他。广告宣传“教育为立国之本”，又说学校不收学费，膳食费也很低，毕业后就可以担任教师。他想，从事教育工作，能够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唤起人民的觉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学校收费很少，可以解决自己眼前的困难，于是决定报考。一九一三年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始业，一师是秋季始业，因此，毛泽东同志多读了半年，直到一九一八年暑期才毕业。

第一师范的前身，原来是南宋理学家张栻^①讲学的城南书院。清朝末年，这里办起了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改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改名后，第一师范的《校章》上明

^① 张栻：南宋人，号南轩，居衡阳。他提倡孔孟儒学，从事于讲学授徒，著有《论语解》、《孟子说》等等。

学习条件虽差，仍然学得很好。我们现在有房屋住，有教师讲课，已具备了学习的基本条件，就看我们自己如何努力了。假如一定要等到学习条件十分完善，才去认真学习，那就会白白地糟蹋最宝贵的时间。

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更是抓紧时间，刻苦学习。清晨，同学们还未起床，他便借着熹微的晨光，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课外时间，他或者在自习室看书，或者到学校后山的君子亭学习，间或有意识地到喧闹的地方去练习闹中求静，静中求学。有一次，他拿着书本到最热闹的南门口去看，任凭人来人往，声音嘈杂，他只顾自己看书，时而默念，时而朗读，专心致志，旁若无人。夜深人静，同学们都已进入梦乡，他还在走廊上或茶炉室的灯光下看书。有段时间，他自备一盏小灯，下面用一节竹筒垫起，坐在床上看书。求知的欲望，常常使他不顾疲劳，忘记了睡眠。

当时，第一师范的课程非常繁杂，有近二十门学科，毛泽东同志把它比作一个“杂货摊”。繁杂的课程，与他追求真理的目的发生了冲突。他觉得在这样的学校里，长此以往，宝贵的时间必将白白地流逝。他为此而痛心，曾几次想退学。有一次，甚至已经走到了校长室的门口，他转念一想，读书总得有个地方，于是又退了回来。当时，社会上流行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只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救国，就只有革命。因此毛泽东同志根据寻求革命真理的需要，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哲学、史地、文学等社会科学的研读上，对于其他的课程，不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例如上哲学课，一般同学因听不懂，多昏昏欲睡；毛泽东同志则用心听讲，认真作笔记，深入思考。课

余和自修时间,还在孜孜不倦地钻研。他对文学也非常爱好,曾精心研读过《昌黎先生集》^①、《昭明文选》^②以及《诗经》^③、《楚辞》^④等,对屈原的《离骚》、《九歌》尤为喜爱,曾十分工整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因而无论是古文,还是浅近文言文,都作得很好。他还爱好诗词,但不常作,偶一下笔,即成佳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就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所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抒发了一个革命青年的伟大志向和广阔胸怀,曾被同学们广泛传诵着。

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毛泽东同志想方设法找书看。他常到城里的书店和旧书铺去,看到合适的书,就买下来。第一师范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更是他常去的地方。图书馆里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许多他都借阅过。尤其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⑤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⑥,他读得十分仔细。由于借书频繁,他与图书管理员熊光楚成了好朋友。

在学习上,毛泽东同志还养成了好问的习惯。他常对同学说,我们称某人有学问,是指他好学好问,学与问是不能分开的,只有好学好问的人,才可能有学问。在学习中,他不去探究无关

-
- ① 《昌黎先生集》:吕黎先生即唐代著名的文章家韩愈。他的文章,融会各家风格,自成一家,世称韩文。
 - ② 《昭明文选》:南北朝梁昭明太子肖统所编,选录秦汉以迄当时的诗文,凡六十卷,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选。
 - ③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 ④ 《楚辞》:汉朝人刘向集屈原、宋玉所作诸赋而成。
 - ⑤ 司马光:北宋人,官至宰相时,受命撰中国历代编年史,自战国写至五代,即《资治通鉴》。
 - ⑥ 顾祖禹:明朝末年人,精通史地。明亡后,隐居山中,专心著述。所著《读史方輿纪要》,详载中国地域形势,山川险夷,及古今战守、攻取、成败得失的事迹。

重要的奇闻轶事，而喜欢和同学们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切磋琢磨，互资裨益。也常列出学习上的疑难和社会改造的问题，向老师请教。

毛泽东同志最敬爱的老师是杨昌济先生。杨先生曾留学日本、英国达九年之久。他与当时一般争学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的留学生不同，在外国，专心研究教育学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回国时，正值辛亥革命发生，谭延闿拉他当教育司长，他不应允。那时候，一般到西洋“镀金”、到东洋“镀银”归来的留学生，大多钻营做官，竞选议员，或办实业，最“倒霉”的也要当个大学教授。可是杨先生却选择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当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杨先生写下的这幅对联，表明了他对军阀当道的现实是极为不满的，唯一的愿望，就是从教育入手，培养人材，挽救国家的危亡。杨先生教授伦理学，是一个道德高尚、性格坚强的人。他坚信自己的伦理学，经常教育学生要做一个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有益于社会的人。由于杨先生在哲学上是一个唯心主义者，难免有过于夸大主观作用的缺点；但是他的某些主张，特别是他追求新思想和躬行实践的精神，对当时受教的青年，还是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有理想、有抱负的毛泽东同志，很崇仰杨昌济先生的学问和品德。他和蔡和森、陈章甫^①、张昆弟^②等志同道合的同学，组

① 陈章甫，湖南浏阳人，新民学会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三〇年从上海去湘西贺龙部队工作，途中被捕，在长沙英勇就义。

② 张昆弟，湖南益阳人，新民学会会员，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曾参加领导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一九三〇年于洪湖地区英勇牺牲。

织了一个哲学小组，邀请杨先生担任指导。每逢星期天，他们常去杨先生家里，或一起讨论治学、做人的方法，或纵谈天下大事。好几个假期，当同学们纷纷回家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便到杨先生家里去自学，随时向他请教。

杨先生非常喜欢这批有为的青年，特别是对毛泽东、蔡和森两同志，更是十分钟爱。他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出身农家，“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毛泽东同志曾写过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先生非常赞赏，给了一百分。杨先生的改造国家、服务社会、不为个人打算的崇高思想，专心钻研、食必求化的学习方法，有远谋、有毅力、注重实践的办事作风和谨严刻苦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学生和他的女儿杨开慧，都有着非常有益的影响。

在教师中，徐特立^①、袁仲谦、黎锦熙^②、王季范^③、方维夏^④等进步人士，对毛泽东同志的学业和思想上的帮助也是较大的。毛泽东同志非常尊敬这些老师，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在

① 徐特立：湖南长沙县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在他六十寿辰时，毛主席写信祝贺，说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徐特立同志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逝世，终年九十一岁。

② 黎锦熙：湖南湘潭人，早年就参加了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对我国现代汉语语法、文字改革和词典编纂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七八年三月去世。

③ 王季范：湖南湘乡人，解放前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七二年七月去世。

④ 方维夏：湖南平江人，早年留学日本，为“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界革新人士。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伐军第二军的师党代表、中央民主政府总务厅主任等职，一九三五年在湘赣边区工作时牺牲。

几年的学习中，他与这些进步教师有着密切的往来。他常将自己写的读书心得和日记送给他们看，征求关于读书和研究学问的意见。黎锦熙在自己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一九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晚，在泽东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陈）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一九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阅泽东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作课堂笔记，写读书心得，是毛泽东同志多年的习惯。凡是在思想上和学习上对他有帮助的，他都认真地记录下来。几年的时间，这类笔记、日记便积累了一大网篮，毛泽东同志把它送回韶山保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族人将它烧毁了。现在仅存一本字体十分工整的《讲堂录》，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一三年或一九一四年的课堂笔记。根据对原件的研究、分析，《讲堂录》中记载的治学和做人的道理，虽是老师所讲，但已经过了毛泽东同志的认真选择和整理。它强调一个人“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反对懒惰，说“懒惰为万恶之渊藪”；主张办事精细果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提倡务实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等。此外，《讲堂录》还记下了一些对历史、政局和人物的评论，以及自然科学知识。这些珍贵的资料，记录了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刻苦学习的精神。

一九一七年夏天，肖子升^①订了一个学习笔记本，取名“一切入一”，请毛泽东同志在本子的扉页上题词。毛泽东同志就此机会，精辟而深刻地论述了学习必须从一点一滴开始的道理。

^① 肖子升，湖南湘乡人，第一师范第二班学生，新民学会会员，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奔走在国民党官僚政客门下，当过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次长。一九三四年在故宫博物馆任监守时，盗卖文物，携款潜逃。

他写道：“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他还认为：“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①者，区以别矣。”台积而高，学积而博，是不是到顶了呢？不！“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道，在有条理。”“有以条理之，挈其瓌宝而绝其缁磷^②焉，又持之以久远，不中途而辍。诚若是，则固百丈之台之基矣！”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深刻的论述，无疑是他学习方面的丰富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时事，十分认真地阅读报章杂志。他认为，要改造国家，改造社会，必须了解社会的现状，了解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当时长沙的《公言》杂志，以很大篇幅刊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息，毛泽东同志是每期必读的；还有一种《甲寅》杂志，其中刊载了不少反对帝制的文章，他也常到朋友那

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时事，十分认真地阅读报章杂志。他认为，要改造国家，改造社会，必须了解社会的现状，了解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当时长沙的《公言》杂志，以很大篇幅刊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息，毛泽东同志是每期必读的；还有一种《甲寅》杂志，其中刊载了不少反对帝制的文章，他也常到朋友那

① 姝(shū 殊)美好的意思。姝姝自悦,即自我欣赏。

② 瓌(guī 闺),同瑰;缁(zī 姿),黑色。挈其瓌宝而绝其缁磷,意思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里借阅。最能帮助他了解国内外大事的，还是学校阅报室的每日报纸。

第一师范的阅报室里，湖南、上海、北京等地有名的报纸，每天都安置在报架上，去看报的同学也不少，而每天必到，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的，却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他看报很仔细、认真，有时把地图带去，看看报纸，又查查地图；有时把文章中提到的世界各国的城市、山岳、河流、港口等记下来，然后再查出英文名称。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了解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说：“第一师范的同学都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白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他不见，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见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班上同学沿着铁路散步，大家看到麓山夕照，湘水归帆，心神轻松开朗。就在这时，他每每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因此，同学们都赞誉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上海《民国日报》在十一月十日，湖南《大公报》在十一月十七日先后作了报道。尽管资产阶级的报纸站在反动立场上，歪曲事实真相，诋毁这次革命，但是，俄国的工农兵夺取了政权这一铁的事实，是无论如何掩盖不了的。毛泽东同志从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出了这场革命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以非常兴奋的心情，和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毛泽东同志阅读报纸，从不间断。为了便于随时阅读，他宁

可别的东西不买或少买，每月紧打紧算，省出一块钱来，自己订了一份报纸。后来他回忆说：我在第一师范学校的几年中，总共用了一百六十块钱，在这个数目中，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每月订一份报纸，就是一块钱。我还常常在书摊上买些书和杂志。父亲责骂我这是浪费，把钱白白地花在废纸上头。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就是在走上井冈山以前，我从没有停止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每日报纸。

在学习上，毛泽东同志善于汲取他人的长处，从不放过获得新知识的机会。学校有个国文教员，课教得不好，同学们都不满意。毛泽东同志了解到这位教员曾经办过报，便常去找他讨论时事问题，并对同学们解释说，我们看一个人，要多看他的长处，只有虚心地向人家学习长处，才能弥补自己的不足。那时长沙常有外省的学者名流前来讲学，毛泽东同志总是前去拜访，虚心求教，并和他们建立通信联系。长沙小吴门附近的船山学社，也是毛泽东同志常去的地方。船山学社于一九一五年开办，是湖南一些文人学士为纪念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船山^①、专门讲演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场所。袁世凯称帝时，这里是少有的能够公开听到反袁呼声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常邀集一些同学，到这里来听讲。当时，他正专心研究王船山的学说，这些讲演，对他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出版了。经杨昌济先生的介绍，毛泽东同志成了它最热心的读者。

^① 王船山：名夫之，湖南衡阳人。抗清失败后，隐居衡阳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政治上反对复古，提倡奋斗精神，在湖南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

《新青年》是当时宣传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刊物。从创刊号起，就鲜明地树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以介绍西欧新思想、批判中国旧思想为职志。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复论证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孔子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尊孔必然导致复辟。他把思想上反对封建礼教与政治上主张民主制度结合起来，猛烈地抨击封建主义。李大钊同志也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他在该刊发表的《青春》等文章，热情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旧学说之图圈”，为中国的“回春再造”而努力。他的那些富有哲理的政论文章，除了贯串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外，还用初步的辩证观点和充沛的革命乐观主义，热情地教育和鼓舞人民。这些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引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他一边读，一边思考，常把文章中的精辟论述，整段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加上自己的见解；也常和朋友们谈论这些文章的观点和问题；还曾将自己的文章送给《新青年》发表^①。

毛泽东同志读了《新青年》之后，思想更加开阔了。陈独秀、李大钊一类先进人物，成了他心目中的崇拜者，康有为、梁启超则早已被他所抛弃。他认为“康似略有本源（按：指哲学、宇宙真理），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杆树立、枝叶扶疏之妙”。^②他觉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思想，较之康、梁的思想进步得多，这种新思想代表了时代的声音，而康、梁的思想则成了时代的阻力。

但是，毛泽东同志绝不满足思想上的这种新收获，他对各种学派都进行艰苦的探讨。他在研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思

^① 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体育之研究》，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

^② 一九一七年八月给黎锦熙的信。

想的同时，对十九世纪末中国民主主义的思想家谭嗣同的《仁学》，以及十八世纪末西方康德^①派的二元论哲学等，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总是加以认真地研究、分析和比较。

毛泽东同志学习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善于独立思考，分析批判，不断地用新的思想批判旧的思想，逐步地丰富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对待古代文化遗产和中西学说，不可不加分析地兼收并蓄，应该有分析，有批判。他常对同学说，古人的话、教师的话和一切学者名流的话，不一定都对。我们读书、看报、上课、听讲演，都要开动脑筋，多想一想，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应该抛弃，囫圇吞枣的办法最要不得。毛泽东同志对徐特立老师提出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办法，非常欣赏，并坚持这样去做。他读过的许多书，几乎是逐段逐句地圈点过，并写上很多批语。当年的一师同学曾回忆说：我们偶然在他的桌上翻开他读过的书来看，见字里行间朱墨纷陈，书头上写满了字体或大或小的评语。有些句子加上浓密圈点，另外一些句子或段落却划上一大杠或一大叉。有的书头上写着“此语颇精”，“言之成理”，“此言甚合吾意”，另外一些书头上却写着“不通”，“荒谬”，“陋儒之说也”，还有写着一大段批语的地方。我们问他：为什么你对一个人的文章，有的那么欣赏，有的那么鄙弃呢？他说，我是这样看的：一个人讲的话，不一定全对，也不一定全不对，何况古今不同时，事理多变化，我们不应该一味迷信古人，也不应该把古人全盘否定。

毛泽东同志这种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态度，从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本书是德国康

^① 康德是十八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鼻祖，他的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想融合唯心论与唯物论，使二者调和。康德在自然科学方面提出天体演化的星云说，表现了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

德派哲学家鲍尔生著的一部带有二元论色彩的伦理学著作。杨昌济先生教授伦理学时，就是以它作课本。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约有十万字。毛泽东同志在书上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这在读书史上，确是一件珍闻。

毛泽东同志对《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绝大部分是阐述自己的伦理观、历史观和世界观，以及对原著的引伸或批判，也有一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赞同语和章、段提要。其中许多地方联系中国的历史，以及“五四”前夜的国事与思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论述了许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重要价值的观点。例如：

重视“个人价值”，强调解放个性。批语写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大矣。”毛泽东同志认为，我国儒家所极力鼓吹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几千年来桎梏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批语还写道：“吾人应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又说：“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

主张涤旧染新，彻底改造国家社会。批语写道：“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无忧也。”那么，如何去进行这种变革呢？毛泽东同志说：“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因此，他主张“时时涤旧，染而新之”。当原书说到社会上存在着阻碍革新、以过去压现在的情况时，毛泽东同志批写道：“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他进一步指出：“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他认为要改造国家社会，必须有革命真理来指导。“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

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毛泽东同志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一些批语，还具有初步唯物论辩证法的观点。

在论及自然界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批语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于)自然。”

在论及人的认识的源泉时，毛泽东同志认为是先有客观存在，而后才有反映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人的知识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得来的。他在批语中写道：“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而后知圣人者生而知之、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之不可信也。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在论及社会变革中乱与治的关系时，批语写道：“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毛泽东同志阅批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在他移居清水塘^①时，被一个同学借去。此后各自东西，不再见面。将近三十年后，这位同学托周世钊先生将这本书带去北京，奉还给毛泽东同志。他高兴地翻阅了自己写在书中的批语，微笑着说：“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

^① 清水塘，在长沙小吴门外，是毛泽东同志创建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在地。一九二一年冬至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同志曾住在这里。

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接着又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①

当时，中国的志士仁人，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大都带有形式主义的偏见。他们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只有西方思想才能救中国，主张中国全盘西化。毛泽东同志反对这种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他在一九一七年八月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对西方文化明确地持批判态度，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少见的。

从上面这些片断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同志为了挽救国家、改造社会是怎样的醉心于对革命真理的探求。当时，很多青年学生也都喜欢谈论理想、志向，有的想当军事家，有的想当教育家，等等。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不能算为立志，只不过是一种模仿和盲从。真要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求得宇宙的真理，作为自己言论行动的准则，立为前进的目标，并尽毕生的力量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叫做立志、有志和真志。所以他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毛泽东同志这种追求真理的宏伟志向，强有力地激励着他刻苦地批判地进行学习。他从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中，甚至从康德派的二元论哲学著作中，接受了一些唯物主义思想。他也读了许多唯心主义的书籍，甚至一度相信过

^① 转引自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一九五八年《新苗》第十期。

唯心主义，但没有最终为它们所俘虏；相反，批判地汲取了其中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因而，获得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的思想水平，超出了当时中国一般的革命知识分子。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传入中国，他就能很快地接受，并且比一般先进知识分子领会得完整和深刻。

顽强地锻炼

毛泽东同志学习上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和清晰的头脑，与他刻苦顽强地锻炼身体是分不开的。在学校里，他是一个以勤奋好学、顽强锻炼而著称的学生。他认为，一个人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丰富的知识，还要有强健的体魄，以便将来担当起改造国家和社会的重任。因此，他主张一个人应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同志一直没有放松过对身体和意志的锻炼。他进行体育锻炼的项目很多，主要有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以及体操和拳术等。他善于利用各种自然条件进行锻炼，又习惯于把自己的各种活动与磨砺意志有机地结合起来。

学校的浴室旁边，有一眼清凉的水井，毛泽东同志常来这里进行冷水浴。每当清晨，东方刚现出鱼肚白，同学们还在酣睡的时候，他即起床，带着罗布浴巾，来到水井旁，用吊桶打上井水，一桶一桶往身上淋，然后用浴巾洗擦全身，擦后又淋，淋了再擦，反复一、二十分钟，直至全身发热发红为止。然后，再作一些简单的运动。他最初试行冷水浴是在夏天，经历秋季，到了冬天，纵然是天空下雪，池水结冰，仍然坚持进行。同学们问他为什么

这样,他说,一来可以锻炼身体,二来可以练习猛烈与不畏。严冬季节,把冰冷的水一桶一桶地向身上淋,没有勇气的人是做不到的。有几个同学曾跟着毛泽东同志进行冷水浴,但都没有象他那样坚持到底。他们对毛泽东同志说,天寒地冻,我们把冷水往身上泼,觉得很难受,你是否也感觉难受呢?毛泽东同志说,最初几次是难受,但下决心突破困难,就习惯成自然了。

毛泽东同志还利用风、雨、太阳等自然条件进行锻炼。夏天烈日当空,他常穿条短裤,站在室外晒太阳,游泳后,也常躺在沙滩上让阳光照射,叫做“日光浴”;冬天寒风凛冽,他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空旷处进行“风浴”;下大雨的时候,他冒雨跑步,进行“雨浴”。这些在一般人看来不可理解的行动,他却进行得那样认真。

第一师范前面的湘江,江宽水深,是游泳的好场所。毛泽东同志经常邀集同学,到湘江中的桔子洲头附近和南湖港一带游泳。由于他从小就喜爱游泳,所以技术好、胆量大、坚持力强。他不但能横渡湘江,还能从猴子石游到相距近十华里的牌楼口去。他也能在别人穿棉衣的天气,在江中游泳。有一次他和罗学瓚等几个同学,不顾北风呼啸,天气寒冷,毅然去江中游泳。罗学瓚同志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即桔子洲头)泅泳,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亦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不过,也发生过危险。有一次,毛泽东同志游泳将要达到对岸时,被大浪冲入木簰下,幸好被一个同学救了出来。解放后,与老同学谈及此事时,他诙谐地说:那次如果不是亏了一个同学搭救,我险些“出了洋”。虽然如此,但他并不象有些人那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坚

到岳麓山，见庙旁露天底下一条长板凳上睡着一个人，头脚都用报纸盖着。游人吵醒了他，他动了一动，翻过身，收拾好报纸，起身就走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同志。原来，山上夏夜蚊子多，他只好用报纸盖着身子睡觉。这种露宿活动，甚至到了下霜的日子，他们还在坚持。

毛泽东同志还爱好长途步行。他说，这种活动，既可以培养身体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又可以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六日，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他刚从农村调查回来不久，又和张昆弟等步行去五十华里外的湘潭县昭山。张昆弟在日记中写道：“早饭后，三人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以来时晚，欲在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树丛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话，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门前，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体育运动的爱好者，而且总结自己的丰富实践，作了理论上的著述，以“二十八画生”^①署

^① 繁体“毛泽东”三字，共二十八画。

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国力茶^①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对国家不重视体育的现象极为忧虑，认为人民体质不坚实，看见兵器都害怕，是不能有效地抵抗外侮的。当时的学校，课程十分繁重，即使那些身体强壮的成年人，也难以负担，何况是没有成年和身体孱弱的学生呢！而当时的学校又不重视体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倭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痠”，以至短命夭折。他列举历史上的事例说，明末清初的颜习斋和他的弟子李刚主，主张文而兼武，他们都能长寿；清代学术大师顾炎武，也爱好运动，到了老年尚能漫游天下。而汉代的大学问家贾谊，很有才华，只活了三十三岁就死去；唐朝初期的文豪王勃，仅活了二十八岁便夭折了。因此，他认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强调进行体育锻炼，以收到“健身卫国之效”。他主张学校对小学生“宜专注意身体之发育”，而把增进知识、培养道德放在第二等位置上；至于中学及中学以上，宜德、智、体“三育并重”，不可偏废。他生动而形象地把身体比喻为“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论证了德、智、体三者的辩证关系。

当时，第一师范虽然也设置了体育课程，但只是徒具形式，不务实际，教师敷衍应付，学生不感兴趣。每周两小时的体操课，不外是走步，操木棒、举哑铃。每天上午十分钟的课间操，也过于死板。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更是冷冷清清。除了少数体育爱好者开展运动外，多数同学都在寝室里谈笑议论。学生的身体被繁重的课程压垮了，有一年，竟病死了七个同学。毛泽东同志对这种状况极为愤慨，在为死者举行追悼会时，他写了一幅挽

^① 茶(nié)：疲倦，精神不振。

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即课间操）。”以此抨击学校当局不重视体育，同时唤起广大同学对体育锻炼的自觉性。

一九一七年下学期至一九一八年上学期，毛泽东同志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实际负责人）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他主要倡导两件事：一是学术研究，一是体育锻炼。这时，学友会设立十五个部，其中属于体育方面的有拳术、剑术、足球、游泳、竞技等八部。以前，各部部长均由教师兼任，大多徒挂空名。毛泽东同志提出改由四、五年级学生担任，教师从旁加以辅导，以便发挥学生的特长，培养他们办事的能力。这个建议得到了校方的同意。鉴于过去各部的活动没有记载，时日一久，无从稽考，毛泽东同志决定各部增设录事（即文书）一人，详细记载本部活动进展情况，以便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

为了把体育活动开展起来，毛泽东同志想了很多办法，提了很多好的建议。由于他办事有方，善于发动和组织群众，终于使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搞得生气勃勃。

针对学校雨天没有运动场，晚上不能开展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倡导大家开展乒乓球运动。《第一师范学友会纪事录》这样记载说：“本会有各种室外运动而缺少室内运动，便于晴朗而不便于风雨，便于日间而不便于夜间。室内运动如打弹子等，本最优美之游戏法，但因房屋缺少不能实行。盖本会之困难有二：一曰经费，一曰房屋，以致诸事不能充分进行。此则关于房屋者也，惟乒乓一事轻而易举，随处设席，无须专室，运动既和疾适度，而置备复易。乃作木架十二个，竹布网十二片，每班各一，由每班一人具名领取，球及拍子自备，指定本会事务室、礼堂、会客室、洋楼上诸处为击球地点。于是乒乓之声一时聒耳，或谓之乒

兵狂云。”

为了给同学们提供更多的运动机会，毛泽东同志还把自己创造的一种“六段运动”介绍给同学们。六段运动集体操、拳击等各种运动之长，涉及手、足、躯干、头部及拳击与跳跃等动作，共六段二十七节。这种运动能够活动全身各种器官，既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又不需要任何器械，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同学们纷纷效法进行。

过去，课余时间，有的同学对于体育锻炼和学术研究，往往只偏重一项，不能二者兼顾；有的对于体育活动，往往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坚持下去。毛泽东同志根据自己的实践，给同学们讲了三点体会：第一要持之以恒，不论春夏秋冬，晴雨风雪，都不要间断；第二要全神贯注；第三要有蛮拙精神。当时，还有一些同学效法杨昌济先生，实行“静坐法”。毛泽东同志对自己最尊敬的老师也是不苟同的。他认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也就是生命在于运动的意思，靠所谓静坐法是不能收到强身之效的。他的见解和行动终于使那些同学开始活跃在运动场上。

在推动学校课余体育活动方面，毛泽东同志不仅发动全校同学参加锻炼，还耐心启发那些热衷于夺锦标、得名次的同学，使他们明确运动的目的。他当年的同学贺果回忆说：“学校将一些爱好球类和田径的同学，组成‘选手队’，一心为了在全省学生运动会上夺锦标，得名次。我们这些人也简直成了运动迷，上课不经心，学习不发奋，光想着比赛。体育运动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谁也没有去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总是耐心地启发诱导我们，他曾对我说，你有锻炼的兴趣，这是可贵的，但不要只偏重一两项，搞畸形发展，还应该懂得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体质，以便有充沛的精力去搞好学习，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大任。”

毛泽东同志由于坚持刻苦顽强的锻炼，体质逐渐强健起来。在陕北时，他曾回忆说：体育锻炼确实对于我有不少的帮助，使我后来在转战南北的行军和长征中，受益不浅。一九五一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他接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又谈到了自己当年在第一师范时锻炼身体的好处。他说：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我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能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大家不是读过《红楼梦》吗？《红楼梦》中两个主角，我看都不太高明。贾宝玉是阔家公子，饮食起居都要丫头照料，自己不肯动手；林黛玉多愁善感，最爱哭泣，只能住在大观园的潇湘馆中，吐血、闹肺病。这样的人，怎么能革命呢？你们办学校，不要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贾宝玉、林黛玉式的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需要坚强的青年，身体和意志都坚强的青年。

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中国正处于动荡的年代。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沙俄等帝国主义继续维持着它们在中国的各种特权。在国内，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妥协，封建军阀取代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南北对峙。各派军阀各以一个帝国主义为靠山，你争我夺，混战不休。湖南地处南北要冲，北洋军阀以湖南为侵占两广的据点，南方军阀以湖南为进据中原的阵地，各派军阀更迭盘踞，战事不断。群众深受

其苦，学生不能安心读书。第一师范靠近铁路和湘江，只要长沙有战事，这里常是驻兵之所。毛泽东同志在校期间，这里就曾三次驻兵：一次是袁世凯的亲信、北洋军阀汤芑铭部下李佑文旅部驻扎；一次是桂系军阀谭浩明部驻扎；一次是皖系军阀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部驻扎。学校经常驻兵，教学受干扰，思想受钳制，教具遭破坏，学生受惊吓。帝国主义入侵和军阀混战带来的兵灾战祸，激起了毛泽东同志对它们的深恶痛绝和对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促使他积极地投入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一九一五年五月，与毛泽东同志交往密切的第一师范学生易咏畦逝世。毛泽东同志既痛良友死得过早，社会上失去了一个人材；更感国家命运艰难，生者责任重大。他悲愤交织，写了一首五言古体长诗，表达悼念之情。诗篇在回忆彼此交往、同窗共学的动人情景之后，很快转到了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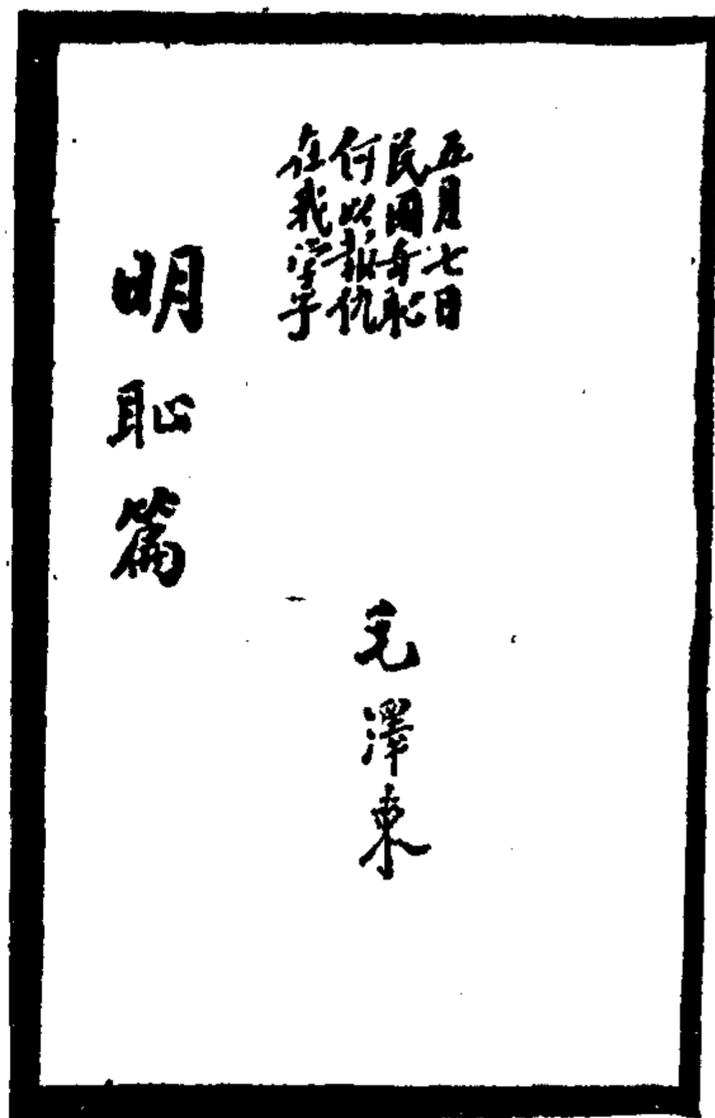
“东海有岛夷，
北山尽仇怨。
涤荡谁氏子？
安得辞浮贱！”

东边隔海相望的岛国日本帝国主义，北边山水相连的沙皇俄国，都是与我们为敌的侵略者，谁来扫荡这些妖魔鬼怪、斩断他们的侵略魔爪呢？就靠我们这一代。我们决不能以为自己出身低下贫贱，就不去担当这救国救民的重任！短短四句诗，饱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抒发了青年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胸怀。

这一年，袁世凯这个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为了实现当皇帝的美梦，肆意媚敌卖国。五月七日，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承认他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①，作为赞助袁世凯称帝的交换条件时，窃国大盗袁世凯竟丧心病狂地甘当儿皇帝，立即予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这一国家的深仇大恨，民族的奇耻大

辱，无比愤慨。他在一本揭露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小册子《明耻篇》的封面上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认为青年学生应该勇敢地站起来，担当洗雪国耻、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

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爬上皇帝宝座，指使他的走狗爪牙，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筹安会”，到处进行“劝进”活动。一犬吠形，



① 二十一条：全文分五部分，前四部分包括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我山东的权利，并增加日本在山东的新权利，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租借、经商以及筑路和开矿的独占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沿海岛屿、港湾概不租借或割让予第三国等；第五部分所列各条要求攫取统治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并欲取得湖北、江西和广东之间的铁路建筑权。袁世凯除对第五部分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予承认。但因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的要求未能实现。

百犬吠声。袁世凯在湖南的走狗督军汤芑铭和劣绅叶德辉等，成立了所谓“筹安分会”。他们一方面禁止所有报刊登载反对复辟帝制的文章，压制一切反袁言论；一方面假借各种名义，上“劝进”书，发“劝进”通电，吹吹打打，煞是热闹。学校里也有少数教师，为袁世凯称帝摇唇鼓舌，大造舆论。进步师生对这种复辟倒退的逆流，极为愤怒，帝制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但有的只是议论议论而已，不敢有公开反对的行动；有的只是反对个别拥护帝制的人，不敢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复辟帝制的总头子袁世凯。毛泽东同志团结广大进步师生，无情地揭露了帝制派劝进复辟的丑恶嘴脸，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还以学友会的名义，收集反袁文章，编印成册，在校内外广为散发，有力地打击了袁世凯及其在湖南的走狗爪牙的嚣张气焰。反动当局发现这个小册子后，十分惊慌。汤芑铭出动大批警察到第一师范搜查，连学生的书籍、行李都搜遍了。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警惕性高，早有准备，反动派连半点“乱党”痕迹也没有找到。

袁世凯在主演复辟帝制的丑剧中，还唱了一段“收揽名士”的插曲，妄图拉拢社会上一些名流学者，为他的复辟倒退装潢门面。毛泽东同志敏锐地看穿了袁世凯“以术愚人”的骗局，恳切呼吁一切有爱国之心的学者文人，不要中了袁世凯的圈套。他听到在北京从事学术研究的黎锦熙先生被拉过去的传说，立即以十分关切的心情写信给他说：“兹有欲为足下言者，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规劝他在复辟之声甚嚣尘上，正义不能伸张的境遇下，不要出头露面，以免误入歧途。后来知道传说不确实，才放下心。

一九一六年六月，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在护国运动

的压力下,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众叛亲离,忧郁死去。欧美帝国主义乘机各自扶植一派军阀,造成了割据混战的局面。第二年,担任国务总理的北洋军阀段祺瑞,为了打击南方势力,加强反动统治,决定不再恢复袁世凯称帝期间被取消了的临时约法^①和国会。孙中山则在广东成立军政府,树起“护法”旗帜,粤、桂军阀也派兵支援,因此爆发了“护法战争”,湖南再度陷入混战之中。

这一年的十一月,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部由湘潭、株洲向北撤退。由于驻长沙的北军傅良佐部早已撤离,而南军未到,长沙城内一时成了“真空”。城内居民惊恐不安,学校里胆小的同学和教员,也都躲在宿舍里不敢出来。王汝贤部不知城内虚实,在第一师范南面的猴子石一带徘徊,不敢贸然进城。这支丧失战斗力的溃军人困马乏,又害怕遭到南军的袭击,惶惶不可终日。有半年正规军事生活经验的毛泽东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便与学校附近的警察所联系,在他们的支持下,将学生志愿军^②分成几组,布防在学校附近的山丘上。时近黄昏,溃军心惊胆战地沿铁路向北移动。待到距布防处不远时,毛泽东同志便叫警察在山头开枪射击,学生志愿军则燃放装在煤油桶内的鞭炮助威,并齐声呐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溃军本来心虚,一经突然袭击,更是惊慌失措,纷纷缴械投降。第二天,由商会发款遣散了溃军。长沙城免去了一场兵灾。事后,全校师

①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孙中山公布了参议院议决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则,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精神。

② 一九一六年秋,第一师范为奉行“军国民教育”,组织学生志愿军,使学生受简单的军事训练。全校编为一个营,下分连、排、班,连长以下职务均由学生担任。

生惊奇地议论着这件事，高兴地赞赏说：毛泽东一身是胆！

毛泽东同志对时局问题非常关注，善于分析问题，抓住事物的本质。一九一六年，日本与沙俄达成协议，相互承认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许多中国人正在为长期丧失东北的领土主权而担忧。忽然传来日本内阁行将改组的消息，于是，有的人就寄希望于日本大隈内阁垮台后，新的当权者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指出：“大隈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我以纵横万里而属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駸駸^①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者)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二十二岁的毛泽东同志，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侵略的事实，认为日本不会因为内阁换人而改变对华政策，确实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他在这里提出的二十年内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非决一死战不可的预见，也完全为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但是，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日本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混同在一起。有个叫白浪滔天的日本民主派人士，是最先支持和帮助辛亥革命的日本人。一九一七年春，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黄兴改葬岳麓山时，他亲临长沙送葬。毛泽东同志和他素不相识，却给他写了一封热情友好的信，高度赞扬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信中说：“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

^① 胡马，指外国侵略军。駸駸(qīn侵)，马走得很快的样子。

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稀闻，古今所未有也。”

青年毛泽东同志的斗争精神，还表现在整个学习生活中。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把斗争看作是人生的幸福，明确认为，要使衰弱的祖国自立图存，“非奋斗不可”！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平时沉默寡言，说话从容，走路稳健，待人谦和的毛泽东同志，遇到无理的事情，总是绝不容忍，坚决抵制，奋起斗争。

国文教员袁仲谦，是个前清举人，教学很认真。因胡须垂胸，同学们称他袁大胡子。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是“梁启超式”的“新闻记者”的手法，竭力劝毛泽东同志学习韩愈的文风。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同志买了一册《昌黎先生集》，专心研读，并能背诵其中的许多文章。袁大胡子对此非常赏识，他们常在一起交谈。毛泽东同志能写一手好古文，得袁的帮助不小。但是毛泽东同志对袁的专制作风，却是毫不迁就。有一次，一位工友做错了事，袁大胡子破口大骂。毛泽东同志从旁经过，深为不平，大声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有事可以好好说嘛！骂人就没有道理。袁大胡子虽然对此很不高兴，但见毛泽东同志批评得对，只好住口不骂了。

驱逐校长的斗争更是一件轰动全校的事。那是一九一五年上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省议会颁发了一项新规定：从本年秋季起，师范学校学生每人缴纳十元学杂费。对大多数穷学生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大家都议论纷纷，群起反对。有人说这个规定是第一师范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而向政府建议的，提出要赶走张干；加之，原四师的部分同学对合校后要多读半年书，早有不满意情绪，于是一场驱逐校长的学潮发生了。在第九班同学的发动下，全校很快就罢课了。同学们四处散发传单，揭露

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之类的一些事实。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没有击中要害。他对同学说，我们不是反对他当家长，而是反对他当校长，要把他从校长的宝座上拉下来，就要揭发他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专横跋扈，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事实。大家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毛泽东同志在学校后山君子亭又起草了一个传单，经与罢课发起人商量后，立即派人坐守在印刷局连夜印刷，清晨带回学校，广为散发。省教育司派督学来校调处，要学生复课。学生不同意，纷纷用纸条写上“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之类的话，由各班值周生收交督学。督学没法，只好答复说，这个学期快完了，你们还是上课，下学期张干不来了。张干怒不可遏。有一个学生告密，说传单是毛泽东写的。张干从笔力雄浑的文风中，也断定是毛泽东同志写的，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十七名同学。后遭到王季范、袁仲谦等教师的反对，没有成为事实。

事隔三十五年后的一九五〇年十月，徐特立、谢觉哉、王季范、熊瑾玎和周世钊等去看望毛泽东同志，谈到张干仍在长沙当中学教员时，毛泽东同志说：张干这个人，原来我不高兴他。当时他只有三十几岁，很有能力，很会说话，我估计他一定要向上爬。结果没有向上爬，现在还在画粉笔，算他有操守，难能可贵。又说：现在看起来，当时赶张干是没有多大必要的，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由于毛泽东同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老师和同学们都把他看成是“奇才”，是“特殊的学生”。杨昌济先生常说，毛泽东是“海内人才”，能充“栋梁之任”，对毛泽东同志十分器重，十分爱护，热心支持他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并把自己对毛泽东同志的印象介绍给北京的朋友。数学教员王立庵先生，也很器重毛泽东

同志。有一年暑假，毛泽东同志寄居在王先生家里自学，虽然不是学数学，王先生仍然很乐意供给他食宿。国文教员袁仲谦先生，尽管受过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仍然喜爱毛泽东同志，尤其赏识他的文学才能。

同学们对毛泽东同志十分敬佩，称他为“毛伟人”。毛泽东同志主持学友会的工作后，他

反帝反军阀的决心，出众的组织才能和胆识，更为同学们所倾倒。最能说明毛泽东同志深受同学们推崇的，莫过于一九一六年秋季全校的“人物互选”一事。

“人物互选”是当时学校考查学生学业和操行的一种办法。互选的条件包括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德育方面的内容有：敦品、自治、好学、克己、俭朴、服务等项；智育方面的内容有：才具、言语、文学、科学、美育等项；体育方面的内容有：胆识、卫生、体操、竞技等项。选举的办法是：各班同学在本班教室举行，每人最多投三票，每票只能选举一人，被选对象不限本班，列举项目必须名实相符。全校十一个班四百多人参加选举，当选者三十四人，其中毛泽东同志得票最多。其他当选者只有德智体三项中的一项或两项得票，而毛泽东同志三项都得票。

班八第級年三班七第 級年三班六第

班級		姓名		德育		智育		體育	
第一	毛澤東	鄧英華	林小鶴	南龍寶	蕭蔚然	劉修德	蕭學淵	彭道良	洪其弟
第二	四九	五	六	一二	一三	五	一一	一六	三四
第三	敦品 自治 好学 克己	敦品 自治 好学 克己	文學	文學 英算六	書法 圖畫	好學	服務六 才具五	競技	敦品八 自治六 好學十六 克己五
第四	四七	四九	五	一二	一三	五	一一	一六	三四
第五	敦品 自治 好學 克己	敦品 自治 好學 克己	文學 英算六	文學 英算六	書法 圖畫	好學	服務六 才具五	競技	敦品八 自治六 好學十六 克己五

人物互選當選名次表 民國六年六月

在德智体三个方面所包括的细目中，毛泽东同志得票也最多，有敦品（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之类）、自治（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之类）、文学（长于国文词章之类）、言语（长于演讲、论辩、应对之类）、才具（应变有方、办事精细之类）、胆识（冒险进取、警备非常之类）六项；而其他当选者只有两人达到四项，多数都只在一个方面得票。“才具”一项，只有毛泽东同志和另一个同学得票；而“胆识”和“言语”两项，则为毛泽东同志所独具。

选举结束，同学们议论开了。有的说：“毛泽东得票最多，的确是应该的。”有的说：“我们的毛伟人真有‘咬菜根’的精神，不讲吃，不讲穿，心里想的，口里谈的，都是怎样改造国家社会的大事。可惜人物互选的项目，就没有哪一项包括得了。”

农村调查和工人夜学

在寻找革命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不只是注重对书本的研究，而且在研究书本知识的同时，非常注意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他反对读死书，主张读活书，认为一个人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讲堂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穡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

到农村去进行社会调查，是毛泽东同志向社会学习的一个重要途径。自从进入第一师范以来，他就常常利用课余和星期天，到附近的工农群众中进行访问。但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曾在古书上读过司马迁周览天下名山大川，开阔襟怀，增广见闻的事迹。又曾从一份旧《民报》上看到两个青年学生徒步旅行全

中国，一直到达祖国西南打箭炉（即今四川康定）的报道。他从这些事中得到启示，也想进行一次旅行，借以接触更多的实际，熟悉社会，了解工农及社会各阶层的情况，学些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同时，通过旅行，锻炼克服困难的能力。

一九一七年七月，学校放暑假了，同学们纷纷离校回家。毛泽东同志也回韶山看望双亲，但他很快就返回长沙，邀请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老同学肖子升，利用暑假这段时间，一同到农村作调查。

一个晴朗的早晨，毛泽东同志来到楚怡学校。他穿着一件白色旧上衣，带着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他和肖子升从楚怡出发，过湘江后，换上草鞋，踏上了去宁乡的石板路。

这次“长途旅行”，他们有意识地不带一文钱，而采用“游学”的办法。“游学”，本来是旧社会某些知识分子，用以寻师求学的一种方法，但是也有一些潦倒落拓的文人，没有出路，又不愿从事生产劳动，于是就以“游学”为名，到处流浪，靠给人家写字作对联糊口，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行乞行为。毛泽东同志给这种旧形式，注入了新的内容，运用它来进行农村调查，既新鲜，又很有意义。一路上遇到学校、商店、庙宇等，他们就写一副对联送去，人家给几个钱，就用来作为路上的费用。肖子升爱面子，只写不送。毛泽东同志则利用送对联的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调查当地的历史、地理、民情、风俗等情况，从中了解社会世态，熟悉风土习尚，获得新的知识。

七月的农村，骄阳似火，气候炎热。毛泽东同志走在农村的小路上，满目田野风光，心里只觉得既舒畅，又亲切。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和贫苦农民拉家常，或者一起劳动。开始时，农

民们觉得很奇怪：看他的装束，不象当地的农民；听他谈吐，又丝毫不象旧日的“游学”先生。毛泽东同志那土生土长的农民语言，那温和平易的态度，那关心体贴农民疾苦的思想感情，很快就取得了贫苦农民的信赖。农民们对这两个远道而来的青年人非常喜爱，留他们吃饭，让他们住宿，打开长年压抑着的心扉，向他们倾吐苦水，诉说不平。

一天，毛泽东同志和肖子升来到宁乡杓子冲访问友人何叔衡同志，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经何叔衡同志介绍，毛泽东同志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夜，已经很深了，他还和那位农民围坐在一盏清淡的桐油灯下，促膝谈心。主人以忧郁的心情告诉毛泽东同志，他作贩田（即佃田），交的“三七租”，不分白天黑夜卖力气，种出的谷子，七成交给了东家，自己终年劳累，却不得温饱。毛泽东同志听了这些诉说，英俊坚毅的脸上，充满着对农民的深厚同情和对地主的极大愤慨。

毛泽东同志来到宋家潭，在一所茅屋里，同一位老农和一位青年农民谈话。这两个农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是当地受苦很深的两户佃农。毛泽东同志从他们眼前的生活，问到他们所受的痛苦：你们种谁的田？种了多少田？每年收多少谷？交了多少租？家里有多少人？生活怎么过法？东家的态度怎样？毛泽东同志的话，句句问到了农民的心坎上。两个农民先后诉说了自己苦难的家史和东家的狠毒，详细地回答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从这样的调查中，得到了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感性认识。

在何家住了两晚，毛泽东同志和肖子升又继续上路了。临行时，何家好意地送钱给他们做路费，他们坚持不要。此后，毛泽东同志决意不再去拜访同学和朋友，因为不愿意再受到象何

家那样优厚的待遇。在他看来，艰苦的环境，可以磨炼战胜困难的意志。

他们向着沕山走去。途中经过一座不知名的山，山坡上有棵古老的松树，两人在树下睡了一觉，起来又走。走了一段，发现路旁有户人家，看家的是个老头，他们就进屋去与老人拉家常。那个老人姓王，曾经在县衙里当过门房，以为他们是要饭的，问他们为什么出来要饭？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想旅行，想看看农村的情况，又没有钱，只好“游学”。老人说：要饭的人并不坏，他们往往是最正直、最老实的。只有那些当官的最不正直，我在衙门里当门房时看到，谁想打赢官司，就得送钱给县官，谁给的钱多，县官就帮谁说话。这就叫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毛泽东同志听后愤怒地说，这是什么世道！对衙门官吏的恨，加深着他对人民的爱；而对人民的爱，又加深着他对官吏的恨。爱与恨交织在一起，使他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告别老人后，他还在愤懑地想着这世上不公平的事情。

不久，沕山隐约出现在面前，沕山曾是佛教史上的名山，山上有个很大的佛寺，里面住着很多和尚。毛泽东同志想了解佛教和佛教徒的生活，于是上了山。在佛寺里，他们听了方丈对于佛经的讲解，了解了佛教徒的生活，还和方丈讨论了老子、庄子的经典。

接着，他们不顾酷暑，跋山涉水，来到了安化。在安化县城参观了紫云山、东华阁、培英堂、孔庙、北宝塔等名胜古迹，毛泽东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在宝塔上挥笔题词：沕水拖兰，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

在调查途中，他们克服了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有时候口渴了，就在路旁喝几捧凉水；走累了，就到塘里洗洗澡；有时走到前

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就在野外露宿。一次，他们沿着一条大河走去，河床很宽，但河水小。晚上，月亮出来了，照着他们的身影，乍看起来，好象有四个人在沙堤上行走。他们决定在沙滩上睡觉。大自然给他们增添了无穷的乐趣，他们风趣地说：沙滩是床，蓝天是帐，月亮当灯，星星作伴。毛泽东同志还指着岸边一棵老树说，这就是我们的衣柜。说着，顺手把布包、雨伞挂在树枝上。睡觉没有枕头，他们又找了两块石头，石头太高，就把一半埋在沙地里。就这样，他们欣赏着山乡夏夜的自然风光，舒舒服服地入睡了。

向社会实践学习的强烈欲望，和自觉寻找困难、战胜困难的决心，驱使他们不断向前。接着，毛泽东同志又调查了益阳、沅江两县的情况。在沅江时，正值湖区涨水，道路被淹，与外面的交通也断了。眼看暑假即将过去，他们便乘船返回长沙。

历时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足迹遍及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的许多地方，行程达九百余里。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每天都接触一些新问题，获得一些新知识。回长沙的路上，当他们回顾、总结自己的收获时，毛泽东同志深有体会地说，这次调查，使我们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社会知识，对农村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锻炼了克服困难的能力，知道了困难不是不可以战胜的。我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这年冬天，毛泽东同志又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一带去作调查。他住在友人陈绍休^①家里，广泛了解了这一带农村的情况，向农民宣传了反对封建、反对迷信的革命道理。他没有一点架子，和农民们一起挑水、种菜。针对这里有的农民没有栽果树

^① 陈绍休：第一师范学生，新民学会会员，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后病逝于法国。

的习惯，毛泽东同志指着山上的果树说：前辈人不栽树，你们哪有果子吃？他还亲手栽了几棵板栗树，并且意味深长地说：前人种树，后人吃果。附近的农民知道铁炉冲来了个很好的“毛先生”，都高兴地来找他谈心。每天晚上，陈绍休家里挤满了贫苦的农民。在这普通的农舍里，毛泽东同志听到了贫苦农民的呼声。

通过调查，毛泽东同志进一步熟悉了社会，了解了农民。他感到“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应该用真理去教育群众，“变换全国之思想”，以便改造社会。因此，他在继续关心农民问题的同时，又不断接触工人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启发他们的觉悟。

第一师范附近，有铜元局、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工厂，聚居着很多工人、人力车夫、蔬菜小贩和其他劳动者。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没有机会受教育，绝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毛泽东同志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觉得应该赶快设法改变这种状况。

一九一七年下学期，毛泽东同志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他以课余的主要精力，满腔热情地主办了一个工人夜学。夜学设在第一师范附近的国民学校内。关于夜学艰巨而光荣的经历，毛泽东同志精心办学的辛勤劳动，在当时的《夜学日志》和一九一八年编纂的《一师校志》里，都留下了珍贵的记载。

那是新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毛泽东同志召集学友会负责人开会，研究、制订工作计划。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倡议主办工人夜学，并提出了四条理由：（一）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二）欧美社会普及教育很有成效，

我国国民虽然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三)可作为师范三、四年级学生实习的场所；(四)可借以打破社会与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他认为，“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而通过办工人夜学，能加强学生与工农群众的联系。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理想，即将来要作到“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他在上面讲到的“大多数失学之国民”，主要是指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广大工农群众。如果说，他在一九一五年读《明耻篇》写“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时候，还认为拯救国家主要是依靠青年学生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开始认识到工农群众是社会的中坚了。

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获得了学友会全体负责人的一致赞同。主办工人夜学的倡议通过后，学友会立即采取行动，写了招生广告，张贴在来往行人最多的街道上，并函托警察分发。这个广告，通篇洋溢着真挚、深厚的阶级感情，用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

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收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可是，广告贴出后，报名的寥寥无几。学友会又将招生广告用大张纸书写，张贴在显要处。但报名的仍然不多，前后两次仅有九人报名。这个意外的情况，使大家感到很诧异。毛泽东同志召集有关的同学分析原因，认为：第一，工人夜学不要钱，请工人来读书，这是个新鲜事，不容易使人们相信；其次，仅仅把广告张贴在街上，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第三，要警察分发广告也不妥，他们是否分发已属疑问，就算发了，警察代表官厅，人民望而生畏，反而增添了疑惧。总之，不是工人不愿上学，而是对夜学不了解。原因找到之后，毛泽东同志组织一批同学，带着广告，深入到工人宿舍区和车间，边发边宣传，当面向工人解释广告内容，大受群众的欢迎。从铜元局周围，铁路两旁，到洪恩寺一带，左自大椿桥，右至社坛岭、天鹅塘等地，一共发了六百多张。广告象春风一样，吹暖了工人的心，他们奔走相告，都说：“读夜书去！”不到三日，报名的达到一百零二人。两天以后，又

增至一百二十余人。

经过毛泽东同志的精心筹备，工人夜学开学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晚，第一师范旁边的国民学校教室里，灯光明亮，气象一新。工人们兴高采烈地涌来，毛泽东同志和夜校教职员们亲切地把一批批衣服褴褛的工人领进教室。为着教学的方便，夜校对工人的文化水平进行了摸底测验。测验的结果，有的能写清全部测验内容，有的能写出所住街道名称和自己的名字，有的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来。试卷评定后，毛泽东同志按照工人的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两班，以便分班上课。接着，举行开学仪式。在开学仪式上，毛泽东同志带着喜悦的心情走上讲台，亲切地说：今夜开学了，分了班，你们就是这夜学的学生了，再过两天，到下礼拜一便要上课。接着，将《上课说明书》逐条逐句地向工人们详细解释：“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每周上课三晚，每晚两点钟，七点起九点止；“每次上课须带笔墨”；“每人发听讲券一张”；……工人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感到格外亲切。他们从阴暗的车间，来到这通明透亮的教室，就象由冰封雪冻的冬季，来到了温暖明媚的春天！

根据工人的需要，夜学课程有国文、算术和常识三门。国文内容分认字、写字、短文、便条和写信；算术以珠算为主，稍加笔算；常识包括历史、地理、经济、物理等等。所有课程，都由夜学教员结合实际自编讲义。毛泽东同志讲授历史课，向工人们讲述“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罪行，歌颂劳动人民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以培养工人“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

为了使工人学习得更好，毛泽东同志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找工人谈心，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结合实际，不断研究

和改进教学方法。旧学校的教学方法，是教员“灌”，学生“吞”；教员贪多，学生“嚼不烂”；一方照本宣科，一方死记呆背。毛泽东同志不满意这种方法，他比较注意采用启发式，工人们最爱听他讲课。他也很关心其他教员的的教学，总是团结他们一道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讲授水平。经过几天的实践，他在《夜学日志》上进行了初步的小结：“实验三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有一天，毛泽东同志听物理课教学，发现教员讲的过于枯燥，工人听不懂，大都低头闷坐，情绪低落。他感到，长此下去，不仅教员白费力，而且很可能由此使工人们感到厌倦，产生退学的思想。为了引起大家的学习兴趣，也帮助教员改进方法，课毕，毛泽东同志告诉工人们：物理一科，极有趣味，方才所讲，只是开始。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发亮，轮船火车之所以能奔跑，其中的道理都要讲给大家听。这些通俗易懂、循循善诱的话语，不仅引起了工人们求知的欲望，而且对那位教员改进教学方法，也是一个很大的启示。教员们都认为：“此亦足以引起追求的兴味，其法大可采也。”

“毛先生是我们的贴心人！”这是工人们异口同声的心里话。的确，毛泽东同志对工人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许多细微末节都想到了。课前，他常和一师的厨工一道，为夜学准备茶水；课间，找工人谈心，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雨天，就告诉大家：“雨具自置椅下看管”；发现教室灯光不足，就及时在《夜学日志》上注明，“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二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课毕，则细心地布置作业。有一次，他告诉工人

们：“今次有未带笔墨的，下次要带来。学习纸带回去写好，下次带来定甲乙记分。”当夜深人静、万籁无声的时候，他还在总结教学经验，填写《夜学日志》。毛泽东同志对工人的关怀体贴，如同春雨一般，一点点，一滴滴，滋润着工人们的心田。

毛泽东同志善于以自己的热情，鼓励周围的人们，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

十一月十四日

甲班上課實術羅宗翰出席教以算之種類及加法大意
拉伯字碼碼歷史常識毛澤東出席教用朝大勢及上古事跡
學生有四人未帶英盤從小學暫借為戒嚴早半時下課管理
者李瑞翰蕭珍元

實術三日矣覺國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減其分量太深宜改
用通俗語（介乎白話與文言之間）常談分量亦嫌太多（
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講義宜用白話單句標明初不發
覺用精神論將終取講義一過是矣本日應即改用以
法覺悟得多多
本日實術却覺過淺學生學過歸除者全其舉手有十九人之

大家工作。尽管当时反动军阀傅良佐和谭浩明的军队，出入长沙，时局很不稳定，晚上经常戒严，给工人上学造成很大困难，但是，工人们仍然坚持学习，教员们继续坚持上课。一九一八年上学期，夜学继续开办。为了扩大社会影响，推动其他学校也办工人夜学，毛泽东同志还向湖南《通俗教育报》投稿，详细介绍主办工人夜学的情况和经验。通过这一系列的实践，毛泽东同志对工人有了初步了解，同他们建立了真挚的感情，也取得了联系工人的一些经验。同时，把彻底改造旧社会的革命火种，撒到了工农群众这个“社会中坚”的浩荡队伍之中！

组织新民学会

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把许多青年从苦闷、消极、保守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们向往科学和民主，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寻求着中国的光明前途。在这个新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正在探索革命真理的毛泽东同志，眼界更加开阔，思考的问题也越来越深邃了。现实生活使他认识到，改造社会的大业，决不是几年的短暂时间所能完成，更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必须有一大批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朋友，组织一个牢固的团体，汇成巨大的力量，才能有所作为。

早在一九一五年，毛泽东同志就觉得自己身边的朋友少了，活动的范围窄了。他决心突破第一师范这个狭小的圈子，到更大的范围去物色更多的朋友。暑假过后，他向长沙各学校发出了一则《征友启事》。启事是用土纸油印的，文章写得流利，字体刚劲有力。启事的大意是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做朋友，并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最后，还引用了《诗经》上“嘒其鸣矣，求其友声”^①这两句诗，表示自己求友心切。启事的署名是“二十八画生”，通讯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在邮寄启事的信封上，还批明“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这样的事情，当时一般人很难理解。一些思想守旧的校长，觉得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个怪人，征友是不怀好意的，于是把启事没收，不准张贴。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姓马的老校长，竟认为这个启事是为了找女学生谈恋爱。他

^① 诗见《诗经·小雅·伐木》。嘒，鸟叫声。这两句诗的意思是：鸟儿用嘒嘒的叫声，来寻求它的伙伴。这里用来比喻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

跑到一师附小找了陈章甫，又找了第一师范的校长，打听“二十八画生”究竟是个什么人。从他们那里，这位马校长了解到“二十八画生”原来名叫毛泽东，是个品学兼优、受到师生称赞的好学生；征友是为了共同寻求真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这样，马校长才消除疑虑，放下心来。

启事发出去以后，毛泽东同志以殷切期望的心情，等待了一些日子，陆续收到五、六个人表示愿意联系的来信。人数虽然不多，毛泽东同志仍然感到高兴和快慰。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暑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以来稍快惟此耳。”

定王台的湖南图书馆，是毛泽东同志同他的新朋友约定会面的地方。到了约定的时间，他很早就来到这里，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看报，等候着即将见面的新朋友。他们见面时，没有应酬的客套话，也不谈关于饮食起居之类的日常琐事，而是开门见山，谈时事，谈学习，互相询问最近读些什么书，有些什么收获和体会。后来，和这些新朋友交谈的次数多了，就互相交换看日记和读书笔记，交流思想感情。双方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他们的谈话就更坦率、更深远了。毛泽东同志常常从思想上启发他们，使他们懂得，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要去想什么升官发财之道。

经过几年的努力，毛泽东同志身边聚集了十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多数是长沙各中等学校肄业的学生，也有一些是长沙各中小学的青年教员。这是一群纯洁而有朝气的人，是一群态度极端认真、“真心求学，实意做事”的人。他们多数来自农村，深知民间疾苦，和穷人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作风，也没有某些“读书人”的那种书呆子气；他们勇于反

抗旧世界，热心追求新思想，决心树立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满怀着为改造国家、改造社会而奋发图强的豪情壮志。他们认为：时局太危急了，对学问的需要太迫切了，一定要十分珍惜自己宝贵的青春，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毛泽东同志还曾提倡“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身边琐事，在校学习期间不谈男女恋爱问题。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到一个青年家里，想和他交谈时事与社会问题，不料这个青年却侈谈生活琐事，并把佣人叫来，为着买一小块肉，商量了老半天。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情，心里非常不快，觉得这个青年目光短浅，胸无大志，不能作为思想上的朋友，以后就不再找他了。

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总是保持着经常的聚会，进行畅所欲言的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这是他们讨论的中心问题。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这三年中，他们几乎是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涉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十分热烈坦率，讨论的次数大约有百次以上。在这样严肃认真的反复讨论中，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一、自己的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十分迫切；二、国内的新思想、新文化已经发展起来了，再过静的生活和孤独的生活是不对的，应该追求一种动的生活和团体的生活。到一九一七年冬，大家从讨论中得出一致的结论：一定要以“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毛泽东同志根据讨论的结果，认为有必要成立一种严密的组织，于是提议组织一个学会。这个建议一提出来，立即得到普遍的赞同。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和煦的春风，吹动着清澈的湘水，掀起一层层碧波；江岸上芊绵的绿草，在阳光的照耀下，舒展着娇嫩的叶片；岳麓山上，青枫翠柏，郁郁葱葱；杜鹃

盛开,花红似火。岳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同志的家中,聚集着十三个^①兴致勃勃的青年。一个崭新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在毛泽东等人的精心筹划下诞生了。

到会的同志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和邹彝鼎两人起草的学会章程。章程确定学会的名称为“新民学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章程规定会员必须遵守五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鉴于学会发展后,一部分会员将出省、出国,为便于了解外出会员的情况,以利于团体的活动,章程规定“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益”。章程还对学会的组织机构、会务活动、会址、会费及新会员入会手续等一一作了规定。在讨论发展会员时,毛泽东同志说:要人多,力量才大,会员应该多发展。不过,会员的标准不能降低,一定要品格好、志向好、学问好、确有向上要求的青年,我们才欢迎他入会。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最后,还就会员出省出国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会议选举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肖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同志主持。

新民学会的成立,表明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革命团体,开始活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上。

新民学会成立前后,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杭州等地的进步青年,也组织了许多进步团体。如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同志组织了“觉悟社”;在李大钊同志发起下,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赵世炎、沈泽民等同志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恽代英、林

^① 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肖子升、肖子璋、陈绍休、邹彝鼎、张昆弟、邹蕴真、陈书农、周名弟、叶瑞龄、罗章龙。

育南等同志组织了“互助社”，方志敏等同志组织了“改造社”，等等。新民学会是当时革命性最强的团体之一。这与毛泽东同志为它倾注了心血，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主张“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要派人去打先锋，“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

一九二〇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来信，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他多年来的宿愿。早在一九一二年，当他在湖南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大地图时，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现在一些志同道合的会友，提出了和他一致的主张，他又怎能不为之高兴呢！于是他立即回信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为了统一国内会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一九二一年的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讨论学会的方针问题。会上有人认为，学会素来抱“改造中国与世界”这种主张，不必多讨论了。毛泽东同志以为不然。他说，现在国内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主张改良，所以还有讨论的必要。讨论开始以后，各人的发言果然不同。有的主张提“改造世界”，有的主张提“改造东亚”，有的主张提“促进社会进化”，还有人“对改造两字极为怀疑”，认为要实行根本改造，“其实是做不到的”，“新民学会不宜取改造的态度，宜取研究的态度”。大家发言以后，毛泽东同志坚定地指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并进一步阐述了他主张把“改造中国与世界”定为学会方针的意见。他说：“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

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他的发言，得到了绝大多数会员的拥护，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

新民学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毛泽东同志经常提醒会员们：应该将新民学会建设成为“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他认为会员之间，必须“谨慎、恳切、互相规过，不漠视会友之过失与苦痛，要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要努力求学。”为了使这个组织健康地发展，学会规定入会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后来长沙会友决议将奋斗与服从真理合为“向上”）。新会员入会，必须经老会员五人介绍，评议部审查认可，而且还要公函通告全体会员。对有些名义上是会员实际上不够会员条件的人，学会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发了一个启事，申明：会员中凡因他种事势不能分其精力于学会的，对学会无感情的，缺乏团体生活兴味的，毫无向上要求的，行为不为多数会友满意的，由学会除名，不再承认他为会员。

关于学会的会风，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半淞园会议上，明确提出应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毛泽东同志曾解释说：“所谓‘潜在’，并不是‘不活动’，只是防止声闻过情。”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学会应采取“潜在的态度”，注重“打基础”，“不张扬”，“不标榜”，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他认为“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现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他反对那种招摇过市、徒务虚名的作法，曾形象地打比喻说：“好些团体，象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离不开一个

。無政府主義：

我們可以拿來參攷，以決定自己的方法。

於是依次發言（此時陳啓民到會）：

何叔衡：主張過激主義：一次的要亂，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這些話。

毛潤之：我的意見與何君大體相同。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的。

‘倒’。”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对一切事物，都采取分析的态度，坚决反对那种“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以一时概永久”，“以主观概客观”的伦理的错误”。在毛泽东同志的带动下，新民学会会员中形成了“言必及义”不标榜、不浮夸的好风气。

新民学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不依赖旧势力。学会的一切活

动是创造性的，不是因袭的，它从来没有和旧势力发生关系，也没有邀过旧势力的人入会。它的会员大多数头脑清新，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思想；同时又富有奋斗精神，能够积极地改革生活，进修学问；互助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也比较强。

那时，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支配着整个社会，女子不敢讲社交，男女不能相处共事。在这种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新民学会竟吸收了约占会员总数四分之一的

女会员。向警予、蔡畅同志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这是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发展女会员的结果。他对那些思想开放、具有求解放、求改造勇气的女子要求加入学会，总是积极支持和鼓励。一九一九年秋末，周南女校劳君展等四名女青年被吸收入会，毛泽东同志提议，为她们开一次热烈的欢迎会。大家赞同他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主持了欢迎会，在欢迎会结束时，他说：我们的学会和我们每个人的奋斗目标应该是一致的。我们这个学会要为挽救国家、改造社会而奋斗，我们个人也就不应该是为自己的名利享乐奋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虽然是些年青人，但应该担负改造社会的重任。毛泽东同志慷慨激昂的讲话，给到会的会员很大的鼓舞。会后还合影留念。

新民学会的会员，后来发展到七八十人，分布在国内外很多地方。国内如长沙、北京、汉口、上海、南京等城市；国外如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南洋新加坡等地。他们或者求学，或者做事，都担当学会交给的一部分工作，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毛泽东同志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交换意见，商讨问题。

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成长为向旧世界宣战的“勇猛精进”的无畏战士，有些会员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骨干，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罗学瓚等同志，就是其中的代表。

蔡和森同志，湖南湘乡人，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的亲密同学。“毛、蔡”之名早为同学中所称道。他勤奋求学，勇于实践，有远大的抱负和奔放的革命热情。他常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旧世界之层层罗网。”他是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中坚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他同毛泽东同志一

样，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极力主张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走俄国人的道路。党成立后，他曾主持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是我党初创时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在香港被捕，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

何叔衡同志，湖南宁乡人，长沙楚怡学校的教员。在毛泽东同志的朋友中，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他的知识和社会经历都很丰富，对社会事物有着明快的判断力，办事精细、果断，为人赤诚、热心。一九二一年七月，他和毛泽东同志一道，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又一同创建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湖南自修大学，成为毛泽东同志最得力的助手。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一九三五年在福建长汀县壮烈牺牲。

向警予同志，湖南溆浦人，周南女校的学生，具有反抗封建礼教的坚强性格，热情追求新思想，努力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她对社会改造的大业，充满着无限的信心，曾对朋友们说：“将来根本改造的大任，我们应当担负的。作大事业，我们这时候就要准备起。”她对毛泽东同志非常钦佩，在写给侄儿的信中，称毛泽东同志是“改造社会的健将”，勉励侄儿常在毛泽东同志跟前请教。向警予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最优秀的女党员之一，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曾称她为“模范妇女领袖”。一九二八年春在汉口被捕，英勇牺牲。

罗学瓚同志，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同志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他学习刻苦，作风踏实，胸怀宽广，志向远大。他在诗中写道：“开怀天下事，不言家与身。……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将肩挑日月，天地等尘埃。何言乎富贵，赤胆为将来。”他非常

钦佩毛泽东同志，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毛泽东同志是“敦品力学之人”，和他“朝夕与处，时有受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成为毛泽东同志领导工人运动和开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得力助手。曾任党的县委书记。一九三〇年在浙江工作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后壮烈牺牲。

新民学会对于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它是“五四”运动中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了。对于在一师的学习生活，他是充满着深厚的感情的。后来他说：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第一师范。第一师范是一个好学校，替我打好了文化基础。又说：在这个时期中，我的政治思想开始形成，我也取得了初步的社会活动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正当青春年少之时。他和他的挚友们一个个都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革命青年，富有强烈的革命造反精神，敢于批评、议论国家大事，对横行一时的封建军阀、官僚政客，极端轻蔑，视如粪土。一九二五年，他在《沁园春·长沙》这首光辉词篇里，回忆这段战斗生活时写道：“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气壮山河的雄伟气魄，高尚圣洁的思想境界，是毛泽东同志澎湃激荡的革命情怀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由于时代的限制，没有可能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只能从欧洲的旧民主主义、空想社

会主义、《新青年》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以及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去批判地吸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等观念的一种奇怪混合物。关于‘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等，我有一些模糊的情感。但是，我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①

第一师范毕业后，毛泽东同志和一群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勇敢地投入了新的革命大风暴中。

^① 引自斯诺《西行漫记》，复社藏版，一九三八年三月第二版。

第四章 在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中

第一次北京之行

一九一八年六月，结束了在第一师范学习生活的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志一起，带着简单的行李，寄居在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半学斋），一面自学，一面商讨今后的计划。

新的生活是艰苦而有趣的。他们上山捡柴，到很远的地方挑水，用蚕豆拌米煮饭吃。这种花钱不多的饭有时一天也只吃一餐，有意识地锻炼自己适应艰苦生活的能力。每当傍晚结束一天的学习之后，他们便一起去桔子洲头游泳，到湘江岸边散步，或者上岳麓山登高望远，在爱晚亭前露宿通宵。

然而，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心情并不悠闲。这些刚刚毕业不久的学生，除了考虑个人的出路和前途外，更多的时候是在考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迫切地想寻求一条挽救祖国危亡、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毛泽东同志经常和大家研究当时流传的新思潮，开展对时势问题的讨论。他十分厌恨外力侵略、军阀横行、民不聊生的世道，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和睦的新村^①，以便进行改造社会的探讨。他和这群充满热情与理想的同伴，

^① 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提出的新村主义，其基本思想是不满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辟一块小天地，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

踏遍了岳麓山下的镇子和村落，想寻找一块适当的地方作为新村的试验场所。但是这些地方都是属于地主阶级的，由反动政府所管辖，他们没有权力使用它，新村的设想终究没有实现。

中国怎么办？湖南怎么办？自己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时刻萦回在毛泽东同志的脑中。毛泽东同志曾以极大的兴趣和精力钻研过西方的社会科学，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看到的却是：中国先进的人们向西方寻找真理，企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以为这是救国之道，可是，多少次的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就积弱不振的中国，非但没有得以复兴，反而一天一天地坏下去。为什么向西方学习的路行不通？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为什么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不能实现？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毛泽东同志年青的心灵上打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问号。有时，他攀上岳麓山顶，俯视湘江之滨的长沙城，思潮起伏，恰如岳麓宫内那幅对联所写的那样：“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正在这时候，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给毛泽东同志来信，告知他一个重要消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政府在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作勤务工作，为战争服务，现在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在法国留过学的吴玉章同志^①和蔡元培^②等人，提出“勤于作工，俭以求学”的口号，倡导青年利用这个机会

① 吴玉章：四川省人，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一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七大、八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逝世。

② 蔡元培：浙江省人，清末翰林，留学德国，民主主义教育家，同盟会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一九一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到法国求学。他们已开始在社会上进行宣传，并组织了法华教育会主办这件事情。

毛泽东同志接信后非常高兴。他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和新民学会的具体情况：新民学会会员大都处在“求学储能”的时代，但是现在湖南政局极为混乱，“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有一个“向外发展”的志向，展开“大规模的自由研究”，努力寻找新的出路。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同志，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发动会员和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是一个到国外了解世界革命形势，学习各国革命经验和先进思想的好途径。

六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等十余个新民学会会员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聚会，集中讨论“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赴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该尽力进行。会议决定：新民学会立即在湖南组织和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会后不久，在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下，蔡和森同志动身去北京了解有关情况并与各方面进行联系。他自己则和其他会员在长沙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

中国进步的知识界，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曾经喊出过“劳工神圣”的口号。因此，勤工俭学，对一般要求上进的青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湖南的一些有志青年，在中等学校毕业后，大都因无力升学而感到苦闷。毛泽东同志和新民学会会员的宣传，使他们产生了继续深造的希望，认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几年工，积累点钱，再入专门学校学习，这是一个好办法。不久，第一师范和长郡中学就有三十多人报名。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湖南很快地兴起来了。

然而，到法国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出国的经费问

题,与政府当局交涉问题,学习法文的问题,都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蔡和森同志到北京后,毛泽东同志关心他在北京接洽的情况,多次和他通信。蔡和森同志来信告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尚在创议阶段,经济上还没有着落。他认为,“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主张将众多的青年推动起来,热烈地响应这个运动,造成一种声势,使倡导者不能不负促成之责;而这个工作需要有人主持,这个主持人以大家敬佩而信赖的毛泽东同志最为适宜。因此,他极力敦促毛泽东同志速去北京,并在信中转告了杨昌济先生的意见,希望毛泽东同志一边就读北京大学,一边兼搞社会活动。

毛泽东同志接到信后,决定往北京一行。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和张昆弟、罗学瓚、李维汉等二十五名准备赴法的青年,由长沙登船启程,到汉口后,转乘火车直往北京。行至河南郾城时,正遇沙河涨水,铁路被冲断了,火车无法通行。怎么办?大家一时没有主意,都以期待的心情望着遇事不慌、胸有成竹的领队。毛泽东同志一声不响地下了车,在当地了解了一些情况后,高兴地告诉大家:沙河水来得快,去得也快,水退了就可以走。他建议把行李集中起来,派人看守,利用候车的时间,大家轮流去看看北方的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

毛泽东同志邀了两位同伴,来到了漯河寨。这个寨子,周围是五六尺宽的土城墙,四面有炮楼;寨子里残破不堪,满目凄凉。封建军阀争权夺利、混战不休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往回走的路上,毛泽东同志望着沙河中浑浊的激流,心中还在惦记着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

他们在车站坐着，度过了漫漫长夜。第二天，水退了，火车继续行进。由于路基被水冲坏，火车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到许昌附近的石桥。可是，前面有一段路被冲塌了，尚未修好，火车又被阻了。在毛泽东同志提议下，大家迈开双脚，步行三十里路，赶到许昌搭上了北去的火车。火车在原野上奔驰，车窗外，荒村萧索，毛泽东同志心潮激荡，思绪难平。他想，尽管前进的道路上布满艰难险阻，我们还是要朝着既定的目标迅跑。他对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充满着坚定的信心，寄托着深切的期望。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和他的同伴们抵达北京。此后，湖南青年来京准备赴法的不断增加。但是，华法教育会并没有为勤工俭学学生创造出国的条件。既没有为他们筹集出国旅费，也没有为他们在法国安排工作和学习的场所，所以一时还不能启程。一部分人情绪不安，有的口出怨言。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安慰大家说：我们既来了，就不必急，先安顿下来，再找一些人商量，总会想出办法来的。后经杨昌济先生协助，蔡元培答应开办预备班。预备班分设在北京大学、河北保定育德中学和蠡县布里村，后来又在长辛店增设了一个班。主要学习法文，其次学制图、数学，有的还到工厂实习，为出国后的“工读并行”的生活作准备。

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妥善地把同伴们安排到预备班后，又进一步为他们作出国的准备工作。他们到华法教育会接洽，与湖南在京知名人士及其他有关方面联络，到侨工局借款，筹集旅费，起草赴法勤工俭学计划，办理出国手续，等等。毛泽东同志日夜奔走，不知疲倦地工作，得到了大家的热情赞扬。罗学瓚同志在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钦佩。”在毛泽东同志

的忘我精神的鼓舞下，在他的具体组织和妥善安排下，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湖南青年，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一九一九年三月，踏上了飘洋过海的旅程。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全国去法国勤工俭学生共一千六百余人，其中湖南一省就去了三百多人。新民学会会员中先后赴法的有蔡和森、罗学瓚、张昆弟、向警予、李维汉、蔡畅等近二十人。当时，年已四十三岁、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多年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同志，也到法国去做工，当“老学生”；年过半百的蔡母葛健豪，也跟随自己的子女蔡和森、蔡畅，远渡重洋，到法国去受中等女子教育，被人们传为佳话。向警予、蔡畅同志等发起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在全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多进步人士，对毛泽东等同志领导的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十分钦佩，称赞湖南青年“勇于奋斗”，是“将来回国努力创造的人”。湖南的报纸也赞扬他们是“吾湘的生机”。

毛泽东同志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他和在京的会友，起初都住在湖南一些县设在北京的会馆里。会馆分散在城内外，大家每天来回奔波，十分疲劳，学习和商量工作都很不方便。不久，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瓚等八个会员，搬到了三眼井吉安所左巷七号居住。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一切都极简陋。特别是晚上，八个人挤着一起睡，“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后来毛泽东同志回忆这段艰苦的生活时说：晚上我们挨得紧紧地睡在一个炕上，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当我要翻身的时候，常常必须预先警告睡在两边的人。

艰苦的环境进一步磨砺了毛泽东同志的意志，激发了他的革命豪情。北京这座古城的美，在精神上也给了他极大的补偿。当他漫步在故宫的广场上，游览在引人入胜的公园里，看着那些

凝聚着劳动人民才华和智慧的民族建筑时，联想起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心中总是充满着自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冬天，杨柳枝头挂满水晶似的冰柱，倒垂在结着坚冰的北海上。毛泽东同志望着眼前的雪景，不禁吟诵起唐朝诗人岑参所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名句。他是多么向往着祖国大地的“春天”早日来到呵！

毛泽东同志到北京后，生活费用没有来源，很想找个职业。经杨昌济先生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同志，当上了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薪金八元。图书馆设在沙滩红楼的一楼。毛泽东同志在第三阅报室工作，职责是登记阅报人的姓名，大部分时间可以自己看书。这样，既解决了生活问题，又得到了学习上的方便。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学术思想界非常活跃。在新文化运动的启发、推动下，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不断提高，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传统思想被打开了缺口，带来了新思潮、新学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北京大学是北京的最高学府，学术思想更加活跃。校长蔡元培先生“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都在这里进行宣传活动。北京大学成了新旧文化、新旧思潮汇集和斗争之地。

毛泽东同志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的有利条件，广泛地接触和研究各种新思想。他在北大图书馆如饥似渴地研读着介绍各种新学说的报章杂志和书籍，获得了很多新知识。北京大学学术团体很多，如哲学会、体育研究会、数理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等等，不下十六、七种。毛泽东同志以很大的兴趣参加了哲学会和

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北大的一些重要课程，他也常去旁听。同时，他还组织新民学会在京的会员同名流学者讨论研究学术问题，同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等接触交谈，与各方面的进步青年广泛联系。他和蔡和森同志等依然象在第一师范学习时一样，经常到杨昌济先生家登门求教。通过这些活动，毛泽东同志了解了北京学术思想界的状况，扩展了活动范围，和全国的革命运动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注重实际调查，不断地对各种学说进行研究、分析、比较和选择，抛弃陈旧的东西，吸收先进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北京之行的一个突出特点。他多次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等地作调查，了解工人的疾苦。据当年住在长辛店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湖南学员何长工同志回忆：一九一八年冬，毛泽东同志来到长辛店，“在当时祖国很少的重工业企业中开始了他的活动。他先到工厂里去，在职工群众中寻东问西地从生产细节到办厂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水平，作详尽的调查。”“在厂里转完了，来到班里和我们一谈，我们就觉得，虽然时间这么短，他掌握长辛店工厂的情况，特别是当时职工的情况却非常详细。”^①

当时，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已经在中国流传，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模糊的。不少人把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主义等等思潮，也当作“社会主义”来接受，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这些冒牌的社会主义流派中，无政府主义是影响较大的一派。特别是其中的一个流派，即俄国人克鲁泡特金所倡导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具有

^① 何长工：《饮水思源，不能忘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见《北方的红星》一书。

很大的欺骗性。什么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呢？一九一九年三月出版的《进化》杂志说：“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废除资本制度，改造为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又说：“‘无政府’以反对强权为要义，故现社会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切排除之。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寄生者，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上只有自由，只有互助之大义，只有工作之幸乐。”当时，很多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接受过这种思潮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在寻找革命真理的过程中，对各种新思潮，“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①他在研究“社会主义”时，曾读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赞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许多主张，认为这些主张“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②，这比激烈派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意义“更广，更深远”。他还同无政府主义者、北京大学学生朱谦之，讨论过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但是，毛泽东同志赞同无政府主义的时间很短，马克思主义一经在中国广泛传播，他在两者之间进行了研究、分析、比较之后，就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并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武器，对这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马克思的名字，最早是在一九〇二年梁启超的文章里，以“麦喀士”的译音出现于中国的。以后，一九〇六年出版的同盟

①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② 《湘江评论》《民众的大联合》

会机关刊物《民报》、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在日本出版的中文刊物《天义报》，以及一九一二年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等报刊，曾分别译载了《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摘要，刊载过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和学说的文章。但是，这些译文和论述，既是凤毛麟角，又由于译者和作者的非无产阶级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其中有不少的错误；加之那时的中国，还缺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思想准备，因此，马克思主义只能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人的圈子里被曲解，没有得到传播。

十月革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向全世界宣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正如后来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十月革命爆发时，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也发展壮大起来。产业工人已增长到约二百万人，自发的罢工斗争逐年增加。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广大知识青年掀起了追求真理的热潮。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中国的先进分子结束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史，转而向俄国学习。他们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的欢呼声中，开始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一九一八年下半年，李大钊同志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在《新青年》上发

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是“列宁的功业”、“马克思的功业”，“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虽然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系统的介绍，但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李大钊同志还在北大图书馆大量扩充了外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供青年们学习。这些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进步青年中产生着新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

马克思主义刚刚在中国传播，毛泽东同志立即为这一真理所吸引。他阅读了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文章，只觉得眼前展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壮阔境界。他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中国革命长期没有解决的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问题，在俄国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获得了迅速而彻底的解决。这就促使他开始抛弃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学说”，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五十多年后，毛泽东同志曾回忆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寻求救国真理的征途上，经历了各种艰难和曲折，终于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毛泽东同志由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成为赞同俄国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站在五四运动的前列

一九一九年三月，当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登上旅途时，毛泽东同志亲自陪送他们到上海。毛泽东同志早已决定自己不出国。他向大家解释：我觉得我们这些青年，要有人

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的问题。关于自己的国家的事，我还知道得太少，我决心在本国花费我的时间。在完成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艰巨任务后，毛泽东同志于四月六日回到湖南，担负起领导湖南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重任。在这场斗争中，他思想敏锐，深谋善断，表现了超群的政治才干和出色的组织才能。

这年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分赃会议——巴黎和会正式开场。中国以战胜国的身分出席了会议。但是，英、美、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实现他们瓜分世界的阴谋，竟把中国看作殖民地，在巴黎和会上讨论起所谓“由日本来承受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问题”来了。消息传开，全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密切注视着这一情况的发展。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即将来临。可是，湖南被北洋军阀张敬尧严密控制着，一切爱国活动都被禁止。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认为：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酝酿一场革命斗争，湖南也应该搞起来，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为了工作的方便和解决生活费用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修业小学找了个教员位置，每周教六小时历史课，其余时间则用来开展革命活动。

毛泽东同志利用教员的社会职业，在教育界、新闻界、学生中进行发动工作。当时，在长沙几个主要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里面，都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首先走访了他们，讲述自己在北京、上海的见闻，介绍所接触的一些值得钦佩的人物和国内外形势，并约集会员们到楚怡学校何叔衡同志那里开会。会上，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局势，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张敬尧在湖南的罪恶，以及在新思潮的激荡下全国人民觉悟逐渐提

高等事实,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同时,还就如何组织青年学生的力量,如何与张敬尧进行斗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人都觉得毛泽东同志分析透彻,意见中肯,听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增强了在湖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信心。会后,很多人都密切地注视着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每天仔细地阅读报纸,关心巴黎和会的动向,以及国内人民的各种爱国活动。

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巴黎和会拟定和约时,帝国主义者无视中国人民提出的废除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收回德国侵占的山东领土等合理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转让给日本。中国军阀政府派去的代表,竟采取妥协态度,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全国人民忍无可忍,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高呼“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巴黎和约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一致要求严惩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交通总长,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陆宗輿(币制局总裁,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和章宗祥(驻日公使)。愤怒的学生放火烧了曹汝霖的巢穴赵家楼,将躲在曹寓的章宗祥打了个半死。但是示威遭到了段祺瑞卖国政府的镇压,当场有三十二名学生被军警捕去。

在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同时,长沙的学生也在积极准备行动。毛泽东同志站在斗争的前列,领导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因势利导,发动青年学生投入斗争,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街头上,码头旁,到处都有他们在活动。“请救山东人的性命!”“请看我国之危险!”等动人心魄的传单,撒遍了长沙城。

五月七日，长沙各校学生，手执写有“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的小白旗，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愤怒的吼声冲破了沉闷的天空，召唤着一切有爱国热情的人们起来战斗。

然而，这个新起的爱国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了军阀张敬尧的镇压。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敬尧在长沙实行武装戒严，并以“戒严期间，不得激起民气”为名，严密地封锁新闻。他指令警察厅警告各报社，不得登载山东问题的消息和评论，对所有从北京发来的新闻电报概行扣留。有的报纸编排了这方面的新闻、电讯，也被强行删去，使得报纸出版时，常常空出一块，开了“天窗”。五月七日，张敬尧派出军警强行解散了游行队伍。第二天，又召集各校校长“训话”，胡说什么“青岛问题，似不得谓为外交失败，如鼓动风潮，恐遭外人诘责；省垣各校学生，不得听信谣言，借青岛问题，引起纠纷”。以此掩盖卖国政府的罪行，恫吓学生。同时，他还勒令各校校长管制学生行动。

为了冲破张敬尧的控制，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和各校骨干分子及时研究情况，强调加强团结；同时，广泛地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接触，与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和湖南人民支援北京学生、反对卖国政府的具体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援。新闻界、教育界爱国人士正在为爱国反帝斗争受到张敬尧的镇压而感到苦闷，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谈话，精神为之一振，都表示愿意携起手来，朝着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去努力。

五月九日，长沙的报纸全部报道了北京学生爱国示威游行的情况。《大公报》以醒目的大号字登载了这些惊人的消息：

“曹汝霖狼狈逃避六国饭店，因北京人心激昂，不能见容”；

“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学生殴伤甚重，性命已在呼吸”；
“北京学生现被捕三十余人，大学校长蔡元培愿独身抵罪”；

.....

读到这些新闻，爱国的人们无不痛打了卖国贼而高兴，为反动政府的残暴而愤怒。全省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个个摩拳擦掌，决心要以实际行动来冲破张敬尧的桎梏。这时，毛泽东同志又亲自写了一张措词激烈、鼓动人心的传单，用第一师范等学校的名义发出，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斗争；并组织各校学生继续进行爱国宣传。于是，“毋忘国耻，誓死反抗”等内容的传单继续在城内飞舞；关于山东问题的发展和各地群众示威的消息，不断在群众中传播。

张敬尧钳制新闻、堵塞湖南人民耳目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这个以扼杀革命运动为职志的反动军阀，老羞成怒，变本加厉地对爱国运动实行野蛮镇压。他散布“过激党来到了湖南”的谣言，胡说学生的革命行动是“过激党”捣乱。派人暗中侦探，公开到学校搜查、追捕散发传单的学生。还责令各校校长严厉管制学生，压制学生的爱国行动。

面对张敬尧的高压政策，毛泽东同志更加认识到加强团结，建立全省学生爱国运动统一领导机构的必要性。

这时，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很多代表分赴各省活动。到湖南的代表是邓中夏同志^①。毛泽东同志就组织湖南学联的工

^① 邓中夏，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从党的二大以后，一直是中央委员，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等职。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后被引渡到南京，英勇就义。

作，与邓中夏同志进行了周密的商讨。接着又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

会议在楚怡学校举行。毛泽东同志向大家介绍了邓中夏同志，并请他介绍北京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当邓中夏同志讲到北京二十六个中等以上学校举行总罢课，表示不罢免卖国贼决不复课的情形时，会员们深受鼓舞，情绪非常激昂。这时，毛泽东同志趁热打铁，提出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以推动反帝爱国运动的问题，会员们一致赞同，当即决定各自返校，分头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

毛泽东同志首先到学生组织比较健全、基础比较好的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与学生中的骨干分子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然后扩大活动范围。他向学生骨干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然后提出斗争的任务：第一，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要明确，要力争山东主权的完整，坚决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第二，要有统一的组织，使力量集中，声势浩大，以取得斗争的胜利；第三，要对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有足够的估计，要对付张敬尧所施加的压迫，使斗争坚持到底。

经过几天的联络、协商，五月二十八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了。学联公开发表了章程，宣布宗旨为：“爱护国家，服务社会，研究学术，促进文明。”会长彭璜^①是新民学会会员，其他负责人或者是会员，或者是与学会有密切关系的进步学生。会址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内。毛泽东同志经常来这里和学联负责人研究问题，指导工作。学联成了毛泽东同志领导湖南人民革命斗争的指挥所。

^① 彭璜，号殷柏，湖南湘乡人，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也是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二二年去世。

按照毛泽东同志与学生骨干事先拟订的计划，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立即通过了全省学生总罢课的决定。六月三日，学联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罢课宣言。宣言写道：“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京师学界倡正义于先，津沪群英树声援于后，内之振我民气，外之挫彼敌锋，共矢忠贞，以示天下。乃者我政府于外交既无补救之良方，于内政复无坚决之表示，因循姑息，甘陷沦亡。夫学生之求学，以卫国也，国既不存，学于何有？我湖南学生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势之要求，决议自六月三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①学联还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中日一切不平等条约、严厉制止摧残爱国运动等项要求。

这天，一师、商专、法专、湘雅、雅礼、岳云、明德、兑泽、达材、楚怡、长郡等二十个学校的学生举行了总罢课。随后，各县学生纷纷响应。湘潭组织了学生联合会，举行了全城学生总罢课。衡阳成立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地处偏僻山区的武冈县，也成立了“团结会”等学生组织，举行了罢课示威，决心“挽救危亡，生死以之，义无反顾”。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席卷全省。

“六·三”罢课以后，学生成群结队地涌向街头，不畏炎天酷暑，进行爱国宣传。他们到热闹街市作讲演，常常是讲者声泪俱下，听者掩面而泣。特别是学生自编自演了《鸦片战争》、《哀台湾》、《朝鲜亡国惨史》等新剧，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长沙的报纸说：“岳麓山前充满着爱国热和一片救国声。”

毛泽东同志在组织学生爱国活动的繁忙工作中，常挤出时间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一位当年在一师附小读书的女学生，

^① 见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湖南《大公报》。

后来回忆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开展宣传活动的情景时说：“我最难忘的是毛主席第一次给我们演讲的情景。我们称他毛老师，但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叫我老师，我是你们的老同学，以后就叫老同学好啦！’当时我们只是四年级的小学生，毛主席却把我们当作老同学，大家感到亲切和温暖，非常敬爱这位‘老同学’。毛主席每一次来演讲前，我们整个小学部的同学，都坐在大礼堂的竹椅上，有好几百人。大家都在热切等待。一见毛泽东出现，都热烈鼓掌，有些小同学高喊：‘老同学来啦！’更有些高兴得跳了起来！”“他讲的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决不接受‘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另外还讲抵制日货。由于我们都是小学生，都是十岁至十多岁的孩子，毛主席以极其浅白的语言向我们解释什么是‘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还讲怎样抵制日货。他说：‘买玩具不要买日本货，我们要爱自己的国家。’他的演讲完全可以激发我们小学生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他的语言生动活泼，手势又多，激动中带有幽默，大家非常喜欢听他演讲。但可惜毛主席每次只讲一个钟头，就要匆匆忙忙地走啦。同学们都舍不得他，很希望他多逗留一阵子。”^①

全国形势急剧发展，五四运动到六月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六月三日，军阀政府大批逮捕在北京街头演讲的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不仅学生运动更加高涨，而且广大工人群众也投入了战斗。从六月五日开始，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工人纷纷举行大规模罢工，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随后，全国许多城镇纷纷响应，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五四爱国运动突破了学生的圈子，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全国范围的革

^①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香港《文汇报》特稿《毛主席演讲激励人心——戴馨女士忆述半世纪前往事》。

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段祺瑞卖国政府终于被迫撤销了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在十月革命的启示下，在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开始倡导革命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群众。

这时，张敬尧制止罢课不成，便下令各校提前放假，妄图迫使学生离校，从而瓦解学生爱国运动。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提前放假的机会，发动学生深入工农群众，扩大爱国运动。他们把回乡学生组织起来，成立讲演团，到各县城镇和农村开展爱国宣传；又把留在长沙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救国十人团，到街道、码头、车站，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学联负责人都集中住到商业专门学校，以便掌握斗争动向，及时研究斗争对策。

当时，长沙的洋货店中，日货占百分之八、九十。有不少的商店虽然参加了国货维持会，但实际上是维持日货的，只是由过去的公开贩卖变成了偷运暗卖罢了。起初，学生不熟悉日货及奸商的诡计，常常受骗。但奸商的行为，却逃不脱工人的耳目。经过爱国宣传，工人觉悟起来了。搬运工人明为店主搬运货物，暗中却在监视奸商；店员工人在商店的日货中暗灌煤油或水，使它腐烂变质；对打着国货招牌卖日货的奸商，工人用各种办法把消息传给学生，暗中在他的招牌上书写“亡国奴，卖日货”等字样。长沙第一纱厂、黑铅炼厂、造币厂的产业工人和泥木等行业工人，组织了宣传队，店员工人和铁路工人组织了“锄奸团”，有力地打击了负隅顽抗的奸商和日商。

为了惩一儆百，并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政府进行一

次大示威，七月七日，学生、工人联合各界群众举行了焚烧日货游行示威大会。游行队伍从绸布公所出发，经过长沙最热闹的道路，浩浩荡荡地向教育会坪前进。沿途，万众欢腾，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到了教育会坪，将没收来的日货堆放一处，点火焚烧。火焰欢快地跳跃着，把人们的脸庞映得通红，就象一朵朵红花，迎风怒放。不一会，收缴来的日货全部焚为灰烬。

各县在长沙读书的学生回县后，即与当地学生和爱国人士联合，深入城镇乡村，开展爱国宣传和抵制日货运动，促进了全省各县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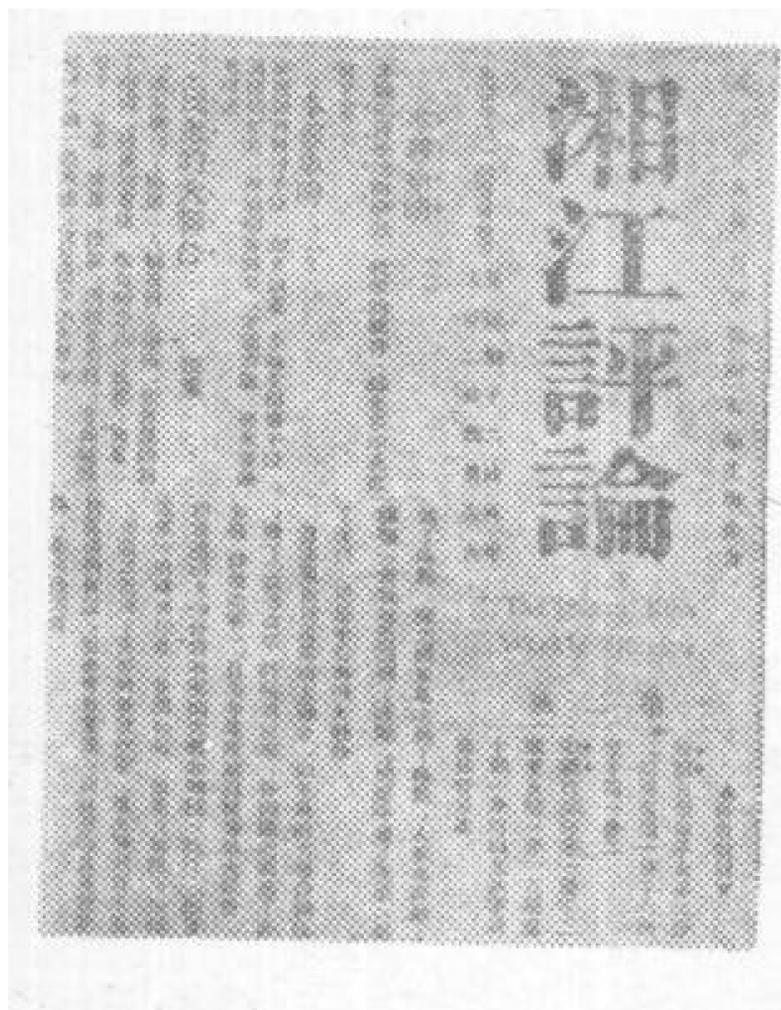
在革命斗争中，湖南学生联合会与各界、尤其是工界有了初步的联合。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界人民，深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毛泽东同志倡议下，七月九日，由学生联合会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月底，各界四百多个“救国十人团”也统一组织起来，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湖南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全省各界的大联合。

在这场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了很多骨干分子，他们经过了斗争的考验，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新民学会吸收了二十多名新会员，加强了学会的战斗力量。

在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摸索和积累了斗争经验，为以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湘江评论》

在五四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传播革命思想，湖南学生联



合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并推选他为主编。经过十多天的紧张筹备,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出刊了。

当时,由于五四运动的推动,全国许多地方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组织社团,出版刊物。仅长沙一地,就有《救国周刊》、《明德周报》、《女界钟》、《励

进会周刊》等十种报刊。在全国范围内,五四运动后一年的时间里,出版的刊物竟达到四百多种。《湘江评论》是其中思想性、战斗力最强的刊物之一。

毛泽东同志对《湘江评论》的出版,呕心沥血,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当时住在他隔壁的周世钊后来回忆说:“他很忙,日里除教课外,时间都花在推动学生运动的活动上面。他要到很多学校去联系,要和很多来访问他的人交谈,还要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会议,为刊物写文章常在夜晚。他要写的文章既多,要谈的问题又复杂,每每写到午夜以后还没有睡。我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子里灯光荧荧,知道他正在振笔挥写。有几次他睡得太晚了,早晨没有醒来,等到第一堂课铃声响后,才起床穿衣,来不及洗脸吃饭,就急忙拿着教本、粉笔到教室授课。我们劝他晚上应该早点休息,他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一点,少睡几点钟没关系来回答。”他身兼几任,既当编辑,又管校

对，还亲自执笔写文章。《湘江评论》的许多文章，都是他亲自撰写。有时，他还上街卖报。

《湘江评论》每周一期，四开一张，约一万二千字。内容丰富多样，文字生动活泼。有长篇大论的巨型炮弹，有三言两语的匕首投枪；有纵横捭阖的《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有尖锐泼辣的《杂感》和雅俗共赏的《简讯》。无论是长文、短论、杂评或简讯，都是针对着敌人的要害，进行准确的猛烈的射击。

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中，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的《创刊宣言》，一开头就指出：“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它热情澎湃地宣告：“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从这一任务出发，毛泽东同志除了撰写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二至四期外，还写了国际、国内大事述评和各种类型的杂感共三十多篇。这些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它所引起的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无情地揭露、声讨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又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宣告：“天下者我

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洋溢于毛泽东同志笔下的这种藐视一切反动势力的革命胆略和大无畏精神，这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革命英雄气概，以所向披靡的气势，鼓舞着人民群众冲决一切罗网，向腐朽黑暗的反动势力猛烈进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和深刻的分析。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热情地写道：“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

一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爆发了革命，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世界革命人民为之高兴，而帝国主义则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六月，在巴黎召开的经济会议上，一些帝国主义分子议决对匈牙利实行封锁，扬言“要直到匈政府宣言愿意遵从民意时为止”，妄图扼杀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同志对帝国主义这一反动行径，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和尖锐的讽刺，对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热情的称赞。他写道：“协约国看错了匈政府与匈国民志愿不合。匈政府与匈国民之少数有产阶级、绅士阶级，志愿不合是有的；若与大多数无产阶级、平民阶级，断没有志愿不合的理，因为匈政府原是他们所组织的。”^①他嘲笑那些帝国主义分子说：你

^① 《湘江评论》第一期《实行封锁》。

们实行封锁，正好帮助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播，真是“功莫大焉”。

毛泽东同志更以十分兴奋的心情，为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拍手叫好。他说：“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①他号召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奋发起来，把革命斗争不断推向前进。

面对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中国的反动派胆战心惊，坐立不安。他们捕风捉影，制造谣言，诬蔑十月革命，诋毁布尔什维克，一再下令查禁“过激党”。盘踞在湖南的军阀张敬尧四处叫喊：“湖南不得了，过激党来了。”蓄意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恐惧和混乱，好象湖南人民就要大难临头了。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同志在《研究过激派》这篇杂评中，尖锐而辛辣地指出，那些盲目乱喊的人，对“过激党”“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这篇杂评发表后，一些进步青年写文章给《湘江评论》，驳斥反动派的诬蔑，义正词严地质问：什么叫做过激党？过激党的主义若何？过激党的人物怎样？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能够答复我么？并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本义是多数党，它的主张是工农劳动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可是反动的军阀、贵族，害怕这种思潮会动摇他们的阶级统治，于是就称它为“过激党”。那些被反动派强指为“过激党”的人，实际上都是些“舍命救国的志士”，为国家“争回权利，从强权者索还自由的志士”。“湖南倘然真来了过激党，恐怕就是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的招惹。”并且警告那些跟着反动派瞎喊的盲人们，“要洗洗眼睛，缩缩脑袋”。^②

^① 《湘江评论》《民众的大联合》。

^② 《湘江评论》第三期，慎厂：《盲目的中国人》；子博：《那一个是过激》。

毛泽东同志在歌颂十月革命的同时,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勇猛的抨击。

当时,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对德国的胜利,说成是“人道”和“公理”的胜利,大肆宣扬和庆祝。国内很多人虽然有反帝爱国的思想,却不能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上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指出:这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大战的结果,是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国际强权”打倒了德、奥帝国主义的“国际强权”,并不是什么“人道”、“公理”的胜利。①出席巴黎和会的美、英、法、日等国的代表,虽然“满嘴平等正义”,实际上是“一类的强盗”,他们在“和会”上所争吵的,不外是谁多“得到若干土地,收赔若干金钱”。②毛泽东同志认为,“和约”虽然签订了,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必然会发生新的战争。他对法国首相克里孟梭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说这个“无知的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的很呵!”③他预见到:“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④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又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了。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是帝国主义的致命伤;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他说:“阶级战争,业已发生,必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

①、③ 《湘江评论》第二期《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

② 《湘江评论》第一期《证明协约国的平等主义》、《可怜的威尔逊》。

④ 《湘江评论》第二期《高兴和沉痛》。

始能停止。”^①当时，英国首相路易乔治发表演说，要求国民“团结兴奋”，“不要浪费精力于彼此斗争。”毛泽东同志斥责这一妄图掩盖阶级斗争的阴谋是“鬼话”，是“胡说”，警告他不要再来这一套。^②毛泽东同志非常藐视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深信帝国主义必然要灭亡。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不要重看了现在和会上高视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他们总有一天会要头痛！”^③他们的“末日审判”就要到了。^④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扩大和十月革命影响的深入，动摇了反动军阀和整个封建势力的统治，他们对新文化、新思潮进行疯狂的反扑，极口称颂中国的封建文化思想，认为这是中国的“国粹”，是西方的文化思想不能比拟的“精神文明”，妄图继续用孔丘的伦理纲常捆住人民的手脚。毛泽东同志对这些谬论给予了迎头痛击。当时，长沙教育界的一些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研究新思潮的学术团体“健学会”，毛泽东同志立即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给予支持。《湘江评论》为此专门发行“临时增刊”第一号，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连夜赶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严正宣告：“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康有为大肆鼓吹孔教，对广州因为修马路而拆毁宣扬封建礼教的“明伦堂”大动肝火，说什么这是“侮圣灭伦”，“非民国所宜”，“遍游各国，未之前闻”。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斥责这种谬论说：“康先生的话真不错，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

① 《湘江评论》第一期《炸弹暴举》。

② 《湘江评论》第三期《政治家》。

③ 《湘江评论》第二期《德意志人沉痛地签约》。

④ 《湘江评论》第一期《炸弹暴举》。

不出什么明伦堂。”^①“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②又有一个名叫张元奇的反动议员，扬言“应尊孔逆挽潮流”。毛泽东同志指出，用尊孔来“逆挽潮流”，就象让扬子江里的潮流从昆仑山翻过去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辛辣地嘲笑这个议员说：“张先生果然有此力量”，那么，“我们到欧洲的，就坐船走昆仑山罢！”^③对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妇女同胞，毛泽东同志深表同情，为她们大声疾呼，号召她们组织起“女子革命军”，砸烂封建主义的枷锁，求得自身的解放。

握紧的拳头才有力量。毛泽东同志认为，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社会改造，“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在《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重要文章中，他强调了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指出人民群众发动与否，是决定革命胜负成败的关键。他说：“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而这种联合能否取得胜利，“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的）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用以说明：反动阶级的联合，加深了社会的黑暗和人类的痛苦；打破这种联合的根本办法，就是人民大众的大联合。他特别指出：“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同志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

① 《湘江评论》第一期《各国没有明伦堂》。

② 《湘江评论》第一期《什么是民国所宜》。

③ 《湘江评论》第一期《走昆仑山到欧洲》。

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只停留在少数人的活动上,没有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这个革命“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同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则是由于“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

民众的大联合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毛泽东同志认为:“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他说,贵族和资本家想出种种法子,占有大量土地、机器、房屋和金钱,可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仅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他们又垄断了教育,掌握了武装,借以愚昧和镇压劳动人民,维持他们的统治和剥削。然而尽管他们控制了“金钱”、“智识”、“武力”这三种法宝,他们毕竟人数很少,只要广大民众提高觉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就可以推翻他们的统治,求得自身的解放。

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认为大联合要从小联合做起,以各阶层人民的切身利益做为小联合的基础,以各革命阶级的共同利益做为大联合的基础。他号召:中国工人按产业和行业联合起来,为解决工资、工时、政治权利和文化教育等问题而斗争;中国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学生、教员、妇女等也都应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改革和斗争。在各阶层人民联合的基础上,组成民众的大联合,为取得反帝反封建、改造社会的胜利而坚决战斗。

根据对中国人民大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同志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结尾时,得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结论。他豪迈地宣告:“我们中华民族原

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必告成功。“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当然,由于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处在由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思想还不够成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如何打倒强权”的问题上,他“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①在他看来,只要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②,就可以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倒台,而不一定要采取“用强权打倒强权”,“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强调要发动和联合广大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观点,比辛亥革命时的孙中山先生只看到会党、新军和少数华侨的作用,是前进了一步。但是,由于他对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缺乏全面的了解,以为反动派的军队,都是由工人农民组成的,只要人们起来振臂一呼,他们就会掉转枪口,对着反动军阀和政客,而未认识到采取暴力革命和流血斗争,对于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在几个月以后,当他进一步接触并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便抛弃了这种“无血革命”的观点。

瑕不掩瑜。高举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旗帜的《湘江评论》,众所公认,是我国“五四”时期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是中国革命史上一面光辉的红旗。它给人们明确地指出了斗争的方

^①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② 《湘江评论》《民众的大联合》。

向。它那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气概，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准确、鲜明、生动活泼的文风，都给人们以斗争的信心、勇气、力量和希望。它与群众的斗争和解放息息相关，群众把它看成是真正代表自己说话的喉舌。有的说：“《湘江评论》就是湘江的怒吼”；有的说：“《湘江评论》就是湖南人民的声音”，是“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外省许多人士也称赞它“眼光远大”，“魄力充足”，“议论精湛”，“内容完备”，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刊物之一。北京的《每周评论》还称赞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对毛泽东同志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许多人更是推崇备至。成都的《星期日》周刊和北京的《又新日报》，都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上海的《时事新报》也转载了一部分。此外，《每周评论》、《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也都做了推荐和介绍。《每周评论》介绍：“《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当时，学校的教师、学生和社会上一些进步知识分子，都成了《湘江评论》的热心读者。每期《湘江评论》送到各校阅览室，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阅读。第一期原来只印了两千份，一天就卖光了；后来又加印了两千份，不到三天又都卖光了。于是从第二期起，就印行五千份。这在当时发行的刊物中，已是很大的数量了，但仍然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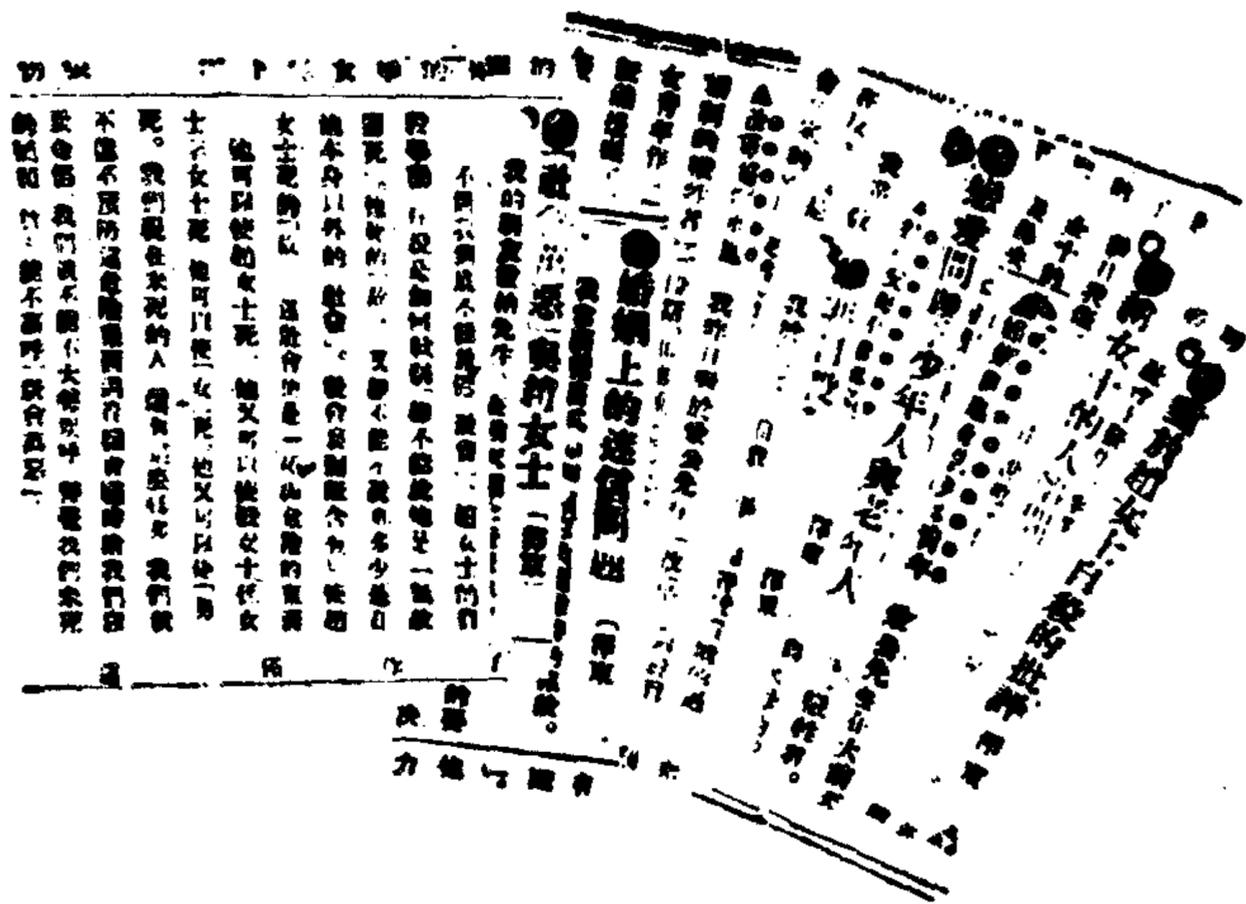
《湘江评论》的出刊，对于反动统治阶级来说，无异于爆炸了一个重磅炸弹。他们惊恐之余，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说它是“怪人怪论”，“无稽之谈”，“大逆不道”，时刻准备动手把它扼杀于摇篮之中。一九一九年八月中旬，第五期刚刚出版，还未来得及发行，张敬尧就派出军警，闯进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强行解

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不准《湘江评论》出版发行，并对承印《湘江评论》的湘鄂印刷公司威胁说：“不准再为承印，否则定加严惩。”

刚刚诞生一个多月的《湘江评论》，虽然只发行了四期和一期临时增刊，但它的影响却很深远。很多进步青年，在它的启发和鼓舞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肖劲光同志在为悼念任弼时同志逝世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弼时同志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主席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①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湘江评论》被迫停刊后，毛泽东同志和学生联合会的其他负责人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这时，各校学生会的周刊仍在出版。毛泽东同志通过学生周刊联合会，统一各校周刊的奋斗目标和宣传内容，提高它们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充分发挥它们的战斗作用。九月间，毛泽东同志接手主编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的刊物《新湖南》。该刊已出至第六期，毛泽东同志接办后，发扬了《湘江评论》的革命精神，提出以“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为宗旨，坚持“什么都可以牺牲，唯宗旨绝对不能牺牲”的原则立场，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势力，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新湖南》刊登的政治论文《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当时被认为是“洋洋数千言，说的很透”的精彩文章。《新湖南》刺到了军阀的痛处，出到第十期，又被张敬尧

^①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悼弼时》。



强行封闭了。此后，毛泽东同志就抓住一切机会，利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发表文章，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以及罪恶的封建制度，进行揭露和抨击。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长沙发生了一件震惊整个社会的事件：南阳街一个姓赵的眼镜店老板，要把二十三岁的女儿赵五贞，嫁给柑子园年已四十的古董商吴凤林做续弦。进过学校、接受过新思潮影响的赵五贞，不愿任人摆布，要求解除婚约。但父母贪图吴家钱财，不仅不肯答应，反而痛骂一顿。赵五贞走投无路，愤而自杀，因被人发现，未遂。十一月十四日，吴家前来接亲，赵五贞的父母强把她押上花轿。路上，她用暗藏在身上的剃刀刎颈而死，用自己的生命，向万恶的封建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赵五贞死后，许多群众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毛泽东同志觉

得,这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反封建教育的极好时机,于是抓住这一事例,从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十三天之内,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九篇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揭露封建制度黑暗、残酷和吃人的本质,号召人民起来为改造旧社会而斗争。当时,长沙有的报纸胡说赵五贞是“改革婚姻制度的牺牲者”。许多进步的评论也只是把赵五贞的自杀归罪于“母家”、“夫家”的强迫包办;毛泽东同志却深刻地指出,罪恶的根源是社会制度的腐朽。他分析了逼死赵五贞的环境是社会、母家、夫家所构成的“三面铁网”,而“母家夫家,都是社会的一个分子”,他们固有直接罪恶,但“罪恶的来源,仍在社会。”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这个社会可以使赵女士死,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它可以使“女”死,又可以使“男”死。因此,我们“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①毛泽东同志通过分析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找到了“万恶”的总根源就在于社会制度的腐朽、反动,进而得出一条正确的结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要用革命的手段来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否则,一切都无希望。

对于赵五贞的自杀,毛泽东同志虽然也寄予同情,肯定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精神,但是他觉得自杀是消极的态度,不值得提倡。他认为,“与其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主张与社会奋斗,争回所失的希望”,即使“截肠决战,玉碎而亡”,也在所不惜,这才是“天下之至刚勇”,才是值得称赞的。^②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是声讨旧社会的檄文,是向封建礼教的宣战,激励着青年们起来,朝着万恶的旧社会猛烈冲击。

①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南《大公报》《“社会万恶”与赵女士》。

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湖南《大公报》《非自杀》。

驱张运动和第二次到北京

“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这首民谣，道出了湖南人民对军阀张敬尧和他的弟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的无比愤怒和痛恨的心情。一九一九年秋，毛泽东同志代表群众的意愿，组织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张敬尧是个皖系军阀。一九一八年三月，直皖联军击败了湘桂联军，赶走了驻湖南的湘桂联军司令谭浩明，张敬尧率兵进入湖南，爬上了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宝座。他盘踞湖南两年多，烧杀抢掠，搜括民财，摧残教育，钳制舆论，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张敬尧进入湖南时，他统辖的“北军”，就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北军”一到醴陵，“重燃劫火，大肆诛屠”，“延烧十里，火达数朝”，他们“杀戮之余，继以淫逼”，并且“拦路以劫客，临田而夺牛”。^①张敬尧的义子、强盗出身的张继忠，驻扎在新化，全县几乎没有一户人家不受到他的残害。

为了填满私囊，张敬尧借口整顿金融，以各种方法进行搜括。他利用开办裕湘银行的机会，强令私商招认资本金，攫取了五百万元巨款；又以收回市面滥票为名，向商民推销“有奖惠民券”，搜括了银洋一千万元；同时，他又下令裕湘银行发行银元票一千万元，铜元票三千万元，使原来滥票充斥的市场，更加恐慌混乱，物价一日数涨，造成了“湘垣石(担)米需钱百串，斤盐需银四两，人非淡食，即属绝粮”^②的惨状。张敬尧还借口“清理湖田”，公开盗卖沅江官附垸湖田一万二千多亩。他又勾结日商和

^① 《湘灾纪略》卷一第三三六至三三八页。

^②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旅沪湖南善后协会上南北当局书》。

美商，阴谋盗卖湖南主要工业第一纱厂和主要矿业水口山铅锌矿。

张敬尧大肆摧残湖南教育事业。他的军队强驻学校，损毁器具，把图书当柴烧，拿仪器耍把戏。他扣押学校经费，致使许多学校，负债累累，以至断炊。一九一八年十月，第一师范等五所公立学校的校长，因经费无着落，联合向张敬尧辞职；十一月，又有九个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校长联合交印辞职。

五四运动以后，张敬尧更加仇视学生，时常加以侮辱。一九一九年七月七日，湖南学联在教育会坪焚毁日货时，张敬尧亲自出马，把各校学生代表和一些教职员找到教育会，威胁说：“不准游街，不准开会，不准检查商店。你们要好好读书、教书，否则，本帅就要办人！”

对于张敬尧的野蛮统治，湖南人民一直是进行反抗斗争的。一九一八年六月以后的几个月时间内，由于张敬尧滥发纸币，物价飞涨，长沙人力车、泥木、笔业、纸业、酿酒和漆业等行业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先后举行罢工。但这些自发的罢工斗争，在张敬尧的压制和各业主的联合打击下，都没有取得胜利。张敬尧的残暴统治日益加深，人民的愤怒情绪有增无已，大家发出悲愤的呼声：“张毒不除，湖南无望。”一场驱张的政治斗争，已迫在眉睫。

一九一九年六月，湖南学联刚成立，即派负责人彭璜等到上海作反张宣传，积极联络省外力量进行驱张斗争。张敬尧解散湖南学联和强令《湘江评论》停刊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学联的骨干分子，便秘密地进行驱张活动。他以学联为基础，联络湖南教育界、新闻界，商讨驱张办法。十一月十六日，学联以重组的方式恢复公开活动，发表重组宣言。宣言指责“政府麻木，措施乖

方”，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何有之乡，惟一己之骄奢是纵。”这个宣言，实际上是湖南人民的第一份驱张宣言。

正在这时，长沙发生了一件震惊人心的事件：十一月二十六日，长沙学生纠察队和店员工人，在小吴门火车站查出大量日货，大家要求马上焚烧。可是奸商勾结军警，出动武装，强行抢走。张敬尧还下令保护日货，不准焚毁。学生、工人们愤恨已极，不顾张敬尧的无耻命令，于十二月二日又举行焚烧日货示威游行。全市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共约万人，高举“民众联合”、“牺牲奋斗”、“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旗帜，抬着大批日货，涌向教育会坪，准备焚毁。这时，张敬尧的参谋长、号称“四帅”的张敬汤，倚仗兵势，助桀为虐，率领一营士兵和一连大刀队闯进会场，将学生团团围住。他自己往台上一站，破口大骂：“放火，抢东西，就是土匪，男学生是男土匪，女学生是女土匪。对土匪还要讲道理么？打啦！办啦！就是道理。”张敬汤一声令下，大刀队蜂拥而上，将台上的学生代表数人押跪台下；几百个士兵，如狼似虎，殴打学生和工人，冲散示威队伍，用刺刀对着示威者的胸膛，逼着他们离开会场。这次焚烧日货的爱国行动，就这样被张敬尧用武力镇压下去了。学生回校后，愤怒异常，但又不知如何是好。

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主要干部，研究形势，商讨对策。他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张敬尧横蛮残暴，湖南人民恨之入骨，广大青年学生和教育界更是忍无可忍，驱张已有群众基础；张敬尧劣绩昭彰，臭名远扬，驱张可以得到外省舆论的声援和支持；直皖两系军阀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驱

张有矛盾可以利用。因此，当前是发动驱张运动的大好时机。经过讨论，决定立即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与张敬尧进行坚决斗争。

当时，有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对罢课驱张抱有怀疑观望态度；有的主张驱张，但不主张罢课。毛泽东同志一面与湖南健学会的骨干分子商量，由健学会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罢课驱张的认识，由他们发动其他教师和广大学生；一面以学联的名义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进一步研究发动群众问题。他在代表会上听取大家意见之后，强调指出：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卖国政府、封建军阀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此时此地具体的爱国行动。平时大家都赞同爱国，赞同改造社会，现在是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毛泽东同志激动的感情，坚定的语气，给大家极大的鼓舞，扫除了一部分人的畏难情绪，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对于实现总罢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十二月六日，第一师范、商专、修业、楚怡、周南等学校首先罢课。不到一星期，长沙全体专科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都罢课了。学生联合会代表长沙一万三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战斗誓言：“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

为了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酝酿罢课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在楚怡小学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的有新民学会和学联的骨干、教育界部分人士。会议决定：立即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扩大驱张运动的影响，掀起一场声势更加浩大的革命斗争。

在长沙学生罢课的同日，毛泽东同志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途经武汉时，他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份“快邮代电”，电文说：“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骋猛虎之

政,铲刮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彼张贼兄弟累资各数千万,……欲攫尽湖南财产,吃尽湖南人民。”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张敬尧的祸湘罪行。这时,武汉学联在鲇鱼套车站发现了为张敬尧偷运的五十包鸦片种子,他们拍成照片,在报上公布,把张敬尧搞得狼狈不堪,有力地配合了湖南人民的驱张斗争。

毛泽东同志到达北京后,组织了一个“平民通信社”,亲自担任社长。通信社从二十二日开始,向全国一些主要报刊发稿。“每日发之稿件百五十余份,送登京、津、沪、汉各报”。毛泽东同志当时住在北长街九十九号一个名叫福祐寺的喇嘛庙里。大殿中一张长长的香案上,放着油印机和一些文具、书籍、稿件,这就是他工作的地方。白天,他组织和领导驱张运动,奔波忙碌;晚上,就坐下来编写稿件。北京的隆冬,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福祐寺东墙外的故宫护城河已经结冰。不知有多少个寒气袭人的夜晚,毛泽东同志坐在香案旁,在昏黄的灯光下,时而凝神沉思,时而振笔疾书。他通过这一篇篇稿件,把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和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传布到全国,教育和鼓舞了广大群众,推动了驱张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他和代表们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等,向他们宣传驱张的意义。二十八日,在前门外的湖南会馆召开了千人大会,由赴京代表报告了驱张的形势,控诉了张敬尧的罪恶,明确而坚定地表示驱张的决心,获得了到会的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与“辅社”建立了密切联系。“辅社”即“辅仁学社”,取名于“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意思。它原是湖南

长沙长郡中学的一个以学生为基础的学术团体，成员约有三十余人，成立略早于新民学会。到五四运动前后，由于大多数成员或出国留学，或到北京等地读书，该社逐渐停止了活动。毛泽东同志到北京后，主动与辅社在京的成员联系，动员他们参加驱张运动，使他们成了驱张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和邓中夏同志及在京的辅社成员，在陶然亭商讨驱张斗争，并合影留念。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雪花飞舞，北风劲吹。中午十二时，湖南驱张代表团和北京部分革命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在毛泽东同志的率领下，手执写着控诉张敬尧罪恶的小旗子，迎着寒风，踏着积雪，分别从前门、后门、西华门出发，浩浩荡荡地涌向伪总理府新华门，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一路上口号声此起彼伏，愤怒的群众，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把往日军警戒备森严的新华门，变成了革命人民声讨军阀的战斗阵地。在向军阀政府示威之后，群众队伍又冲向总理私宅。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率领其他五名代表，同反动官僚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历数了张敬尧祸湘虐民的二十多条罪状，表达了三千万湖南人民的战斗意志。最后，他们将游行群众手执的写有张敬尧罪状的旗子，收拢了一大捆，交给反动政府的代表，以示抗议。二月四日，毛泽东同志再一次率领驱张代表团到伪总理府请愿。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员龟缩在新华门内，不敢露面。

在驱张运动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新民学会会员中，有人曾提出意见：“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针对这种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对驱张运动的意义进行了讲解，他指出，驱张运动虽然“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

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但是，“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①

当时，社会上有一股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地对驱张运动进行破坏和捣乱。他们网罗了一些反动的官僚、议员、绅士和所谓“社会名流”，七拼八凑地组织了“旅京湘事维持会”和“湖南旅京各界联合委员会”。有的公开保张，有的摆出一副貌似公正的姿态，表面上假惺惺地喊着“驱张”，实际上干着明反暗保的勾当。当阴谋被揭露以后，他们又利用报纸杂志，煽阴风，放暗箭，诬蔑攻击驱张运动。毛泽东同志对这两个保张团体，进行了坚决的抨击。他第一个署名的《湖南驱张代表电讨保张团》的电文，一方面控诉了张敬尧的罪恶，指出“三年以来，湘民之困苦颠连，九死一生，家无应门之童，野有自缢之女，何一非张敬尧之所赐？”一方面又一针见血地揭露“旅京湘事维持会”是卖身投靠反动军阀的“保张团”、“卖乡党”，他们“受张多金，纠合三数私党，为骗钱计，不惜卖乡媚敌，都中同乡，羞与为伍”。对于保张集团在社会上散布传单，“以伪乱真，浮词耸听”的罪行，也一一给以痛斥。电文还重申了湖南人民要以“驱张除奸为职志”，坚决和“保张团”、“卖乡党”斗争到底的决心，号召大家起来“共击卖乡保张之贼”。^②经过毛泽东同志和驱张代表团的坚决斗争，保张团体终于土崩瓦解了。

粉碎了反动势力的破坏捣乱，纠正了内部少数人的错误思想和糊涂认识后，驱张运动迅速地扩展。京、津、沪、汉等地的报

^①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②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北京《晨报》。

刊，连续登载了有关湖南人民的驱张活动及各界团体声讨张敬尧的文章。去上海的代表团和原在上海的反张组织“湖南善后协会”，出版了《天问》、《湖南》等刊物，宣传驱张。《天问》周刊明确宣告：“宗旨以排去张毒为初步，铲除军阀为究竟。”京、津报纸发表了《政府尚不撤办张敬尧耶！》、《张敬尧可以已矣！》的时评。全国各地许多学生团体，纷纷发表要求惩办张敬尧的宣言、通电，全国各界联合会发表《声讨张敬尧通电》，全国学生联合会致书张敬尧，请他“引咎自退”，走为上计。甚至在国外留学的湖南学生也通电讨张。去衡阳的代表团利用直皖军阀的矛盾，要求吴佩孚派兵驱张。吴佩孚是直系军阀的大将，一九一八年直皖联军攻入湖南时，他的“战功”最大，但是皖系军阀张敬尧捷足先登，爬上了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宝座，而他却被投闲置散地派驻衡阳，以监视湘军头目谭延闿，保护张敬尧。吴佩孚对张敬尧早已心怀不满，因此当代表团要求他派兵驱张时，他即答应设法。何叔衡等同志趁机将衡阳的学生组织起来，并出版了《湘潮》周刊，大力宣传驱张。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一日，在驱张斗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同志离开北京去上海。在上海，他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今安义路六十三号），用“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同支持驱张斗争的各界人士进行联络，指导驱张刊物《天问》的编辑工作，并亲自为七月四日发行的《天问》第二十三号撰写了《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毛泽东同志在上海期间，同往常一样，生活还是那样的艰苦朴素。当时住在一起的五个人，自己煮饭，轮流值班，吃的大都是油盐蚕豆拌大米煮成的饭。随同毛泽东同志来上海的两名公民代表住在亭子间里，一位女学生代表住在灶披间，毛泽东同志和另一位学生代表住在前楼，床上铺的盖

的都是自己带来的蓝底印花土布被褥。而床头上，桌子上，则大堆大堆地放着长沙、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出版的书刊。为了推动驱张斗争进一步向前发展，毛泽东同志常常工作到深夜。

驱张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张敬尧在省内外一致声讨的情况下，惶惶不可终日，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为了进行垂死挣扎，他加紧了镇压活动：明令查办何叔衡同志等教育界驱张代表，通告全国把何叔衡同志等从教育界开除，“永不叙用”；通令各校开除学生代表，强指学生代表“是过激党”，公开公布名单，下令军警通缉；并强令各校开课，三令五申地严禁学生组织社会活动。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针对张敬尧的倒行逆施，各校学生采取了巧妙的斗争手段，如利用旅馆、茶楼作活动场所；发表宣言，劝阻学生入校，另设各种临时补习学校；组织剧团，编演反帝反封建的新剧；暗中为代表团筹款等等。这样，尽管张敬尧的警察厅采取了各种恫吓手段，也无法把学生的驱张活动镇压下去。

这时，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的矛盾已接近爆发，驻湖南的直军急欲撤兵北上以集中力量。一九二〇年五月，吴佩孚部由衡阳北撤，湘军头目谭延闿、赵恒惕得到吴佩孚的默契，跟在他的后面，步步紧逼长沙。张敬尧处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孤立无援，不得不于六月间仓皇逃离湖南。毛泽东同志等领导的驱张运动，经过十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它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封建军阀，教育和发动了人民群众，推动了全国的反军阀运动。

毛泽东同志领导驱张运动期间，政治空气比较活跃。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发表的废除帝俄时代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建立中苏平等关系的宣言，突破军阀政府的封锁，公布

出来了。各界人民对此反映十分强烈，全国三十一个社会团体发了热情洋溢的谢电。《天问》周刊发表文章热烈响应，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应“和俄国农民、工人阶级、红军相提携，为自由而奋战，先竭力打破国内军阀的强权，再竭力打破各国的强权”。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已派代表来中国，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取得联系，交换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研究了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报纸杂志上介绍俄国革命和宣传、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有些进步报刊摘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部分章节，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简要传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还出版了一些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就使毛泽东同志有更多的机会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在第二次北游期间，毛泽东同志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特别是与信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有了密切的联系。在北京，他与李大钊同志经常在一起讨论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和赴俄留学等方面的问题。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了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研究了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当时，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毛泽东同志都发生过较大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认真地观察了多方面的情况，深入地思索了各种问题，并及时地把自己的见闻和想法，写信告诉新民学会会员。他认为，要改造中国，就要避免空发议论，空谈改造，而要研究改造的目的、改造的方法和目前从何处下手等最切实的问题；要组织团体进行共同的研究，避免个人单独的冥思苦想，因为这种“人自为战”的“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的办法。当他得知赴法勤工俭学的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组织了“工学世界社”的消息后，十分关切。立即给罗学瓚写信说：“请

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①他主张在长沙办一个“自修大学”，以便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培养革命干部。还主张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实地考察俄国情形，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

毛泽东同志努力搜寻当时能够找得到的一切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近况的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一九二〇年四月，我国第一次用中文全文印行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了。毛泽东同志以极大的热情，专心致志地学习、研究了这部划时代的经典著作。在这部光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揭露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对各种假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毛泽东同志读了以后，心潮翻滚，热血沸腾，那震撼世界的声音一直在他的耳边回响：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阅读着、思索着，一条用革命暴力推翻反革命暴

^①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力的灿烂辉煌的金光大道，展现在他的面前。从此，他在思想上彻底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旧民主主义的影响，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找到了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宏愿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回忆这一重要时期的情况时说：“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特别印在我的脑海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是由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刻儿枯朴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地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①

^① 斯诺《西行漫记》，复社藏版，一九三八年三月第二版。

第五章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日子里

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

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随后，担任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他以这一社会职业为掩护，积极着手进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际工作。他决心首先“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①

还在这年春天，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和上海的时候，就同彭璜等人，研究过将来驱逐张敬尧以后，如何促进湖南局势朝着有利于革命方面发展的问题。他们草拟了一个题为《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材料，明确提出，要废除军阀统治，民办银行、实业，发展交通运输，废除苛捐杂税，普及义务教育，建立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对这一主张特别作了说明。在他看来，湖南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湖南当然不容易有独立的改变；有觉悟的革命者，应该从事“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不能作改良派，“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但是，“根本解决”的工作，应该从实际入手。

^①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而《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就是从湖南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蓝图。

驱张斗争胜利之后，湖南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军阀张敬尧被赶走了，湘军头目谭延闿（茶陵县人）、赵恒惕（衡山县人），打着“湘省自治”和“湘人治湘”的招牌进驻长沙。谭自任省长，并宣布他“此时仍以（湘军）总司令名义整顿一切”。赵恒惕这时的名义是湘军总指挥。他们向全国发出“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通电，以装潢门面，笼络人心，维持其尚待巩固的统治，同北京军阀政府相抗衡。湖南各阶层人民，由于长期受军阀政府的严重压迫而喘不过气来，切望从此摆脱军阀的魔掌，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因此，对这种新的统治局面，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社会上一般人士都认为，这是实行“湖南自治”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人心为之振奋，各种新的团体应时而起，许多人士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自己对当前政局的主张，高喊“施行民治”、“民治主义”等口号，仿佛梦寐以求的自由、平等、幸福、美好的社会，马上就会在湖南实现。这种轻信谭、赵军阀政府关于“自治”的欺骗宣传，对未来形势抱着一种盲目乐观情绪的倾向，虽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却十分危险。毛泽东同志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看到了这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当即认定，对“湖南自治”的口号要作正确的解释；对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要求，应从积极方面加以引导。

毛泽东同志曾与彭璜、何叔衡等同志，邀集了一批新闻界、教育界人士，发起组织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并在六月二十八日的上海《申报》上，发表了《对于湖南改造之主张》的公开信。信由毛泽东同志执笔，是他和他的战友对于湖南自治问题的宣言。七月六日，长沙各报又都以显著的版面，刊载了这封公开信。信中指出：“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

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归己囊。往事我们不说，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对于什么是湖南自治运动，公开信作了明确的解释，就是要由人民当家作主，来创造湖南的文明。“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不敢辞亦不能辞。”“与湖南文明之创造为对敌者，军阀也，湘粤桂巡阅使也，湘鄂巡阅使也，护国军、靖国军、征南军也；是等之敌对者一律退出湖南境地以外，永无再入湖南境内与湖南人对敌。湖南人得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此吾人所谓湘人自决主义也。”公开信的结尾还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对谭、赵政府提出如下要求：“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此同人之最大希望也。”

一石激起千重浪。公开信发表后，各方面的反应非常强烈。街头巷尾，茶馆酒店，乃至各家各户，都谈论自治问题；长沙各家报纸上，每天总要刊出一两篇甚至三四篇有关“自治运动”的文章。但是对于湖南“自治运动”的意见，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新民学会内部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会员认为应当从事“根本改造”中国的工作，而“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有的则把“自治”本身看成是目的，满足于一些小问题的“零碎解决”。毛泽东同志耐心地向会员们作解释，一方面说明，在当前情况下，抓住时机，引导关于湖南自治的各种活动归入一个正确的轨道，开展民主运动，揭穿谭、赵政府的本质，这虽然不是我们的

“根本主张”，但它“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因此，在“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的前提下，对自治运动“亦可从旁尽一点促进之力”；^①另一方面又告诉会员，搞自治运动，只是实现中国问题“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并说：“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因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②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把革命的长远目标与当前的政治斗争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为了使运动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从一九二〇年九月三日至十月三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十篇评论文章。他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批判各种错误意见，并进一步透彻地阐述了湖南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自治运动，从而拨开了层层迷雾，提高了各界人士的认识，对于揭穿谭、赵之流的欺骗宣传，壮大革命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谭延闿、赵恒惕之流，企图用“湘人治湘”的口号，蒙蔽群众。毛泽东同志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文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谭、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他指出：所谓“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而言，“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因为，如果驱逐张敬尧的目的只是排去“非湘人”，搞换汤不换药的“湘人治湘”，那么，奉天（今辽宁）的张作霖，直隶（今河北）的曹锟，都是本省人，正是“奉人治奉”，“直人治直”，他们比那“非湘人治湘”

①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② 同上。

的张敬尧，“非鄂人治鄂”的王占元，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根本反对“湘人治湘”这句含有不少恶意的话，因为它“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文章最后说：我们不仅不愿被外省的“少数特殊人”来统治，也不愿被本省的“少数特殊人”来统治。我们所主张所欢迎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

针对着社会上有人企图由官绅包办自治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自治运动应该以“民”为主体，即以种田的农人，做工的工人，从事贸易的商人以及努力向学的学生等为主体。假如不是这样，即使有了“自治”的形式，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的，打开一看，一定是虚伪的、腐败的、空洞的。

在各界人士中，还有这样一派议论，说湖南自治这个问题太大，怕开得口。还有些人认为，制定“自治法”非同小可，只有学了政治法律的人，才有资格谈论。毛泽东同志在《释疑》这篇文章中指出，这些人“还是认(为)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为)政治是脑子(里)头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春秋时候，子产治郑，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这些郑人，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意、英、法、美的劳动者，口口声声‘要取现政府而代之’。这些劳动者，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民，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为了让那些长期受反动统治阶级正统思想影响的人们打开眼界，他以通俗而明快的语言接着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

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毛泽东同志号召全体人民起来，与闻政治法律，过问国家大事。他这样写道：“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他认为湖南自治是一件至粗极浅的事，丝毫没有有什么精微奥妙。制定“自治法”，也不一定要根据哪一部法典，可以大多数人来议、来制定，而且只有大多数人议出来、制出来的才有用。不论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教员、兵士、警察、乞丐、妇女等等，都有发言权，都应该发言，也一定能够发言。他甚至在文章中指出：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

湖南自治的舆论已经造成，但是一般人还停留在空发议论的状态。毛泽东同志曾反复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办一桩事业，有了理论根据，若没有一种运动继起，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的。因此，他一面宣传民主运动的理论，一面从事实运动。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和组织下，长沙的广大市民首先行动起来。一九二〇年九月下旬至十月初，以学生联合会为骨干，长沙各界、各团体都在讨论“省自治法”如何制定的问题。

九月十三日，谭延闿召集官绅开会，决定由省政府十人、省议会十一人共同起草省宪法（即自治法），企图包办制订“自治法”的工作。省议会也忙着讨论起草问题。社会上议论纷纷，有的主张除省政府、省议会外，要有教、农、工、商等公法团体和学联、报联参加；有的主张开长沙市民大会起草；有的主张由个人动议，联名起草。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反对政府包办制宪，但认为当前谭延闿还打着“自治”的招牌，这是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不能久事拖延，应该趁热打铁，通过一个省宪法，造成一个“紧箍咒”，加在“湖南省长”头上，这对人民，对推进革命运动是有好处的。

于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新民学会的会员、学联的干部和各界进步人士，以广大学生群众为基础，联合推动教育、新闻、工商各界人士，开始商讨“制宪”的具体步骤。在十月四日的各界联合会上，大家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不采取那种理论上虽完善，而手续太烦琐的作法，应该就让谭延闿这个“革命政府”（谭后来发表谈话，不满意“革命”的称号），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这样既在道理上说得过去，实际上也能做得到。

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彭璜、朱剑凡（教育界著名人士）、龙兼公（《大公报》主编）等三百七十七人联名，在长沙报纸上发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书，主张会议代表应是直接的、平等的、普遍的选举产生；宪法起草与公布之权，应属于人民宪法会议；最后根据《省宪法》，产生湖南正式的议会和省、县、区、乡自治政府，以此来反对谭延闿官办的制宪活动。

当时，长沙最有威信的群众团体是湖南学生联合会。十月六日，学联向各团体发出信件说，实现湖南自治，“此际实是唯一最好之时机，千钧一发，稍纵即逝，优游岁月，后悔莫及！今省内外上下人士之所主张者，或则徒托空言，或则各执己见，或则存心敷衍”。信中要求各团体选派代表开会，讨论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问题。同日，学联发给各校的通知则明白指出：“双十节举行市民游行大会，一以警告政府，一以唤醒同胞，庶几人民宪法会议早日实现。”七日，参加学联召开的各界会议的代表极为广泛，各种群众性的、私人的、官办的、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大家一致同意十月十日游行请愿，并公推毛泽东同志等起草《请愿书》。

连日来，在制宪建议书上签名的已增至四百三十六人（代表

三十六个团体)。八日,二百多个签名者在教育会幻灯场开大会,毛泽东同志担任大会主席。大会讨论了自治运动进行方法,并通过了宪法会议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还推举十五个代表与政府交涉,要求按此制定人民宪法会议条例。

十月十日,省城各界举行万人游行示威。那天,大旗前导,乐队随行,旌旗猎猎,鼓角喧天。每人胸佩白绫徽章,手执写有标语的白布小旗,秩序井然,极为壮观。虽然天下着雨,但群众情绪一直很高,工界同胞“都是短衣赤足,戴笠游行,尤足表现劳动界的精神”。^①他们高呼“打倒旧势力”、“解散旧省议会”、“湖南自治”和“建设新湖南”等口号,沿途散发二十余万份传单,要求政府立即召开人民宪法会议,实现真正的自治。游行队伍行至督军署后,谭延闿假惺惺地满口表示“允纳人民意见”。但是,当队伍到达省议会时,游行群众出于对旧省议会的义愤,扯下了议会的旗子,谭延闿、赵恒惕一伙,立刻撕下了自己的伪装,露出了与人民为敌的狰狞面目。

原来,旧议会的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又已超过任期,群众对他们的一派“官治”,早已不满。现在抬头一看,省议会的旗帜仍在迎风招展,惹起了心头的怒火:旧议会这“过去之客”,为什么要据“不散之筵”,包办起制宪工作来呢?于是,在“解散旧省议会”的口号声中,有些人跑上前去,把旧省议会的旗子扯了下来,把那些胡说八道的对联、匾额一一摘掉,丢在一边。

游行群众这一自发的革命行动,得到了人们的热烈喝彩,也吓慌了统治者,触怒了谭延闿。谭延闿发出布告威胁市民说:“切勿轻信游词,盲从晕行”,不然“远则危及大局,近则害及一

^① 《湖南通俗报》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二日《市民自治运动大会记盛》。

身”。旧省议会告状，谭延闿回复说：“其他借题鼓吹侮辱议会之言论，如果仍不觉悟，触犯刑章，政府自当依法取缔。”谭延闿凶相毕露，把他自我标榜的“顺应民情”、“提倡自治”一类谎言，撕得粉碎。

扯旗事件之后，谭、赵政府传出一种流言，说旗子是毛泽东同志扯下来的。随后，他们又放出风声，说省议会接到告密信，信中说毛泽东同志“在图书馆邀集各公团代表开会，运动某军队，捣毁省议会”。警察厅还将毛泽东同志召去诘问。毛泽东同志大义凛然，据实辩诬。他特地向警察厅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光明正大地郑重声明：“一、泽东前为湖南制宪问题，不满意于省议会，是‘有’的。二、扯旗及谋捣毁省议会是‘没有’的。”他抗议对他进行人身迫害，要求惩办造谣诽谤的人。毛泽东同志的坚决斗争，使得谭、赵军阀政府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毛泽东同志领导和组织的这场人民宪政运动与军阀割据的“自治运动”的激烈斗争，促使人民群众认识到，从老虎嘴里是讨不出碎肉的，要争得人民的权利，必须依靠自己去斗争。同时也促进了湖南各阶层人民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民主联合，树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中的威信，为进一步开展革命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赵恒惕逼走谭延闿，独揽湖南军政大权。赵恒惕比谭延闿更狡猾，他深深懂得，笼络人心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上台不久，他便装模作样地请了十几个“学者”来起草宪法。第二年四月，公布了一个秘密起草的《省宪法草案》。毛泽东同志动员社会舆论，对这个“草案”展开批评讨论，并亲自在四月二十五日的长沙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省宪法草案》的最

大缺点是对“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特别是对工人的劳动时间、工资、教育、卫生以及组织工会的权利等，根本没有规定。八月，赵恒惕在“援鄂”战争中失败，急欲公布一个正式省宪法，并依法获得“民选省长”的资格，以便巩固他不稳定的政权。于是，经过一个御用的由“各县人民代表”组成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和伪造的“全省公民”的总投票表决，结束了“制宪”活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正式公布了《湖南省宪法》。

赵恒惕制造《省宪法》以欺骗人民，同时又大倡所谓“联省自治”以对抗北京军阀政府，这同别的军阀比较而言，算得上是“棋高一着”。然而，“省宪法”公布后仅半个月，他便惨杀了从事工人运动的黄爱和庞人铨^①，用自己的行动戳穿了假面具。但尽管如此，在当时中国军阀任意鱼肉人民、草菅人命的情况下，经过人民群众的斗争，《省宪法》总算有些冠冕堂皇的假民主条文，这种环境比以前多少要好一些。一九二二年毛泽东同志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就曾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把赵恒惕的遮羞布《省宪法》，当成合法斗争的武器。这是毛泽东同志当年努力为革命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再利用这个环境推进革命斗争的一个生动的事例。

关于建党和革命道路问题的讨论

毛泽东同志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深刻地研究了俄国十

^① 黄爱：字正品，湖南常德人，一九一九年在天津读书时，是《觉悟社》的社友，积极投入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第二年，周恩来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黄爱同志回湖南。黄爱同志牺牲后，周恩来同志写了《生离死别》一诗，以示悼念。庞人铨：湖南湘潭人，参加过驱逐张敬尧运动。一九二二年一月，与黄爱一起领导长沙第一纱厂工人罢工，被军阀赵恒惕逮捕，十七日，二人在长沙浏阳门外就义。

月革命的经验,从中认识到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有列宁缔造的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在评论湖南自治的一篇文章^①中说:列宁建立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和反革命阶级,是因为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真正可靠的党”;这个党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利用了帝俄在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时机,发动了占全国人口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向新民学会会员指出:我们要从事于根本改造中国之计划与组织工作,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即建立共产党。^②

在新民学会会员中,最早同毛泽东同志商讨建党问题的,是蔡和森同志。

蔡和森同志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去法国勤工俭学。到法国后,他先是补习法文,继而收集了近百种小册子,夜以继日地“猛看猛译”。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就将各派社会主义、世界大势和俄国革命的情况基本上弄清了。在毛泽东同志第二次北游的同时,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有较深刻的认识,坚定不移地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他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③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如何着手准备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呢?他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党,然后……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并明确表示:

① 载一九二〇年九月五日湖南《大公报》。

②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③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为此，他在另一封信中特意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入党条件、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

当时，毛泽东同志虽然与在法国的蔡和森同志远隔重洋，但他们的心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阅读了蔡和森同志的来信后，他是那样地高兴，连声称赞：“见地极当”，“没有一个字不赞同”。

冬日的长沙，阳光煦丽。毛泽东同志神思万里，欣然命笔，给蔡和森同志回信。在先后两封回信^①中，除了充分肯定蔡和森同志所提各点外，还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信中强调即将建立的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他写道：“凡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革命者“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应该鄙弃只谋“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因此，既要进行中国的革命斗争，又要“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等等。回信还告诉蔡和森等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国内已在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上海已出版了名为《共产党》^②的刊物。

与建党问题相联系，新民学会会员在一九二〇年夏至第二年初，就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五四运动初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了统一战线，对封建复古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底以后，中国政府被迫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①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② 《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出版的，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创刊。

已经过去。这时斗争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比较广泛和深入，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化，围绕着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胡适，秉承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旨意，叫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一面伪装成所谓懂得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者”，一面偷运改良主义的货色。无政府主义者也乘机扩大他们的影响。这些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反映到新民学会内部来，便是在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一九二〇年七月，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罗学瓚、蔡畅、李维汉和肖子升等十余人，齐集在蒙达尼开会。会议虽然一致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但对如何实现这一方针，各持己见。概括起来，会上有革命与改良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蔡和森同志说：“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合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肖子升等人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说这种革命的“好处”是“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这派人强调中国的情况和俄国不同，在俄国获得成功的暴力革命的方法，不见得适用于中国。他们说：“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所以，他们公开宣称：“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八月间，蔡、肖等人都写信给毛泽东同志，陈述自己的观点，请他发表意见。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寄到国内时，离他们开会已经很久了。

与此同时，新民学会在国内的会员在同一问题上，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年十月，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罗

素来华，张东荪等人陪同他到湖南、江苏、北京等地讲演。罗素说他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他认为“宜用教育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①，而“以武力为革命的方法”，是“俄国共产党最大的错误”^②。张东荪等人，“很以罗素先生的话为然”，极力为他叫卖推销。当罗素在长沙讲演时，毛泽东同志曾组织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去听讲，他自己还详细地作了记录。对罗素的观点，会员中有的人赞同，有的人反对，他们展开了“极详之辩论”。

毛泽东同志对罗素这些观点的看法是：“事实上做不到”。他认为肖子升等人的观点，与罗素、张东荪的观点完全一致，都是想“用教育的方法”改造社会，而这是不可能办到的。经过深思熟虑，他于十二月一日，给在法国的会友回了一封长信^③，明确表示“深切赞同”“俄国式的方法”，不同意“温和革命”的改良主义道路，并透彻地阐明了为什么“用教育的方法”改造社会行不通。

首先，办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现在世界上，钱尽在资本家手中，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者是他们的代理人；学校和报馆这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也都是由资本家掌握。总而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之所以掌握教育权，是因为他们有议会、政府、法律、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构，占有银行、工厂和各种文化教育机关，控制着一切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

①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② 《新潮》第三卷第二号《布尔什维克主义》。

③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能安息于其字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

其次，纵然掌握一两个学校和报馆，也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毫末，使资本家“回心向善”。为什么呢？毛泽东同志说，从历史发展来观察，“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着他们对金钱、享乐的无止境的欲望。因此，要资本家放弃剥削，只能是荒唐的梦想。他还精辟地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就是说，暴力革命是推翻剥削阶级唯一正确的方法。

再者，革命者不仅要抱有理想，尤其要看清现实。毛泽东同志针对改良派“虽缓然和”的谬论，用退一步的口吻反问道：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到共产的目的，即使能够达到，又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那么，无产阶级还要在资本家鱼肉下，再宛转呻吟一百年，革命者又“其何能忍”！重要的是现在无产者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从而要求革命。这已成为一种“不能消灭”的事实，他们“是知了就要行的”。

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用教育的方法”去解决改造社会的问题，极力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对旧中国和旧世界实行根本改造的这封长信，由于说理充分，给新民学会的会员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在讨论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还对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修正主义思想流派，但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时候，也贩卖过一些修正主义的货色。比如，张东荪就把修正主义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叫喊“从唯物主义移到精神主义”。玄学鬼张君勱极力赞扬出卖无产阶级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①，宣扬“劳工阶级与资本阶级之调和”。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一九二〇年八月，蔡和森同志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这是）现世界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九月，他在另一封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致堕入迷阵。”而“修正派改良派（即染了有产阶级唯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等好胆大，又把中产阶级的唯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为资本家寻找“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

毛泽东同志完全同意蔡和森同志的意见，除了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外，还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重要性。他说：“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发动、保卫和最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是一八六九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建立的。马、恩逝世后，蜕变为改良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拥护帝国主义战争。

争,归结为世界观的分歧和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同修正主义的界限,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同志,还开展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从另一个方面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无政府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在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流行颇广,是各种冒牌社会主义中影响较大的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的年代里,无政府主义者集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力图表明无政府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因此,要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就必须踢开无政府主义这个绊脚石。

一九二〇年八月,蔡和森同志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谈到了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并着重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他说:“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公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了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狄克推多(按:“专政”一词的译音),非以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毛泽东同志在回信中,也明确指出,那种没有权威、没有组织的社会状态是不可想象的,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那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人,如果不是“故为曲说”,便是“愚陋不明事理”。

当时,长沙的无政府主义者很活跃。他们组织“明社”、湖南劳工会等团体,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那一套。第一师范教员中也有人向学生灌输无政府主义思想。毛泽东同志利用在第一师范

工作的有利条件,发动肖述凡^①、郭亮^②、夏曦^③等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学生,组织了一个约二百人参加的“崇新学社”,采取出墙报、开辩论会或讲演会等形式,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教育、争取那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

当时长沙的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多分散在各单位工作或学习,集合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大家都感到这是个缺陷。后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组织“星期同乐会”,使会员们每周有一次聚会的机会。开始时限于会员,不久,各人又有意识地邀请一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参加。每到星期天,他们就到长沙市区的一些名胜之地如天心阁、望湘亭、开佛寺、桔子洲头等处聚会,或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在林荫道上并肩漫步,或在皓月当空、轻风拂面的夜晚,缓缓地绕着湘江中的桔子洲泛舟漫游,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中的各种问题,交流工作经验和思想情况。在毫无拘束、畅所欲言的交谈中,会员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那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也受到很大的启发,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后来不少人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了。

湖南劳工会是一个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工人组织,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它的会员中有些人谩骂马克思主义者是“长尾巴的”,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者要推翻现在的政府,又要建

① 肖述凡,湖南宁乡人,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书记,一九二七年病逝。

② 郭亮,湖南长沙人,共产党员,是湖南工人群众的优秀领袖,曾任湖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等职,一九二八年三月英勇牺牲。

③ 夏曦,湖南益阳人,共产党员,从事过学生运动,曾任中共湖南区委委员、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在湘鄂西分局负责时,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在红军长征途中牺牲。

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革命不彻底，“长”了一个多余的“尾巴”。总工会的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是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曾在工厂工作过，对工人的疾苦有所了解，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把无政府主义当作工人争取解放的途径。他们在湖南工人中有一定的威信，要肃清无政府主义在工人中的影响，就必须设法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支持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军阀的斗争，鼓励他们从事工人运动；一方面批评他们只作经济斗争，没有严密组织和远大政治目标，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只谈工会，只想用炸弹和手枪干掉政府里的要人等糊涂思想。同时，还邀请他们一道深入工厂进行调查，实地了解工人的情况和要求，并指定同志与他们保持联系。在毛泽东同志耐心细致的帮助下，黄、庞二人都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同志全面而深刻地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在一九二一年元月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

元旦那天，长沙大雪纷飞。虽是新年，却到处关门闭户，人稀车少，一幅凄凉景象。毛泽东同志踏着皑皑白雪，来到文化书社。这时，书社不太宽敞的房间里，挤满了十多个新民学会会员。他们从一日至三日，连续开会，热烈地讨论着学会的方针和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等问题。

在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时，毛泽东同志将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概括为社会政策（即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即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即罗素的假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五种，并将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讨论的情况转告大家，引导大家展开讨论。何叔衡同志第一个发言，他

说：我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一次扰乱，抵得二十年教育”，我深信这些话。其他会员，在认真思考、分析之后，也都各抒己见。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极其精辟的发言。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①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毛泽东同志在尖锐地批判了社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的反动本质后，斩钉截铁地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②

在毛泽东同志的引导、启发下，通过三天的热烈讨论，大多数会员对学会的方针和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等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大会临近结束时，正值雪霁天晴，湘江两岸，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参加大会的人们，都觉得会议开得很成功，他们走出文化书社，心情象万里晴空一样，异常开朗。这次会对提高会员觉悟，纠正错误思想，引导会员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同志鉴于会员分散在国内外各地，为了使会员能了解会务进展情况，交流政治思想，亲自主编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印发给会员人手一册。《会务报告》记述了会务状况和一些重要会议，共出版两辑。《通信集》选编了会员之间涉及学会活动和政治思想的信件，是

① 补苴(jū)罅(xià)漏：修补漏洞的意思。

②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会员发抒所见相与商榷讨论的场所”，先后出版了三集。其中第三集，主要是毛泽东同志与蔡和森同志之间关于讨论共产主义和建党问题的信件。这些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光辉的信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部分的思想准备。

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

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报》上刊登了一篇《文化书社缘起》。《缘起》说，湖南还没有新文化，全中国也没有，全世界也只有“一枝新文化的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又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研究的材料。”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发起创办文化书社而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

创办文化书社是毛泽东同志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同志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认识到，开展革命斗争，必须使广大群众特别是群众的领袖人物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则，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因此，他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全省人民的革命觉悟，看做是当务之急。当驱逐张敬尧运动进入高潮，他还留居在北京的时候，就打算在驱张胜利之后，在湖南掀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作为开展这一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书社。张敬尧一滚出湖南，毛泽东同志立即着手筹划文化书社的创办工作。

八月二日，文化书社的发起人在长沙楚怡小学召开成立会。会上通过了“组织大纲”，规定了书社的组织机构和营业方法，确定书社的宗旨为“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会议还推选了毛泽东、彭璜和易礼容等三人为筹备员，负责筹备工作，起草议事会（由投资人组成）细则及营业细则。

创业艰难百战多。文化书社开始筹办的消息传开以后，一方面受到了要求进步的青年们的欢迎，同时，也遭到了因循守旧的人们的强烈反对。那些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对新文化、新思想既深恶痛绝，又十分恐慌。他们认为，一旦文化书社办成，必将带来种种灾难，因此，一定要使它“胎死腹中”。为了对付顽固派的非难和反对，毛泽东同志不辞劳苦，日夜奔忙，亲自走访长沙教育界和新闻界的一些开明人士，向他们宣传创办文化书社的目的，邀请他们共同做发起人。那些顽固派睁眼一看，发起成立书社的很多是省里的知名人士，也就不便公开鼓噪了。

资金缺乏，是文化书社筹办过程中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一些战友，本来都很穷，维持生活已十分勉强，要一口气筹措一大笔钱作开办书社的经费，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首先找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议决每人分担一些开办费；同时，又商请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绅商界的一些熟人量力投资。这样，总算筹集了五百多元。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毛泽东同志还与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以及彼此熟悉的一些有名人士联系，请他们作信用介绍，以便向外埠订购图书时，免去押金。

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筹备，租了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校的三间房子做社址，外埠的第一批书报杂志也陆续运到，书社

终于办起来了。

九月九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久经干旱逢喜雨，点点滴滴润心田。长期看不到新出版物，以至“脑子饥荒”的人们，来到文化书社，一下子见到好些新书刊，高兴的心情就不用提了。许多人都尽力购买新书。但是书社在开办初期，资金不多，营业范围很小，经售的书不到两百种，杂志只四十多种，报纸只三种，都是随到随光，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充分发挥书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负责制定书社的发展计划，组织实施，并与全国有关方面交涉，增加订购书报杂志。新民学会每次集会，他都将文化书社的工作提出来，请大家研究，要求会员把“推广文化书社”作为学会的一项“基本事业”来进行。在毛泽东同志的辛勤努力下，不久，书社投资扩大到一千元左右，又积累了一点营业盈余，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一九二一年三月底，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南京、唐山、苏州、福州等地以及省内各县共六、七十处，发生了营业关系。为了方便买书的人，广泛传播革命思想，文化书社在长沙城内的第一师范、楚怡、修业等学校，设立了贩卖部，聘请了推销员；同时，还在平江、浏阳、衡阳、宝庆（今邵阳）、宁乡、武冈、溆浦等七县成立了分社。这些分社的创办人，多为新民学会会员或其他革命分子。

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向工农群众推销新书刊。根据他的提议，书社规定：凡来社贩运小册子卖给劳动界的，一律照进价转售，不赚分文，有些书的售价甚至比原价还低。有时，毛泽东同志还亲自背着新来的书刊，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去推销。他的模范行为，带动了书社的营业员。他们经常送书报上门，或代人在

外地购买新书。书社还通过新民学会会员、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和工人夜学的老师，把进步书刊送到工人群众中去。据文化书社开办后七个月统计，销售量最大的书，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罗斯之研究》和《劳农政府与中国》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是《劳动界》、《新青年》、《少年中国》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劳动界》，是一个以工人群众为对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在工人中影响很大。

文化书社不只是单纯地出售书报，它还想方设法发动和组织群众阅读新书。为了使缺钱买书的工农和市民群众也有机会看书学习，书社在社内设立了书报阅览处，陈列各种书报，供大家阅览。逢有新书出版，书社还在报纸上刊登“介绍新著”、“通告好学诸君”之类的广告，广为宣传。书社出售的每本书刊，内面都夹有一份印刷品，上面有一个“启事”和一个“建议”。“启事”叫做《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它告诉读者，文化书社至诚恳切地介绍新书报，目的在于使湖南人思想进步，故欢迎读者多来买书，并请读者协助办好这个革命事业。“启事”说：“我们很惭愧自己的能力薄弱，不能担负这传播新文化的大责，希望各界有心的人予以援助。先生若能帮我们费一点口舌介绍之劳，那我们是特别感激先生的。”“建议”叫做《读书会的商榷》，它说明各自买书各自看和“关门研究”的坏处，奉劝大家组织小小读书会，大家买书大家看，共同研究。因为这样既能少花钱多看书，又能交换心得，解释疑难，辨明是非。

毛泽东同志还领导文化书社制定了一套民主管理制度，并且亲自监督实行。

书社的账目有日算、月算和半年算三种。直接管理经费的人有时未能按时清理，毛泽东同志必来催促，甚至亲自帮助结

算。据在书社工作过的人说，毛泽东同志来了后，把社内仅有的四张桌子拼起来，大家一起算账。如果发现银钱出纳有马虎的地方，他总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来，并立即帮助改正。

文化书社的社务，每半年向社员报告一次。毛泽东同志亲自编写《社务报告》。一九二一年三月印出的《社务报告》第二期，叙述编写这种报告的目的时说：“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说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①，并不是为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取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

《社务报告》内容极为详尽周密，不仅叙述了办社的目的、经过和经营方法，而且将全部经济收支、盈余情况分目细列。对于书报的推销情况，也有详细的统计。这样作，“一来，见某种书在湖南销数若干，便知某种书所及于湖南人的影响；二来，每半年有一次统计，可以比较某种书每半年销数的进退。”

《社务报告》除了发给投资的社员外，还作为一种宣传品，分送给社会上各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这种社务公开的方法，使文化书社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深得群众的信任。

文化书社的房屋很少，又僻处市区西北一隅，不能适应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一九二二年书社迁到贡院西街十一号（现中山西路），一九二六年，又迁到水风井羊风拐角十五号。

随着文化书社事业的日益发展，湖南成为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很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都到文

^① 文化书社《组织大纲》规定，资金投入后，即为全社公产，不计利息，亦不能取出。

化书社买过书。读文化书社的新书报，成了当时全省各级学校的新风气。很多人以前连俄国十月革命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读了这些新书，也懂得了苏维埃政府是代表工农利益的了；原来连马克思、列宁的名字也不知道的人，也懂得了一点唯物史观的大意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文化书社更是积极地、大量地推销全国出版的新书和报刊，特别是共产党、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向导》、《先驱》、《中国青年》，以及《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丛书等等，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文化书社自创办到一九二七年七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将近七年时间。七年间，它除了在湖南境内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外，还在为党周转革命活动经费，提供秘密集会和联络场所，以及培养革命干部等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同志还与何叔衡同志一起，联合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方维夏等，发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公开研究、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等二十余人，借长沙县知事公署为会场，召开了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何叔衡和彭璜等四人为筹备员，进行准备工作。

九月十六日，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当时，在北洋军阀政府和赵恒惕的反动统治下，马克思主义被称为“过激主义”，列宁的故乡被诅咒为“饿死人的地方”，社会上一般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不太了解。正因为如此，在成立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研究俄罗斯学术精神及其事情”，向人们澄

清事实，辨明是非，是“十分必要的”。会议选举了毛泽东同志为书记干事，讨论通过了研究会的简章。简章规定：本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凡经会员三人介绍者得入会研究”；会务包括：（一）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从事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

研究会的会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号召大家来研究俄罗斯，并介绍了俄国的一些情况。彭璜在《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一文中写道：“近来有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出世，俄国人见了毫不惊奇，大家研究起来，尽吸其精华。至今俄国的革命，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中国人的古训。可爱的俄人，早有了这种谦虚的态度。现在中国人，不也应该有这种态度来研究俄罗斯吗？”文章在谈到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时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几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如（一）废除土地私有制；（二）各种大企业收归国有；（三）公布劳动义务。即此数端，已足见俄国人权利、义务的分配均匀，无阶级产业上的区别，大有‘贵则皆贵，富则皆富’的表征。诚使全人类都能秉‘创造’与‘互助’的本能，努力向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文明上去发展。”^①

当时，苏维埃政府发表了对华友好声明，中国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但也有些反动分子攻击“声明”怀有“恶意”，“带有传播主义的性质”。彭璜在文章中对那些诬蔑之词进行了严厉驳斥。文章说，“俄国人硬欲争回自己的平等、自由，同时又很尊敬并希望各国人民均能平等、自由。所以劳农政府对外的方针，（一）排

^① 《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署名荫柏，载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湖南《大公报》。

斥秘密外交，与各国人民谋亲善；（二）废除殖民政策，民族有同等的待遇。”劳农政府声明“凡俄旧政府在满洲、蒙古及其他省内的一切权利，一并无代价、无条件地退还于中国，难道这也是对中国有恶意吗？”至于说什么“传播主义”，“不错，我们在他们的通牒中，确看出他的主义是：反对强权，提倡人道，主张民族自治，不惜牺牲最少数人，以求收回最大多数人固有的幸福，要创建一个大同世界，创建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这就是他们通牒中传播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主义，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俄罗斯研究会还将各地报刊的重要文章，介绍给长沙的报纸转载。如上海《共产党》月刊上刊登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与《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都在湖南《大公报》上转载过。这些文章，对湖南的进步青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湖南许多青年向往俄国，很想到俄国去。早在一九二〇年初，毛泽东同志还在北京的时候，就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要“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并与李大钊同志商量过此事。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介绍了一批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转赴俄国。任弼时同志^①和肖劲光同志就是其中的两个。

肖劲光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一天，弼时同志（当时十七岁）从街上回来，样子极高兴，一进门就对我说：‘有办法了！’我问什么办法，回答是‘到俄国去！’‘到俄国去！’这在当时对我

^① 任弼时：湖南湘阴县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历任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共湘赣边区省委书记、红六军团政委、第二方面军政委、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在党的五大、六大、七大，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北京。

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激动！对于俄国，我们知道得并不多，那里不是彻底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社会么！这个‘彻底推翻旧社会’的‘彻底’，对于当时象我们那样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充满仇恨的青年，乃是全部革命意义的集中表现。弼时同志毫不迟疑地下定了决心。经过了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组织的介绍，我们一同到达上海去学俄文。就在这个时候，弼时同志和我一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①后来赴俄时，他们两个人分在一个组，一个扮作理发工人，一个扮作缝纫工人，在路上还装作互不相识，以便躲过敌人的耳目。当年赴俄勤工俭学的，都是经过许多波折，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达到目的地的。他们回国后，大都成了党的优秀干部。在毛泽东同志的引导下，许多青年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九二〇年冬至一九二一年春，毛泽东同志又把自己的一家人都动员起来，投入革命的大熔炉。

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同志与杨开慧同志^②结成了革命的伴侣。他们相识已经很久了。那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学习时，杨开慧同志随父亲杨昌济先生居住在长沙城内，毛泽东同志常去杨家向杨先生请教或讨论问题，杨开慧同志常常坐在一边旁听，她对毛泽东同志的远大抱负和宏论卓识非常钦佩。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与随父亲居住北京的杨开慧同志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并建立了爱情。杨开慧同志是一个热情饱满的革命女青年。五四运动时期，她带头剪短发，进

①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悼弼时》。

② 杨开慧：一九〇一年生，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长沙、湘阴、平江边界地区开展革命斗争，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在长沙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九岁。

男校，热情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发动和组织同学们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斗争。毛泽东同志开展革命活动，经费非常困难，她就与母亲商量，把父亲一九二〇年一月逝世时北京大学的同事送给的奠仪费拿出一部分来，支持毛泽东同志搞革命活动。他们的友谊和爱情，完全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上。后来，杨开慧同志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她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奔西忙，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毛泽东同志早期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好学生、好战友。

一九二一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同志从长沙回到韶山。一天晚上，他和弟弟泽民^①、泽覃^②以及堂妹泽建^③等，围坐在火炉旁，谈论着家庭情况。泽民告诉哥哥，那年家里起火后，第二年冬天修屋，不久又遭“强盗”抢了，以后还被抢过几次，加上父母去世又用去不少钱，家里的光景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毛泽东同志说了几句安慰话以后，开导他说，这不只是我们一家的事，国乱民不聊生嘛！他要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象泽覃一样（毛泽覃同志一九一八年一起在长沙读书），跟他到长沙去学习。

① 毛泽民：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主要是为革命理财，历任党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等职。一九四三年九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时年四十七岁。

② 毛泽覃：一九〇五年生，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过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武装斗争，担任过青年团地委书记、党的中心县委书记、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和红军独立师师长等职。在中央苏区时，与王明路线作过坚决斗争。一九三五年四月，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时年二十九岁。

③ 毛泽建：一九〇五年生，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过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是我军最早的女游击队长之一。一九二九年八月，在湖南衡山英勇就义，时年二十四岁。

泽民提出，家里的房子、田地怎么办？毛泽东同志说，这个好办。他先向全家人介绍了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形势，教育他们要想到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痛苦，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接着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欠别人的债，把猪牛等变卖还清；别人欠自家的，把他们请来，宣布一律不要还了；几亩水田租给别人种，收点谷子救济无依无靠的孤寡；房子让给人家去住。毛泽民同志沉思了一会后，赞同了哥哥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转问泽建打算怎么办。当时毛泽建同志还只有十五岁。她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当了一辈子长工，三十九岁就被折磨死了；母亲积劳成疾，得了严重肺病，带着四个孩子，讨米为生。泽建六岁时，毛泽东同志的父母把她接过来当做亲生女儿抚养着。毛泽东同志的父母去世后，泽建的姑妈把她接走，送给别人当童养媳。正在茫茫苦海不知何处是岸的泽建，听到哥哥的亲切询问，马上回答说：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接着又说，我要跟你去读书。毛泽东同志听了非常高兴。随后，经过一些周折，帮助她解除了不合理的婚约。

春节过后不久，毛泽民同志遵照哥哥的意见，很快地安排好了家事。泽民、泽覃、泽建三兄妹，先后告别了乡亲，前往长沙，踏上了漫长而艰苦的革命征途。从此，毛泽东同志全家都参加了革命，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庭。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但是，对于当时中国能不能

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社会上有着迥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张东荪等人胡说：“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①，还不具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这种错误观点，他指出：“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因此，“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②

一九二〇年秋天，继上海、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主要是新民学会中一些坚信马克思主义、愿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先进分子。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因此，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的带领下，除了运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开始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

首先是重新办起了工人夜学。第一师范学友会原来主办的工人夜学，在毛泽东同志毕业后，因无人继续主持工作而停办了。一九二〇年秋天，毛泽东同志到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后，又开办了一所工人夜学。过去的夜学主要是教给工人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爱国心；而这次开办的夜学，则着重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使他们受到本阶级先进思想的熏陶。

当时，很多工农子弟没有读书的机会，毛泽东同志又特意在

①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改造》第三卷第四号。

②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附属小学高小部创办了一所补习学校，招收十八岁以上的失学青年。这些学生年龄较大，对不合理的事情了解较多，对社会现实不满，接受新鲜事物较快。毛泽东同志非常喜爱他们，总是满腔热情地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深入浅出地给他们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些青年思想上、学习上都有很大的提高，敢于大胆反对旧礼教，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有的还能写较长的文章。但是，他们家境贫苦，衣着不好，举止也不那么温文尔雅，到隔壁师范部礼堂参加报告会或节日集会时，有的还拖着一双破鞋。师范部有些学生看不顺眼，要求校长取缔。校长把这些意见转告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微微一笑，坚定地说，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似乎不必过于苛求吧！

其次是努力加强与工人群众的联系。毛泽东同志除与夜学工人和补习学校的学生经常接触外，还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到长沙许多行业的工人中去开展活动。他经常身着粗布短褂，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和他们攀谈，到茶馆里去同工人一起喝茶、交朋友，甚至散步的时候也不放过接近工人的机会。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在南门外铁路旁散步，见到一个姓陈的火车头修理工，同他交谈了许久，随后又到 he 住的地方去“玩”，并通过他认识了一些别的工人。联系的面广了，许多工人经常主动来找毛泽东同志交谈情况，反映要求。毛泽东同志深有体会地说，交一两个工人朋友，可以认识和团结千百个工人。

在同广大工人群众的密切交往中，毛泽东同志了解了铁路、造币、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行业的工人劳动、生活、工资等情况，获得了很多关于湖南工人状况的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他们运用这些材料，去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揭穿资本

主义剥削的秘密，使工人群众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后来回忆说：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以政治目的把工人组织起来，并且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工人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同志能够很快地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并得到他们信赖，这同他对待工人群众的正确态度和语言的大众化是分不开的。他早就同工人群众有广泛的接触，对他们的疾苦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能够抓住工人利害攸关的问题。他没有一般知识分子的架子，总是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以诚恳、谦逊、老实的态度同工人打交道。他做过多次农村调查，办过工人夜学，素来熟悉群众语言，谈吐生动形象，易为工人理解和接受。据当时接近毛泽东同志的人们回忆，他那深入浅出，简明有力，幽默形象，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地方特点的语言，对工人群众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每当毛泽东同志谈论什么时，工人们总是津津有味地听着，同时，也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说给他听。

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积极宣传发动，湖南工人阶级的觉悟迅速提高。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长沙织造、铁业和泥木等行业工人和各校学生共数百人，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大会。那天，天空飞着小雨，游行的人们精神抖擞，冒雨行进。他们手执写着“劳工神圣”、“世界是劳动者的，劳动者须当管理世界”等标语的小白旗，沿途散发《劳动节略史》、《告工人》和《社会革命》等传单；到处讲演，唤起工人觉悟。游行的人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走遍了长沙城各主要街道，影响所及，前所未有。不仅群众对这次游行普遍表示支持，甚至连奉命前来干涉的警察，看了散发的传单，听了他们的讲演以后，也感叹地说：“原来是这样！唉！可惜我不得闲空同你们来散发传单。”上海《民国日报》

报道这次“五一”游行时说：“这次要算湖南几千年来的创举。”

在发动工人群众的同时，为了建立共产党的预备队伍，毛泽东同志还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一九二〇年八月，上海开始出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十月，毛泽东同志接到北京方面寄来的团章以后，立即着手建团工作。他深入到第一师范、第一中学和商业专门学校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把团章送给他们看。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基础上，个别吸收入团。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接受了建团任务，他在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十一月十九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而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寻觅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泽东，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此时青年团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十二月二日。泽东来时，……嘱我多找真同志。

十二月十五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寻找团员，尽可能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十二月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十二月二十七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从这些极其珍贵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窥知：毛泽东同志当时对建团工作是如何的费心、操劳。特别是他反复强调要积极而

會見毛(在通化院)云不日將赴陝考察教育。並屬青年
 因此時宜注意找真同志。祇宜從優不可急進。
 力家會見八男。致代中母。忘於彼。謂其母想其將中妹接
 接澤東一信。送來青年團章程十份。云其在研究。並
 行社會改造。約我在星期日上午去會他(若有不便)至
 沈汝代覓同志。
 明奎今日大撞拆我信。致其母。謂其母想其將中妹接
 十二月十六日
 澤東來此。看其自辦於下週。開成立會。
 周怎樣讀書。文。錄其於下。
 十二月二十七日
 澤東送我「互助團」。且待數日決定。
 仲九送我「互助團」。研究其內容。
 我想我此時若通科學。沒有弄好。研究其內容。
 難。努力加入青年團。就研究其內容。可以研究其內容。

慎重地吸收团员，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创见。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缺乏经验，注意质量不够，成员比较复杂，团员中，信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人都有，以致到一九二一年五月，不得不宣告暂时解散(十一月间整顿后恢复)。而长沙的团组织，在毛泽东同志积极慎重、“找真同志”的正确建团方针指导下，避免了这段弯路。

长沙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中，有不少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新民学会原是五四时期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发展，虽然有些人落伍了，有些人图谋个人的发展，走上了与革命分离的道路，有的后来甚至变成了反革命；但是，很多会员，都有过较长期的革命思想准备，参加过许多

实际斗争,现在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认为,这些经过斗争考验的会员,只要自愿,都可以加入青年团。陈子博^①、谢南岭^②等新民学会会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团员的。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长沙的团员已发展到三十八人,是全国团员较多的地区之一。除长沙外,衡阳也很早建立了团的组织。一九二一年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生蒋先云等先进分子组织的革命团体“心社”的成员,全部转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随后,衡阳省立三中、三甲工和三女师,都建立了团的组织。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它只有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为了改造中国,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了解国情。他曾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③因此,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后,特别是在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斗争的过程中,又在过去所进行的工厂和农村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一九二〇年四月,他从北京去上海,沿途在天津、济南、曲阜、南京等地,进行了二十多天的社会考察。十一月,又赴湖南醴陵和江西萍乡等地考察。第二年春夏之交,又考察了洞庭湖滨的岳阳、华容、南县、安乡和常德等县。通过考察,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

① 陈子博,湖南湘乡人,共产党员。曾参加创办文化书社,从事过工人运动,一九二三年病逝。

② 谢南岭,湖南宁乡县,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牺牲。

③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济和文化状况，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毛泽东同志坚持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芒。他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九二〇年八月，上海首先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以及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都相继成立了同样的组织。随着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不断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日趋成熟。当伟大的一九二一年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了。这年六月，毛泽东同志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出的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月末的一个傍晚，二十七岁的毛泽东同志，怀着崇高的希望，迈着坚毅的步伐，与何叔衡同志一道，踏上了停泊在湘江长沙码头的一艘轮船，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前往中国第一个大工业城市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长鸣的汽笛，响彻长沙烟雾朦胧的夜空，高悬的桅灯，照耀着滚滚北去的湘江，微风吹拂，仿佛奏起了一支支欢快的乐曲，欢送巨轮胜利启航，准备迎接一个永载史册的伟大日子的到来。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同志，为着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后 记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是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和关怀下编写出版的。

湖南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家乡，是毛泽东同志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新湘评论》杂志复刊时，就确定在努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早年在湖南的革命实践，写一本介绍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书。因此，我们在省委宣传部的具体领导下，邀请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长沙市毛主席革命纪念地办公室、湘乡县委宣传部等单位抽调几个同志，组成一个编写小组。

编写小组从一九七七年五月开始，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如：毛泽东同志早期的读书笔记、书信、文稿和发表于当时各种报刊的文章，毛泽东同志组织和领导的各个革命团体的有关历史资料和出版物，当时在长沙、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各种有关书报杂志，以及解放后发表的有关回忆文章和著作等等；访问了许多了解和熟悉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情况的老人。在广泛调查、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又集中一段时间进行了分析研究工作。

一九七八年六月，编写小组写出了第一个征求意见稿。为了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将征求意见稿铅印成本，送中国青年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有关单位、有关同志，并由省委宣



2 026 3668 3

传部负责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除了对书稿的写作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外,并就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几个重要问题,进一步作了研究探讨,对写好这本书有很大的帮助。根据各方面的意见,编写小组又作了较大的修改,印出了送审稿,最后由省委与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亲自审阅定稿。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新湘评论》杂志开始连载,至一九七九年三月,全书连载完毕。这次印成单行本前,我们又根据读者的反映,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润色工作,内容上也充实了一些材料。

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仍然是不成熟的。主要缺陷是对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研究不够,还有一些材料没有发掘出来,或者没有写上去。同过去出版的关于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一些书籍比较,这本书吸取了先前作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同时也提出和研究了一些新的问题,发掘了不少新的材料,其中有的是首次公开发表。尽管如此,有关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材料,还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发掘。明知不足,还是出版,主要是想更多地听取广大读者的意见,特别是希望能得到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同志的指教,以便能把这本书进一步修改好。

最后,谨向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过支持、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致以深切的感谢。

《新湘评论》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六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

作者 = 《新湘评论》编辑部

页数 = 172

SS号 = 10217407

出版日期 = 1979年10月第1版

出版社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
	农民的儿子
	从小关心国事
第二章	辛亥革命前后
	东台山下
	第一次发表政见
	参加革命军
	图书馆的自学生活
第三章	第一师范的峥嵘岁月
	刻苦地批判地学习
	顽强地锻炼
	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农村调查和工人夜学
	组织新民学会
第四章	在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中
	第一次北京之行
	站在五四运动的前列
	《湘江评论》
	驱张运动和第二次到北京
第五章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日子里
	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
	关于建党和革命道路问题的讨论
	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后记	
附录页	